

金福百賢回憶錄

上卷

絕不後悔

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七〇



金魯賢回憶錄上卷

絕處逢生 1916-1982

金魯賢 著



香港大學出版社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目錄

序	1
第一部分 家庭	
1. 幼年	5
2. 浦東	10
3. 上學	13
4. 當時的中國天主教會	15
5. 徐匯公學(1926-1932)	17
6. 堂叔祖父金福山	19
7. 兩位姐姐：陸納英、榮德先	20
第二部分 棄家修道	
8. 修院生活：耶穌聖心修院(1932-1935)	25
9. 聖母聖心修院(1935-1937)	28
10. 徐匯中學實習(1937-1938)	30
11. 入耶穌會：初學兩年(1938-1940)	32
12. 發初願：文學院(1940-1941)	37
13. 哲學院(1941-1942)	39
14. 讀神學(1942-1946)	45
15. 蘇北(1946-1947)	48
第三部分 留學生涯	
16. 旅歐途中	57
17. 法國卒試(1947-1948)	61

18. 學習英語	70
19. 額吾略大學 (1948-1950)	76
20. 我欽佩的兩位偉人	79
21. 幾位同窗好友	81
22. 于斌總主教	86
23. 耶穌會應變巡視員蒲敏道	88
24. 度假瑞士、奧地利、西德	90
25. 羅馬的第二年	97
第四部分 回國	
26. 奉命 (1951-1955)	101
27. 教區報到	106
28. 1949年後的上海教區	109
29. 各種運動	111
30. 徐匯修院	118
31. 反帝愛國運動	121
32. 四個代職	124
33. 龔品梅	131
第五部分 獄中生活	
34. 第一看守所 (1955-1960)	135
35. 公審判刑 (1960)	148
36. 上海監獄 (1960-1962)	151
37. 秦城監獄的外文翻譯 (1963-1967)	154
38. 撫順戰犯管理所 (1967-1973)	161
39. 重返秦城恢復翻譯組 (1973-1975)	166
40. 河南勞改第四大隊 (1975-1979)	168
41. 文化大革命結束 (1976-1979)	171
42. 河北第一監獄 (1979-1982)	174
43. 有朋自遠方來	179
44. 回申歷程	183
人名索引	189

序

1933年，我17歲，經友人介紹拜見愛國老人馬相伯。老人時年九十四，身穿黑長袍，外罩馬褂，端坐在靠背椅上。我向他表示敬意，並祝賀他長壽。他回說：「九十四年，一晃就過去了。」我想九十四年怎麼會一晃過去？今天，我也到了耄耋之年，虛度九十二寒暑，閉目回想，九十二年真是一晃而過。

但細細想來這一晃過得好艱辛。我出身於小康之家，從10歲起，屢遭變故，母死、父喪、姐亡，頃刻間失去一切，舉目無親，一貧如洗，入壯年連自由也失去，長達一萬天之久。到將近古稀之年，才能行使鐸職，卻謠言四起，誹謗滿天，有口難辯。古人說，世態炎涼，人言可畏，我感受殊深。

然而，每到自以為山窮水盡疑無路時，總會柳暗花明又一村。天使的手暗暗在牽引我，天主的援助及時到來，我深深體會：人會絕處逢生。父母雙亡，家產蕩然，一無所有，無家可歸時，我的堂叔祖父出現，把我們姐弟接到他家中，待我們如他的子女。叔祖父去世，姐姐猝死，陸納英和榮德先兩人卻對我說：「從今以後我是你的姐姐，放心吧！」她們一直以情同姐弟般的愛來照顧我，直到她們離開人世。在保定監獄我改造生活中最痛苦的時刻，德國人陶納德 (Donate Seeger) 的父母遠涉重洋來探望我，從此照顧我，直到他們去世。一路風險，一路平安，我的一生幾度絕處逢生。

出生於公教家庭，受教育於公教學校，以後加入了耶穌會，天主聖神用聖書上的警句指導我，沒有讓我墮落。屢遭變故時，我想到的是「萬般皆虛，虛而又虛」(Vanitas vanitatum, omnia vanitas. 訓1：2)。在耶穌會初學時，由於初學神師的行為，我很苦悶。當時我記住了《師主

篇》的教導：Ama nesciri et pro nihilo reputari*，以被人輕視、被人遺忘為樂。在監獄裡，失去自由，想到福女聖三依撒伯爾著作中的一句話：「天堂是聖三，聖三在我心中，我就像在天堂一般。」我就以監獄作天堂，內心不斷歌頌天主聖三，忘去了一切痛苦，其樂融融。

刑滿釋放，回到教區，先任佘山修院院長，後又獲選為輔理主教。我用以提醒自己的警句是：「祂應當長大，我應當縮小」(Oportet illum crescere, me autem minui. 祂必興旺，我必衰微。若3：30)。

生命就是一連串的選擇，選擇的標準是什麼？作為耶穌會士，我的標準就是「愈顯主榮」(Ad majorem dei gloriam)，只要是讓天主有更大光榮的事，我就去做。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我的好友一個一個先我而去，快輪到我了，我現在不斷向天主說：「主呀，請祢讓祢的僕人安然走吧！」** (路2：29。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話，容你的僕人安然去世。) 安然走，是我的意願。

既然深信世事全是空虛，那為何還寫什麼回憶錄？近日國外寫我的文章不少，流傳頗廣，其內容大抵與事實不符，有些內容是胡編的，也有故意誹謗的。對我無所謂，對中國教會卻產生了負面的影響，不利於我們的神聖事業。若我不澄清，外界人士將認其為真實，幾番內心鬥爭之後，決定寫下這回憶錄，讓讀者對這段歷史有所了解。

1955年9月8日我被捕時，上海公安局把我所有的東西，包括我的日記、信件、照片及生活用品全部抄走，什麼也沒有留下。

釋放回申，心有餘悸，不再寫日記，不再保留信件，寫這回憶錄全憑記憶，必有錯誤，尚希諒解，並請指出。

金魯賢

2008年8月30日

入耶穌會70周年日

* 編按：意為：「喜歡不為人知，也讓人認為自己不算什麼。」

** 編按：金主教所引《聖經》中文語句，與通行的「和合本」或有出入，現不予改動，唯以括號引錄通行本文字。

第一部分

家庭

1

幼年

我名叫金魯賢，1916年6月20日生於上海市。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戰況慘烈。我國屬協約國陣營，向同盟國之德奧宣戰，派了許多青壯年去法國參與後勤，以補其由於男丁多赴前線而缺乏勞動力的不足。中國北洋政府首領袁世凱，為了個人野心，迫於日本軍國主義的壓力，簽下了賣國的二十一條條約。日本又乘機侵佔膠州半島，企圖把中國淪為它的殖民地。袁世凱復辟帝制，遭全國人民反對。不久，「洪憲皇帝」鬱鬱而終，其任命的各地督軍以不同列強為後台，爭權奪利，各自獨立，互相殘殺，中國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1918年歐戰結束，次年，美、英、法勝利國簽訂凡爾賽和平條約，將德國原先在我國山東的特權不是歸還我國，而是交與日本，激起民憤，爆發了「五四運動」，迫使北洋政府代表拒簽和約。

我出生的時代，是我國人民遭受內亂和侵略的苦難時代，幼年時國家只有國恥日而無國慶日。

我出生的第二天是青年主保聖類思·公撒格(Aloysius Gonzaga)瞻禮，我領洗聖名為類思，法文名Louis，父親就給我取名為魯意(譯音)。上中學時，班主任說「魯意」毫無意義，改成魯賢。可是普通話賢讀 *xian*，與原音不符，但仍用到今天。

我父親在家沉默寡言，早上出門上班，傍晚回來，星期天在家看書，往往看小說，尤愛偵探小說。他不斷抽煙，很少和我們兄弟倆講話。今日回想，似乎他從沒有和我們說過話。往日領聖體前，要守空心齋，由半夜起到領聖體止，連一滴水也不能進，他有病，所以只得每年領一次聖體。父親對人很大方，還記得過年前清理別人給他寫下的借條時，他會對母親說：「這個人和那個人還不出了，不向他們要了吧。」於是把借條燒掉，母親總是同意。

來我們家的客人較多，我姑母家的人來得最多，特別是張登堂（後做神父）和他的弟弟張登隸。我家敗後，父母亡故，一次在馬路上遇到他，親熱地叫他，他不理我，我難受了好久，由此嘗到世態炎涼的味道。

我沒有看見過家譜，祖先世代務農，是窮人，無地位，也許根本沒有什麼家譜。我對祖先的概念很模糊，只記得祖父。

村上老人指著相連的七個墳向我說：「金家巷姓金的老祖宗是七兄弟。」幾百年前他們來到這塊荒地，開墾，結婚，生兒育女，眾多子孫聚居一處，就叫金家巷。奇怪的是，「文革」時代剷除這七個墳時，卻發現其中一個墳是空的。有條小溪穿過村子，把它分為兩片，稱為溪南、溪北，我們老家在溪南，教堂在溪北。

村裡人都是天主教徒，什麼時候開始奉教的，我不知道，老人也說不清楚，無從考據。金家巷教堂曾是主教座堂。朝鮮人金大建 (Kim Taegon) 曾在澳門讀神學，陪朝鮮首位主教 Joseph Ferréol 從澳門返朝鮮前路過上海，1845年8月17日上海主教就在金家巷聖他為神父。他在橫塘教堂獻了頭台彌撒，後經北京重返朝鮮，第二年去世，年僅26歲。1984年5月6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John-Paul II) 在漢城 (現名首爾) 立他和其他102人為聖人。金安德肋 (Andrew) 是韓國教會的驕傲，也是金家巷的光榮。

金家巷第一位神父叫金若瑟，他是江南教區派往意大利深造的第一位中國人；第二位神父叫金文其，1931年聖神父，派在蘇州張涇做本堂，於1937年12月被日寇殺害；第三位神父是我；第四位是金鶴亭，已故；第五位是金振岐；第六位是慈幼會士金充威，現在羅馬福傳部工作。

我的祖父金新衡，聖名保祿，是個虔誠教徒，生於1844年。小時候太平天國打到上海，太平軍留長髮，被稱作「長毛」。祖父常說自己被太平軍抓去，在後勤當雜工。他的第一個兒子叫信德，第二個兒子叫望德，就是我的父親。他希望生三個兒子，以信、望、愛三德命名。但他只生了兩個，他堂弟生了兒子，遂取名愛德。祖父後來到上海做學徒，及後在愛多亞路 (今延安路) 和河南路轉角開食品店，出售牛羊肉、洋酒、洋罐頭、黃油、奶酪等，專賣給外僑。他還販牛，賺了錢就買地蓋房子並出租房屋，很有經濟頭腦。1925年春腦溢血，倒地而亡，享年77歲。

我的父親生於1885年，名望德，字仲超(信、望、愛為超性的聖德，排行第二，故叫仲超)，聖名路加。我母親比父親大一歲，生於1884年，名張雲貞，聖名路濟亞，浦東張家樓人，張家樓距金家巷約兩公里。外祖父叫張志堂，也叫良海，他很早到上海謀生，做過英國總會和順昌洋行買辦，後來因炒外匯失敗破產(1917年列寧領導十月革命前，外祖父買入大量沙俄盧布，革命成功後這些盧布變得分文不值)。我母親有一妹，叫張望貞，崇德女中畢業後，入拯亡會當修女。拯亡會是個法國修會，很嚴格，進去要交許多錢，我父親出了這筆錢。

我的外祖母早死，外公後來續弦，繼室姓曹，老家安徽。我的繼外祖母生了兩個兒子，四個女兒，其中一個兒子早夭。

我父親在徐匯公學畢業後留校教書，以後又去洋行做事(所謂洋行就是現在所謂的外資公司)。父親的中文、法文、英文都非常好，是當時不可多得的人才。英國的「和記」公司聘他到南京去做華經理(也叫買辦)。他回家告訴我的祖父說，他要到南京去工作，祖父不高興，跟他說：「父母在，不遠遊。」父母在世的時候子女不能到外地去，應該每天到父母身邊問安，孝敬父母。父親因南京那邊給的待遇很高，偏要去。祖父說，你要去了就跟我沒有關係。可是父親還是到南京去做事。祖父一怒之下，把他賺的錢全部留給在身邊的大兒子，即金信德，我的伯父。

我的父母婚後第一年就有了小孩，是個男孩。可是沒幾個月就因病夭折。父母很希望再有小孩，可是等了九年才又有了孩子，就是我的姐姐，父親覺得她是為安慰父母而出生的，給她取名慰萱(萱意指母親，即她的出生安慰了母親)。她出生在9月聖母聖名瞻禮前夕，所以聖名瑪利亞。我姐姐非常聰明，10歲就到徐匯女中住讀，那時候叫崇德女中，深受老師和同學喜愛，我也非常愛我的姐姐。

姐姐3歲時，我母親又懷孕了，懷的就是我。可是我來得真不是時候。媽媽一懷上了我就生重病，幾乎死去。母親一心一意想回上海，說死也得死在上海。父親當時正春風得意，但他不願母親不高興，為了深愛的妻子，只得辭職陪母親回上海，為此而與洋老闆鬧翻，此後再也沒有風光過。回到上海，父親一時找不到好工作，正心煩的時候，我呱呱墜地。據說，人家把我抱給他看時，他不屑一顧，說我沒有給他帶來好運，當然他以後也認了我。母親有病，自己不能餵奶，雇了一個奶媽。奶媽很疼我，我斷奶後，她每年來看我時，母親都好好招待她，給她衣

服、錢，還有首飾。後來我家敗了，家沒了，她無法再來看我。我還記得她個兒比母親高，年齡和母親相同。

我兩歲半時，弟弟出世了。弟弟來得是時候，父親已找到了很好的工作：比利時聖母聖心會在上海設立辦事處，又成立一個房地產公司，他們聘用父親，待遇很高。我們全家特別愛我的弟弟，他生在11月中旬，近聖達尼老瞻禮，因而聖名叫達尼老，父親給他取名達義。我們沒有按家譜排名，我的堂兄為寬生、仁生、智生、禮生，我父親堅持用聖名，我叫魯意，弟弟叫達義。父親抽煙，抽的是粗大的哈瓦那王冠牌雪茄，還留過兩邊翹起來的八字鬍子，有時穿西服，有時穿長袍，褲子總是西式的，相當洋化。父親朋友很多，我記得他最好的朋友名陳憶德，他們情同手足，可惜陳憶德英年早逝，父親得悉死訊後哭了，這是我見到父親流淚最多的一次。事隔八十多年，陳憶德的孫女陳英男知道我父親是她祖父最好的朋友，帶了她祖父的照片來看我，使我很感動。

我幼年時記憶力很好，還記得弟弟出生後，母親抱了他睡覺，卻叫我睡在她腳旁，我還不樂意的情景。我還記得，母親用繩子綁著我，另一端繫在她手上，我走得遠了，她就收緊繩子把我拉回來。

我出生時家在南市城隍廟前方濱路鄰德里，靠近小東門。當時上海最熱鬧的是南京東路，次之小東門，再其次是公館馬路（後稱金陵路）、北四川路，今天的淮海路還沒有出現。

我家不久搬到三牌樓，淘沙場，住在一個小弄堂內，石庫門。弄名善德里，住有三家，我家住2號，1號住姓葉的，房主是跑街（即現在的推銷員），3號姓汪的是安徽人，茶商。我懷念這所房子，因為這是我一生中唯一可以稱為是家的居所。我12歲後父親經商失敗又患病去世，我就沒有了家，寄人籬下，甚至無處可寄。以後修了道，聽領導命，沒有自己的家；一生中有二十七年之久以監獄為家，以後以教堂為家，直到今天。我記得善德里的家有一個小天井，放些盆花，也是小孩子玩兒的地方，打彈珠，踢毽子。天井後是一個方方正正的客廳，旁邊是廂房，客廳的樓上是用飯的地方，樓上廂房是父母的地方，中間放著兩張床，大的是母親的，較小的是父親的。我姐姐住在下面廂房。我大了一些，在客廳的樓上放了一張床，我一個人一間，有了自己的天地，晚上可以多讀書，實際上是看小說。

我對善德里2號特別有感情，1951年回國後去看過一次，1982年釋放回來後又去看了一次，一切完好如初，只是房主人不認識我。2004年

4月再去看時已成平地，準備蓋高樓。善德里終於在我眼前消失，但仍存留在我腦海中。

我童年時代常去的地方就是教堂，學校就在教堂的旁邊。我的會口是老天主堂，位於上海的老城區內，靠近城隍廟，上學去教堂都穿過城隍廟，廟前廟後十分熱鬧，都是小商鋪，或小攤子。我和我弟經常去的地方是賣小吃的，比如烤魷魚的、賣梨膏糖的、拉洋片的，還有賣武的、耍猴子的。當時的城隍廟是普通老百姓的娛樂場所，今天的城隍廟已是高級旅遊商業區了。

老天主堂真是老，是徐光啟的孫女修建的，有四百年歷史，應是文物。堂是宮殿式的，也可以說是廟宇式的，我很喜歡。教堂老，本堂神父也老。我記得本堂神父姓倪，80多歲，名西滿，舉行彌撒聖祭時往往坐著。接任的是金瑪竇，也80多歲。老天主堂幾經滄桑，清朝禁教時做過關帝廟，解放後被學校佔用，學校現已搬走，教堂還沒有歸還給我們教會，但願早日落實政策。上海教區的李式玉神父、張家樹主教、艾祖章神父、閻智恩神父，還有我，都在老天主堂領的洗，頗具歷史意義。

我母親的文化程度不高，只念了私塾，沒有讀正規學校。她是個虔誠的教徒，每天領我們去聖堂望彌撒。在家中，她領我們念玫瑰經和晚禱。當時我們家有兩個保姆，但她晚上必下廚房親自為我父親做菜（父親中午不回家）。我記得她空閒時就為我們姐弟三人做布鞋，納鞋底。有一次我和弟弟穿她做的鞋才幾天又破了，她生氣地說：「不為你們做了，買皮鞋穿吧。」以後我們再也沒有穿過她做的布鞋。我記得每天有一婦人來給她梳頭（我們叫梳頭娘姨），我站在旁邊看。抹頭髮用的是刨花水，即木工刨下的木片浸泡在水中使水有黏性，哪像今天有膏呀，粉呀，水呀，膜呀，這麼多的化妝品。

母親好客，農村有人來，她一律熱誠招待，往往留他們過幾夜，臨走還送他們錢或衣服。我和弟弟很喜歡客人來，每當家中來客時我們都跳呀，跑呀，母親說我們又犯了「人來瘋」。記得有一次弟弟追我時，我跌了一跤，撞在床角上，流了許多血，還留下一個疤，幸有頭髮蓋住沒有破相。我和弟弟鬧時，母親說：「他們明悟未開，開了就好。」總是原諒我們，不打我們。

2

浦東

我出生在上海，但受家庭影響，說話仍是浦東口音，一開口，人們都知道我是浦東人。這裡講一講浦東，上海因黃浦江的分割自然形成兩個地區，黃浦江東面叫浦東，西面叫浦西。鴉片戰爭後，上海開埠。外國人來了，有了租界，因租界都在浦西，故浦西發展得很快。浦東一直是農田，浦東人都是農民，種的是水稻與棉花。一江之隔，天壤之別，浦西成為東方巴黎，浦東一直是落後的農村。我小時候逢正月十五燈節，提著燈（外面是紙糊的，裡面是蠟燭）在弄堂裡跑來跑去，媽媽教給我的歌是「希望一年花也好，稻也好」。稻指水稻，花指棉花，希望種出來的稻好，種出來的棉花也好，反映出農民的氣息。20年代初，浦東只有緊靠黃浦江陸家嘴一塊地方有英美的煙草公司（就是製煙廠），還有紗廠，此外啥也沒有。我們小時候過江沒有輪渡，要回老家去，只有小舢板，二十來人擠在一隻小船中，人搖櫓過江。到了那邊，沒有大路，只有很狹小的土路，可謂羊腸小道，當然沒有汽車，沒有馬車，也沒有黃包車（人力車），只有一個人推的獨輪車。獨輪車的每邊可以各坐三個人，車工一個人推著這個車子發出咿呀咿呀之聲慢慢往前走。

金家巷離黃浦江大約6公里，整個村子是農民，百分之八十姓金，還有百分之二十姓唐，連個商店也沒有。要買東西，如日常用品，還要靠被稱作貨郎的人（就是一個人挑個擔子，有油鹽醬醋還有針線等日常用品）。貨郎來了，手晃一個搖鈴，大聲吆喝，大家就出來買東西，有的人用雞蛋換。真正要買東西，還要跑到好幾里以外的洋涇鎮上去買，可見老家很落後。老百姓白天種田，晚上有的紡紗、紡麻，有的織布（用土的織布機），織的布很結實牢靠。後來外國人來了，有了所謂的洋布，土布便沒了銷路。

照明當然沒有電燈，也沒有煤油燈，而點菜籽油燈，燈草放在一個圓盤上點著，有一點點光線。《儒林外史》裡講，一個守財奴死前還伸出兩個手指頭來，只有他的妻子明白，他認為點兩根燈草太浪費了，只要一根就可以了。浦東的物質文明落後，可天主教的教務卻比較發達，每三里或四里就有一座教堂，旁有神父樓，稱為洋房。我們浦東金家巷這個堂曾是主教座堂，旁邊的一個小堂我們叫老堂，老堂就是主教座堂，以後蓋了一個大教堂，主教曾住在金家巷。幾次被毀後總是教友籌資再造。浦東的聖堂都由貞女即守貞姑娘管理。那時候還沒有中國修女會，貞女發守貞願，為教會服務。神父要管好幾個堂口，像金家巷本堂神父有將近十個小堂口：楊思橋、嚴家橋、界溝灣、唐家街、南黃等。神父巡視堂口，事務由貞女管理。貞女一心一意為教會服務，不拿工資，義務勞動，做手工活兒養活自己，一生奉獻給教會。她們曾為上海教區做出巨大的貢獻，教會不應忘記她們。

當時浦東教友以身為浦東教友而自豪。浦東出身的神父很多，我回想一下，在我青年時代，上海教區有將近五十名神父是浦東人。修女更多了。浦東教友在20世紀20年代認為可以成立一個教區，成立一個國籍教區。他們聯名上書羅馬，請求教宗成立一個浦東教區，由浦東的神父來當主教。羅馬收到此信後沒有答應，反而把這封信轉發給上海的法國籍主教。這個事情觸犯了法國籍主教，主教看信後很生氣，把幾個領頭簽字的人叫來大加訓斥，說他們犯了罪，並叫他們做公堂補贖，不然是要開除他們的教籍。

天主安排得奇妙，解放後第一位上海教區主教是浦東川沙人龔品梅。龔品梅失去自由後代理主教張士琅，是浦東張家樓人。以後的張家樹主教也是浦東人，張家樹去世後來了一個名叫金魯賢的，也是浦東人。所以浦東人希望由浦東人做主教來管理教會的願望，天主以另外的一種方式做出了安排。可惜，現在浦東的教會不發達，修道的人很少。現在浦東神父只留下幾個老人，年輕的只有黃正平一人，我祈求天主使浦東的教會、浦東天主教能夠復興起來，改變現在這樣進堂的老年人多青壯年人少，小孩子也不多的狀況。

我小時候浦東不但經濟不發達，浦東人的文化程度也不高，文盲很多。在20年代政府做過一個調查，中國文盲最多的縣，第二名就是浦東南匯縣。全中國文盲最少的卻是江蘇蘇北鹽城。浦東人除了種田以外還有做手工藝的，多數都是裁縫，還有廚師、木工，知識分子很少。浦

東也沒有什麼名人，最有名的一位是張聞天，曾是共產黨的總書記，為中國革命做出巨大貢獻，他從不爭權奪利，是很偉大的革命家，值得後世欽仰。

我出生在上海，我父親、我外祖父都在外商公司任職，殖民主義的影響頗深厚。當時滿清剛被推翻，辛亥革命才成功，又被袁世凱取得了政權，封建勢力基本上還統治著人民的思想，廣播呀、電視呀都未發明。家裡有一兩份雜誌和一份《申報》，教會學校內沒有政治課，沒有愛國主義教育，人們的思想很閉塞。我兒童時期對國內外形勢的知識，大抵來自晚上父親與親友來家吃飯時偶然聽到的隻言片語，我似懂非懂地記在腦中。當時正值國內軍閥混戰，民不聊生，他們茶餘飯後談論那些督軍，都帶著貶義，認為他們實際是帝國主義的走狗，他們只推崇吳佩孚將軍，說他廉潔，沒有多少私產，說他愛國。別的政客、軍閥都在天津租界內買有房子，一旦下台就躲到租界去求帝國主義庇護，獨他吳佩孚始終不入租界。他們不喜歡馮玉祥，說要不是馮倒戈，吳就能統一中國。後來事實證明吳愛國，日本大舉侵略中國，佔領華北後許多政客跳出來做漢奸，日本人多次請吳出面組織偽政權，被吳嚴辭拒絕並要求日寇撤出中國，包括東北三省，終被日本人害死。小時候聽到的話一直記住，不禁想起家庭的影響。

3

上學

我6歲上小學，先在女校，上啟蒙教育，兩位女教師一位姓壽，一位姓顧，很有耐心。我記得一個女同學姓徐，家境很好，非常文靜，她後來修道進了獻堂會，當修女，她說一直記得我。

第二年轉男校，我只記得姓諸和姓胡的兩位老師，因為我們每天望彌撒，早飯和中飯都寄在堂內吃。另一位同學名叫倪麟祥，住在董家渡，因為老天主堂本堂神父倪西滿是他的叔祖父，他也到老天主堂小學念書，早、中飯也寄在堂內。同桌的是杜子山老先生（教區聘的管理南市出租房的先生）和他的孫子。後來倪麟祥和我同進徐匯公學念書，同年（1932年）畢業，同時進小修院和大修院，他後來染上肺結核，過早去世。他的侄女倪瑤後來和我的一個表甥吳祖祥結婚，我和他們一直有來往。

至於小學生活，只記得在練寫毛筆字時，諸老師偷偷走到後面，在我寫字時用力拔我手上的毛筆，被他拔走，他就得意地教訓我，拔不走時（很少幾次）他就誇獎我握得緊。略大一些時寫作文，開頭老學大人口吻，寫：「夫人生於世」。

一次我和我弟弟上學時商量逃學，回家向母親說學校臨時放假，母親相信了。誰知道諸老師因為我兄弟倆沒有去學校，怕出了什麼事或我們病了，晚飯後特地到我家來看望。他一來，父母就知道我們撒謊逃學。一送走老師，父親頓時大怒，叫我們跪下，拿起雞毛撻子向我狠抽，說我是哥哥，必是我帶壞了弟弟，幸而母親在旁好言勸阻了他。以後，我們當然再也不敢逃學了。

1926年我10歲，父親把我送到徐匯公學小學部住讀。徐匯公學非常嚴格，開學以後就沒有假日，不能回家。我記得，進校後約一個多月，母親到校來看我。她先去找校長，校長是外國人，叫姚贊唐（Yves

Henry)。校長叫我去並對我說：「你媽要領你回去，因為你的外祖父70歲大慶了，我許你回家去。」母親領我出去後對我說：「我還是第一次看到這樣一個外國人，那麼長的鬍子，跟他說話好害怕。」又說，「我這是第一次說假話，就是因為我想你，要看到你，捨不得你，想帶你回去住兩天，才說你外祖父做70歲大慶，實際我說了假話，我一輩子就這一次說了假話。」小孩子不懂事，能回家當然開心了。事後我想，母親真愛我，她是好人，一輩子從不說假話，為了我的緣故她說了假話。我很感動。

4

當時的中國天主教會

上海天主教是法國耶穌會巴黎省的傳教區，在上海他們辦了許多教育慈善事業，中學、大學等等。他們主要的活動範圍在法租界。「租界」兩個字對現代中國人來說，有些費解，我兒童、青少年時代都生活在租界內。所謂租界就是我國政府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簽訂不平等條約，把某地的部分國土割讓（美其名為租借）給某個帝國主義列強，作為其領土，成為國中之國。租界內的行政、治安、稅收、財務、司法都屬外國人管轄，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中國人應向「租借」國納稅，遵守該國法律。租界內的警察一般由該國殖民地徵來，比如法租界的警察大抵是安南（現越南）人，英租界的是印度人。這些警察雖來自殖民地，居然也瞧不起我們中國人。法國的租界從黃浦江開始，南面是人民路，北面是愛多亞路即現在延安路，一直到徐家匯。從愛多亞路（延安路北面）到蘇州河北岸屬英國人，稱英租界。虹口是日本的勢力範圍，楊樹浦是美國租界。以後這幾個租界合併成公共租界。法租界還是法租界，是法國人的勢力範圍。租界是我國的恥辱。

那個時候上海天主教會活動的範圍基本上在法租界，不讓他人進來。當時上海教友有一個公教進行會，很活躍，很出名，有陸伯鴻先生、朱志堯先生等辦慈善事業，辦學校，傳教，可是當時法國主教規定他們不能在法租界活動。公教進行會辦的事業，譬如新普育堂、一心中學，在南市。他們開的醫院都在法租界以外。在楊樹浦區有耶穌聖心醫院，在北橋有普慈療養院，專收精神病患者，在閘北有聖母聖心醫院，在松江有若瑟醫院等。可就是不讓他們在法租界內活動。陸伯鴻先生認為徐匯中學只教法文，而在上海英文更有用，他去美國時邀請了美國加州耶穌會來上海辦一所中學，主教姚宗李（Prosper Paris，法國人）很生

氣，表示反對。陸先生急忙趕到羅馬親自請示教宗，教宗批准了，上海法國耶穌會士不能反對，但讓他們開設在公共租界內，取名金科中學。

那時整個中國天主教會也根據傳教士所屬國家、修會被劃分。譬如江南省歸法國耶穌會，及後江南省分成江蘇、安徽兩省，江蘇仍歸法國耶穌會，而安徽則歸西班牙耶穌會。河北南部也歸耶穌會，其中獻縣歸法國，大名歸匈牙利，景縣歸奧地利耶穌會。內蒙古這一帶是比利時聖母聖心會的傳教區域。山東主要歸德國人。美國人來得晚，他們就進駐廣東的江門教區、梅縣教區。遣使會來得早，在北京、天津以及河北北部、浙江、江西省均有教區。方濟各會一部分在山東地區，一部分在山西。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在東北、四川、廣東、貴州。奧斯定會在湖南。愛爾蘭的高隆龐會在湖北漢陽和江西南城。聖言會來得較晚，在山東、河南和甘肅部分地區。

中國的傳教區既根據修會來劃分，中國教會的事務也就由各修會控制，決策權在國外。各國政府以保護僑民為理由，也在控制各傳教區。法國政府以擁有羅馬教宗賦予的保教權名義，更對教務進行干預。中國天主教會不在中國人的手中。各修會沒有一個通盤的規劃，各自為政，不利於福傳。教宗本篤十五世(Benedict XV)想改變這個局面，發表了一個《夫至大》(*Maximum Illud*)的通諭，強調傳教區重點應是培養國籍神職人員，務使國人治教。在中國的外國主教反應極冷淡，扣住不傳達，只有四川的光主教(de Guebriant)積極響應，教宗就任命他為巡閱使，代他巡視中國的教會。他去羅馬作了匯報，教宗決定派一名代表常駐中國。馬相伯得到原文後譯出，通諭才得流傳。

徐匯公學 (1926-1932)

1926年9月我進入徐匯公學小學部(當時稱徐匯公學，1933年為了向國民黨教育局立案改名為徐匯中學)，舍監是張家樹神父(他以後升為校長，我1937年入徐匯中學出試時他為院長，1982年我從監獄回申，他是主教。我一生關鍵時刻總有他)。當時學校紀律很嚴，1927年國民黨北伐軍打到上海，學校臨時停課，放學生回家，這時我的厄運開始來了。4月8日星期六下午，我母親感到身體不舒服，躺在床上，實際是腦溢血，一會兒右肢麻木，說話不清楚，父親請了何理中醫生來，他診斷後打了幾針。星期天又過來看了一次，說好一點了，星期一早上他看後說已有好轉，爸爸就把我打發到堂裡去請神父為我媽做彌撒，可是回來的時候只聽見裡邊正在號啕大哭，知道母親已過世了，我沒有能夠送終。

一年後，我在學校時，父親拿著一盒巧克力糖來看我。原來父親做買賣失敗，把自己老家的房子和上海全套紅木家具賣掉，說要出遠門去了，好幾年不回家，給我留下一筆錢放在徐匯公學，讓我可以把中學念完。我母親是1927年4月10日死的，那時我不到11歲，今日我又要失去父親。父親拍拍我的頭走了，我木頭似地站著，看著他的背影逐漸消失，一個人含著淚回到自修室去，低頭流淚。

我幸福的童年生活就此結束，很短，十年左右。但我母親的熱心敬主、溫良慈愛，以及父親的沉默寡言和慷慨大方，深深地影響了我。

到放暑假了，別的同学回家，我無家可歸，孤零零地留在學校。我家富裕時，常有親戚帶些食品到學校來看我，父親失敗了，沒有誰再來看過我。過了一年，我父親出現了，他找到了新的工作，沒有過去那麼好，收入也不高。他一個人住在單位裡，讓我姐、我弟和我住在學校，

到了寒暑假他去旅社租了一間房子，讓我和弟弟兩個在一起，伙食也包在旅社裡，我們一個星期一次去父親工作處領取零花錢。

可是1931年我父親病了，肺炎（在現在來說肺炎不是什麼大病，青黴素一打就好了），那時沒有特效藥。他先到當時的廣慈醫院，後來看不好就出來，臨時住在我的外祖父那邊，請中醫看。我知道父親病重，向校長張家樹請假去看父親，張不批准，就在那天晚上快睡覺了，忽然張叫我去，說我的姨夫來了。姨夫告訴我，父親病危。把我領到外祖父家裡時，父親已經去世，我也沒有能夠送終，造成終身遺憾。隔了一天請崔神父（Baumer）來做追思，牆上掛著父親的照片，本堂神父說這個不允許，叫我們拿走，說這是羅馬的命令。真是莫名其妙。

那天是1931年4月11日，我們姐弟三人成了孤兒。父親死時有一些錢留給我們，不太多，我記得外祖父向姐姐借去了兩千，姨夫和舅舅來跟我姐姐說：「你們把錢存在銀行裡利息非常低，交給我們去給你們找一個更好的地方存，利息高。」姐姐把銀行裡的3300塊錢都交給了姨夫和舅舅，誰知道他們當天就把這些錢拿到賭場給賭光了，不要說利息，本錢也沒有了。多年後，另一個阿姨向我承認，在我父親去世時，她也乘亂取了1000元。1945年，在我聖神父的前夜，伯父來看我說，我父親放在他身邊有4000塊錢，他怕我亂花不給我，說：「當時你們小，不給你們。1931年4000法幣，現在幣制改了，兩折一，4000變2000，今天給你。」他又說，1931年的4000法幣，可以從黃浦江邊擺800桌酒到金家巷，今天的2000法幣你可以乘三輪車去四川南路走一個來回。我伯父叫我收下2000元法幣，並說：「我們清了。」我姑母找我姐並對她說，「老家裡埋有兩罈元寶，是你們祖父給我的，不是你們的」，姐姐和她一起去在床底下的確挖出了元寶，她全部拿走。事後姐姐向我說：「既是給她的，為什麼爸爸在世時她不來取？」我說：「我們的親戚為什麼都那麼狠心？」這樣一來我們真是一貧如洗了。姐姐輟學了，我們家沒有了，錢也完全沒有了。

6

堂叔祖父金福山

這時我的一位堂叔祖父金福山出現了，他和我祖父一樣，與人合資開設一個專供外商的副食公司，名「同茂」，英文名 Dombay & Son，規模大，生意興隆。他為人一直慷慨大方，曾捐鉅資在徐匯公學設立了一個獎學基金，專門幫助那些貧窮家庭的少年。他也虔誠恭敬天主，參加公教進行會，休假日去郊區傳教。他見我們三個孤兒可憐，就對我們說：「你們住到我家裡來吧！」我們去了，他待我們如同他的子女，我們有了安身之處，我迄今仍感激他。在彌撒中紀念亡者時，想到他和待我特好的他兩個女兒，一個叫金英修，是獻堂會修女，曾做仿德中學校長，另一個叫金德修，終身沒有結婚，撫養她妹妹金惠修遺下的兩個小孩子成長。

姐姐在父親的遺物中，看到一個我們叫他叔叔的人曾向父親借過600元錢的借據。這個人在洋涇鎮上開有木行，姐姐拿著借據去找他要錢，竟遭他趕出門外。姐姐向金福山說了，金福山叫他自己的法律顧問寫了一封律師信去催，他馬上乖乖地把600元送來，金福山為我們存下，我們又有一筆錢了。姐姐後來經人介紹去華懋公寓(後改名為錦江飯店)工作，管理一個圖書室，室內圖書供房客借閱，工作輕鬆，月薪70元，不低，姐姐更有條件照顧我了。姐姐很愛我，口中常說：「大弟弟好。」她說等我聖了神父後，她就進修院當修女。

1935年12月8日金福山去大場宣傳福音，彌撒後，用完早餐走向汽車時，寒風一吹突然倒下，送到醫院已無法搶救，年僅53歲。他聖名若瑟，我每天彌撒時都想到他。像他這樣的好人，一定已在天國永遠享見天主聖三。

兩位姐姐：陸納英、榮德先

我的姨母是拯亡會修女，在啟明女中和徐匯女中教數學，有一個她最喜歡的學生，名叫陸納英。姨母在我父親去世後很想幫助我，去找陸納英，向她說：「我最愛的外甥成了孤兒，是不是你認他為弟弟，你媽認他為乾兒子？」陸納英回去和她媽說了，她媽請了我姐姐去談，得我姐姐同意，陸納英領我到她家，拜見了陸太太，叫了她一聲媽。陸納英後來一直照顧我，去修院探望我，製衣服送給我，直到我進耶穌會為止。

陸納英，1908年生，聖名加大利納，所以叫納英。她父親名叫陸伯鴻，聖名若瑟，有名的企業家，曾是上海市電力公司、電車公司的總經理、南市自來水公司總經理、閘北水電公司總經理。除了租界外，所有上海華界的水電都掌握在他手中。他又創辦和興鋼鐵公司、大通輪船公司，他兼總經理之職。他尤其是大慈善家，負責新普育堂，收養孤兒、老人、病人約二千餘人；他創辦了普慈療養院，專收精神病患者；創立楊樹浦耶穌聖心醫院、閘北聖母聖心醫院、松江若瑟醫院。他也是個教育家，創辦董家渡公教進行會小學、南市一心中學、嘉興明德女中，籌建楊樹浦女子職業中學。最突出的，他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每天去董家渡天主堂輔彌撒，路過聖堂必去拜聖體，汽車內放有《師主篇》，抽空念一段。他曾是全國公教進行會 (Action Catholic) 的會長，休息日去附近縣、鎮宣傳福音，建立了多所教堂；他和上海幾所醫院掛鉤，下班後去給病人講天主教要理，勸他們領洗，羅馬教宗封他為袍劍爵士，1937年12月30日不幸遇刺身亡。

陸納英在徐匯女中畢業後，她的父親叫她去由他創立、由修女管理的嘉興明德女子中學當校長，陸納英自覺學歷不高，要求進大學繼續讀書。但當時上海惠濟良主教 (Haouisée) 規定，凡讓子女入非天主教辦的

學校念書的不准領聖體。這是極嚴厲的措施，當時天主教沒有辦女子大學，震旦大學當時又不收女生，公教家庭的女兒就受不到高等教育，這是極不合理的。陸納英為自己為其他公教女生打抱不平，決心衝破這不合理的規定，但他父親是楷模教友，怎敢違背主教之命？陸納英就獨身一人去見惠主教，據理力爭，取得惠的同意，考入蘇州基督教辦的東吳大學法律系。四年努力，取得學位。這時她父親辦的女子職業學校已竣工，命她當校長。同年日寇侵略我國，上海淪陷，她父親被刺死，她悲痛之餘去比利時留學讀社會學，回國後致力於教育事業，「文革」中遭迫害致死，「四人幫」倒台後始得平反昭雪。她這樣一個傑出的人才生不逢時，未能施展才能抱負，令人惋惜。

我的姨母張望貞修女特別喜愛的另一個女生叫榮德先，榮和陸納英在徐家匯讀書時成為好友，陸略大於榮，以姐妹相稱。她們兩人和我姐金慰萱也是朋友，我在陸家認識了榮，她是無錫人，其父榮子威在上海經商。榮德先在徐家匯啟明女中畢業後考入陳光甫創辦的上海商業銀行為職員，經人介紹嫁到朱家，丈夫叫朱義生，曾留學美國學理工，在美時認識瑪利諾會年輕的會士華理柱 (James Walsh)，並多次去過他家作客。華到中國後，在廣東梅縣一帶宣傳福音，後被任命為江門教區主教。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他回到美國，1948年隨紐約史貝爾孟 (Spellman) 樞機來中國訪問，史樞機把他留在中國，教廷駐中國公使黎培里 (Riberi) 創辦中國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Catholic Central Bureau，簡稱 CCB)，任命華為秘書長，指導和協調中國天主教事務。CCB 設在上海岳陽路，1951年上海軍管會勒令 CCB 停止一切活動，逮捕了若干人，華留在中國不走，當時已無國外津貼，生活清苦，榮德先的丈夫朱義生住在 CCB 附近的永嘉路，經常帶食品去探望華，引起政府注意。1958年人民政府以間諜罪逮捕了華，同時以當華情報員的罪名把朱義生逮捕並關在提籃橋監獄。已判刑在牢內做勞改犯的蔣衛琳神父曾見過朱，華被判刑二十年，尼克松總統來訪前夕，獲中國政府提前釋放，而朱卻死在監獄。

朱義生的父親朱志堯是與陸伯鴻齊名的大企業家，曾創辦同昌紗廠、求新造船廠、合眾碼頭倉庫公司等，也是大慈善家，一生資助的窮人不計其數。一次，朱志堯賣掉在浦東的一塊土地得到鉅款，立即把它捐給教會和慈善機構，當時他向他的子女說：「我已在天上給你們買了大房子。」他是教友的楷模，全力幫助上海教會與其弟海門教區朱開敏

主教以及其他教區，他也任上海公教進行會副會長，羅馬教廷封他為聖西爾物斯德賚騎尉勳位、三等嘉禾章，1955年去世，享年93歲。像他這樣一生事主愛人，應列入聖品。

榮德先與朱義生有一子五女，其子朱恩榮要求修道，榮慨然同意其入耶穌會，後升為司鐸，在台灣從事青年工作，極受學生們愛戴。

通過陸納英和榮德先，我多次接觸陸伯鴻和朱志堯，他們的敬主愛人對我影響很深。

當時我們讀書沒有今天的兒童少年辛苦，沒有那麼多的功課，那麼多的作業，我們有充分的時間休息。我的記憶力好，老師佈置背誦的課文，我讀三遍就能背出，費不了多少時間，餘下的時間就是看小說。古的、新的、中國的、外國的都看，什麼《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儒林外史》、《隋唐演義》、《鏡花緣》、《七俠五義》、《小五義》、《彭公案》、《施公案》、《福爾摩斯》、《魯賓遜漂流記》，林琴南翻譯的各國名著，以及新作家如胡適、魯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丁玲等等，一學期下來我買的小說有一大筐。我喜愛開明書店和北新書店出版的書刊，也看鄒韜奮編的《生活》周刊。

徐匯公學由法國傳教士創立，教法語。到了高中，除了古文之外，一切課程包括數理化都用法文講，中國老師也用法文講，中國地理由一名法國人用法語教法文寫的地理課本。這種教學方式在今天是不可想像的，也可說是典型的殖民主義式教育。無論如何，我學會了法文，高中畢業時我已經能看原版的法文小說。

1932年夏，下一步怎麼走？這是擺在我面前必須解決的問題。

第二部分

棄家修道

8

修院生活：耶穌聖心修院 (1932-1935)

1932年，我在徐匯公學畢業，報考震旦大學被錄取了。學校為我們在畢業前組織了一次避靜，做聖依納爵神操，內有一個默想題：「兩旗對立」，即有耶穌君王的旗幟和惡魔的旗幟，在爭奪世人，耶穌締造和平拯救世人，而惡魔散播仇恨製造紛亂，耶穌需要我們合作完成他的救恩計劃。我動心了，決意跟隨耶穌去做他的戰士。

我小時天天望彌撒，回到家裡學神父做彌撒，把報紙剪成祭衣穿了，教弟弟輔彌撒。我母親看了很高興，常說培養我做神父，也採取了措施，凡親戚家結婚，她只帶我弟弟去，不讓我去，說：「你一心一意爭取做神父吧。」我長大一些，做神父的想法仍留在心中。

1932年9月3日我進了聖心修院。和我同時進去的共有二十二人，據說從來沒有這麼多的青年要求修道。二十二人中十名後來聖了神父，六名還俗，六名因病早逝。

聖心修院實際是一所文學院，除了神修功課外，主攻拉丁文，早上兩節課，下午兩節課，此外學習中國古典文學、教會史、教會禮儀、教會音樂等。第一年由黃子昂先生教拉丁文入門，他是位謙謙君子。第二年的老師是當時的理院舒神父，法國人，名杜蘭德 (A. Durand)，主要讀羅馬文豪西塞羅 (Cicero) 和凱撒大帝的著作。第三年由光神父 (Gandon) 教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 (Tacitus) 和大詩人維吉爾 (Virgil) 的長詩《田園頌》等。光神父是有名的徐匯藏書樓外文部主任，他常為我們介紹歐洲尤其法國新出版的書，並勸我們也購買。舒神父兼理院負責我們的學習和生活，他為人忠厚、和藹可親，嗜好音樂，給我們上音樂課。他對我極好，但我使他失望。我嗓音洪亮，他以為我是塊好料，有心培養，誰知我有好聲音卻沒有好耳朵，五音不分，他只得放棄。上音樂課時，叫我一個人坐在最後一排，不准我開口，免得起擾亂的壞作

用。修院有一個很大的花園和操場，旁有匯師小學，他在小學生裡挑選二十名左右的兒童，組織一個歌唱班，每天下課後，這些學生來修院，他親自教他們唱聖歌。當時的小學生下課後沒有什麼作業得做，樂於到修院來玩。他也組織了一個天主教學徒聯誼會，讓土山灣工廠的非孤兒學徒以及附近兩個小工廠的青年學徒星期日來望彌撒，彌撒後踢足球、下棋，並發給他們糖果。舒神父讓我負責這批學徒們。他生日前，我們選了幾首歌練習，準備在他生日時唱給他聽，祝賀他。我們練習時唱得不够好，他在辦公室聽不下去，下來向我們說：「還是我自己來教吧！」他就指揮我們，他生日那天，我們唱時見他滿意而笑。

舒神父每星期天晚上給我們講神修課，他強調我們應有三個S，第一個S是 Sanctitas 聖德，第二個S是 Scientia 學問，第三個S是 Sanitas 健康。他說聖德毋須強調，你們來就是為修德成聖的，是一生應追求的，健康與學問應相輔相成，因為有了健康才能獲得學問，*Mens sana in corpore sano*，學問存在於健康的人身上。他再三說，三個S應牢記在心。

舒神父確是忠厚長者，但他沒有實權，一切得聽姚贊唐的命令。姚是我在徐匯公學讀書時的院長，後又成為我修道時的院長，再後成為耶穌會會長和上海教區副主教九年，接著又當了兩年上海的代主教，長期居於上海教區高位。

我姐姐在拯亡會管的潛德小學教書，1934年的9月9日發高燒，我趕去看她，叫了出租車把她送到聖心醫院，在那邊我陪她說了半天話，然後回修院。可第二天一早醫院打電話告知我，姐姐死了，莫名其妙地死了。姐姐在她生日那天，本名瞻禮前夕去世，是聖母接她去天堂，在世只二十一年。姐姐死我也沒有送終。姐姐的死對我來說真是傷心透頂，一個如此聰明、如此美麗的姑娘說死就死，我覺得世界上事情空而又空，虛而又虛。沒有什麼可追求的，沒有什麼可留戀的。

我還有一個弟弟達義，生得聰明、漂亮，雙親死後沒有人管束他，他交友不慎，好玩，出入娛樂場所。在徐匯中學不守紀律，校長張家樹叫我去，說學校得除他名。我把他送到震旦大學中學部住讀，隔不了幾個月，學校教務長喬典愛(Gaultier)來找我說他不守校規，學校決定除他名。

我替他找了工作，他上不了幾天班就辭職不幹了。他也不來找我，我到處打探，不知他的下落，好像是人間蒸發了。我喪父、失母、亡姐，弟死未見屍骨，接二連三的打擊，我的命確實苦。

我成了孤兒，沒有親人，舅舅、伯父、姨夫、外祖父還要趁火打劫。伸手幫助我們的堂叔祖父金福山，不久也中風猝死了。在這個時期，我一貧如洗，舉目無親。在修院修道，假期的時候神父不讓我們留在修院裡，茫茫四海，什麼地方才是我的棲身之所？所以我只能打游擊，到一個親戚家住一兩天，再到另一個親戚家過一兩天。這些是比較遠的親戚。我家境好時親朋不斷，此時又是一番情景。常來常往的表兄，就是路上相遇，也只當沒有看見。這對我打擊很大，覺得世態炎涼，真是「窮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自古如此。後來我最喜歡的小說就是《儒林外史》范進中舉那一段。現在想來，一生中，人們多次把我置於絕境，同時天主派好心人及時幫助我，使我絕處逢生。我深深感到，小時窮，青年時遭挫折、多磨難、過貧窮生活，對我來說也是天主的降福，使我有同情心，心裡能想著窮人，也想著為窮人做一點兒事，想交一些窮朋友。人生經歷雖然痛苦，但也讓人看清很多東西。

這兒順便把後來發生的事寫出來。我父母的棺材留在浦東金家巷，我姐姐則葬在上海七寶附近天主教徒辦的一個公墓內，1951年我從歐洲回國，把父母和姐姐移葬在上海天主教息焉公墓內，是榮德先出錢買的墓地。我被逮捕時，公安局抄走了我所有東西，包括父母姐姐的遺像。1982年，我回申想上墳，人家告訴我息焉公墓已變成野生動物園，我的祖墳沒有了，父母姐姐的遺骸不知去向。我向公安局索還被抄走的東西，他們回答說，「文革」時公安機關也被造反派清洗，抄走的東西已無法找到。這樣我最親愛的人真的無影無蹤了，我成了世界上最窮的人（我身邊只有姐姐通功單上印的照片，是我早期寄給國外友人，他保存下來，我逮捕釋放後他寄還我的）。

上面說了在我姐姐病故後，除了陸納英，還有榮德先來看了我，她向我說：「我會做你的姐姐，像你姐姐一樣照顧你。」她沒有食言，在我最困難的時候，她冒險照顧我，親戚靠不住，朋友卻極忠信，我一輩子忘不了陸納英和榮德先兩位，以及後來認識的一家德國人。

聖母聖心修院 (1935-1937)

1935年8月底我進入聖母聖心修院，這時大小修院都脫離了姚贊唐的管轄，有了自己的院長，此人名叫能慕德 (Felix Maumus)。他比姚更慈祥，多才多藝，剛讀完神學就被委任在神學院教神學，又當上教區的總賬房，管理全教區的財務，後調任四川南路若瑟堂當本堂神父二十四年，他憐貧惜窮，很受教友愛戴。他受命在大通路(一條很短的馬路，北面有新開路圍住，南面有山海關路封住，名為大通路，實際名實不符，今已更名為大田路)建造聖女小德肋撒教堂和附屬男女中小學，他自己精心設計，悉心監工。他以為自己會當本堂，堂建成後，主教把此堂交與教區神父管理，他調到修院工作，當院長兼教哲學。他是個音樂家，既能作曲又能製作樂器，把許多時間放在製造管風琴上，大管風琴是極不容易製造的。他是神學家、經濟學家、設計師和音樂家，如果不分散精力，專攻一門，肯定會有更大的成就。

聖母聖心修院也稱大修院，修生先讀二年哲學，中間去教區實踐一年，再讀四年神學。教神學的老師有晁伯英 (Payen)，他是倫理學家，中國著名的婚姻問題專家；還有史式徽 (de la Serviere)，他也是歷史學家，寫過《江南傳教史》，兩人都是法籍；西班牙籍的涅托 (Nieto) 和巴爾卡塞爾 (Valcacer) 先後教信理神學；教哲學的有 Andre 和能慕德院長，另有姚贊唐以及兩位國籍神父：張登堂教社會學，張維屏教天主教歷史。

1931年，惠濟良接替姚宗李為上海教區宗座代牧，桑黻翰接替山宗泰為上海耶穌會會長兼上海教區副主教，兩人配合默契，決心讓上海教區的福傳工作再上一個台階。他們認為最重要的是培養人才，除了在法國學習的吳應楓神父與王昌祉神父外，他們還派遣了耶穌會會士張伯達與陳雲棠去英國念哲學，並安排他們在念完哲學後去法國巴黎大學，一個念文學，另一個念數學。惠濟良、桑黻翰又派教區神父張登堂與張維

屏兩神父去羅馬與巴黎，一個念社會學，另一個念天主教歷史。又派錢寶森修士去羅馬傳信大學念書，他們說這些人回國後會設立一個天主教出版社。桑黻翰決定把徐匯藏書樓改建成一個新式的圖書館，對外開放。他們的意願是重點從事文化福傳工作，也想改變原來國籍神父只在郊區工作，市區傳教工作牢牢掌握在耶穌會士，尤其法籍耶穌會士手中的傳教方策。1933年惠、桑決定把上海教區的主教座堂、上海教區最重要的堂區和活動中心董家渡交給國籍神職人員，任命張伯鐸為院長，耶穌會士退出，堂區旁的仿德女中交給國籍修女會獻堂會管理，又把才建好的位於市中心的聖女小德肋撒教堂也交給國籍神職人員，於是上海教區出現一派欣欣向榮的新氣象。

然而好景不長，1937年夏，桑黻翰六年任期已滿，調去揚州做總鐸，會長由姚贊唐接代。這時日寇大舉侵略我國，上海淪陷，姚贊唐命當時暢銷全國的聖教雜誌停止發行，把從美國回來的吳應楓調去蘇北工作，把張登堂調出震旦大學，去張涇做本堂；把張維屏調離修院，去重慶南路的磐石小學當校長；不讓王昌祉教神學，任命他為耶穌會文學修士的中文老師。上海教區明顯倒退了，這是後話。姚當了九年的會長，惠濟良死後，他又任上海教區代理主教二年，主宰上海教區十一年之久。

在聖母聖心修院的二年，除了念哲學外，星期日我辦了一個徐家匯天主教的青年活動小組，匯師小學的楊維時神父大力支持，把不用的禮堂作為我們的活動場所，參加的有在各單位工作的青年約四十名，每星期日我給他們作一次講座，組織他們參觀，從事娛樂活動。

一天，能慕德神父找我談話，我們與外人來往的信件他都拆閱，他中文修養很好，我們會客也得他批准。他向我說，陸納英來看我的次數不少，來往信件也多，他正在考慮怎樣處理，他又說，這樣發展下去不利於我的修道，要我好好考慮。我向他解釋，陸以姐姐身份照顧貧困的我，我作為弟弟非常感激她、佩服她，她家如此富有，我從來沒有其他想法。能慕德說，還是剝住為好，否則，就常規而言，應是媒人出面的時候了。我聽了這話，不禁大吃一驚，又回想我在聖心修院時，陸納英去看我次數多時，舒理院告知她不應打擾我，陸沒有告訴我，是門房的顧老伯事後向我說的。聯繫了舒、能兩人的態度，我只得向陸說，我現在功課緊張，沒有時間和她通信了。陸不是傻瓜，不再來修院了，但對我仍以姐姐的身份熱心照顧，在我心中陸納英一直是很偉大的。

徐匯中學實習 (1937-1938)

現在回頭再講聖心修院的生活。修院裡無報紙可閱，當時中國還沒有無線電廣播，來往書信都由外國神父檢查，我們與世隔絕，閉塞得很，我們受的完全是封閉式的教育，我們知道的消息靠親友來訪時得到，或假期回家翻閱舊報紙獲得。

負責我們中文學習的徐宗澤神父，從外面的一個大學請來一位中文教授朱天梵，每星期來教兩節課，我們的學長請他在正式講課前跟我們講一些國內外形勢。從他那兒我們略知院外的國家大事，蔣介石當時不抗日，不得民心，朱教授充滿反蔣的情緒。他寫得一手好字，上海有好幾家商店門前的大匾都是他的手跡，我們修生中有幾人請他指點練字。

1931年9月18日，日寇侵犯東北，蔣介石為了「剿共」，把東北三省拱手讓與日寇。日寇在1932年1月28日對上海發動戰爭，十九路軍奮勇抗日，為祖國為民族而戰。周濬良修士在聖堂內掛了國旗，和全體修士們為祖國求天主。理院神父向姚贊唐院長匯報，院長企圖阻止，說什麼聖堂內不准掛國旗，命令拿下。周修士拒不服從，並據理力爭說：「四川南路天主堂掛著法國國旗。」姚贊唐院長叫周修士的父親前來，說他的兒子沒有聖召，修院決定辭退他。周家很富有，周的父親托海門朱開敏主教推薦，周濬良修士便自費去羅馬傳信大學念書，畢業時正值抗戰，不能回國，于斌主教收他為南京教區神父，派他去美國芝加哥管理華僑教友，後死於美國。當時是外國傳教士掌權，我們愛國有罪。

1935年我在聖心修院畢業，進入母心修院讀哲學兩年。1937年7月我獲分配到徐匯中學出試，即實習，教初二的法文，並負責初一、初二天主教學生的訓導工作。

五年的修院生活平靜地過去，正如我上面講過的，最使我為難的是暑假期間修生必須回家，院內不讓住宿，我無家可歸。我堂叔祖父死

後，他的子女分了家，我當然不能去，於是只能打游擊，凡待我好的人家，我就去住幾天，再轉移到另一家。我曾於1937年7月16至25日去陸納英家住了十天。現在陸家指著我住過的房間，告知探望她家的客人說，這曾是金魯賢住過的。另有兩家是我隔幾房的親戚，一名金鶴聲，一名金鶴汀，我叫他們為叔叔，他們曾熱情接待我，臨走還塞給我零花錢，他們的後代迄今仍來看我，我很感激他們。

最使我不解的是，親伯父金信德比金鶴聲、金鶴汀富有，可每年假期我去看他，他只是擺出長者的架子訓我，給我上節約課，不讓我坐下。我給他拜年，也從來不給我一分錢。他是我唯一的真正意義上的長輩，我爸爸的親哥哥嘛。

1937年七七事變，日軍佔領北平，8月13日，日軍又攻打上海，中國守軍當即予以猛烈反擊，淞滬會戰由此開始，閘北、虹口、江灣、寶山變成戰場，日寇狂轟濫炸，大批難民湧入租界。徐匯中學也敞開校舍，校舍不夠，就在操場上搭起簡易的棚屋，盡量接收更多的逃難者。我們盡力幫助接待，國破山河在，亡國之危就在眼前。

在徐匯中學出試一年，過得很愉快，徐匯中學按照耶穌會傳統方式管理，一個字可以說明：「嚴」。學生早上五點半起身，集體整隊去聖堂望彌撒，集體自修，集體運動，傍晚集體公念晚禱，睡前舍監訓話。學生們來自公教家庭，都比較富裕，能承擔昂貴學費，家庭教育也很好，用功、服從、友愛，很少有調皮搗蛋的。他們的生活一如今天我們的修士和獻堂會初學修女，我從他們身上看到天真、認真、活潑的美德，我是他們的老師，他們也在影響我，我暗暗向他們學習，決意進一步把自己奉獻給天主，進一步棄絕自己，有了進修會發三願的念頭。我迄今還記得他們，他們後來有三位成為教區神父，兩位成為耶穌會士，有的成為憐貧惜窮的好醫生。

入耶穌會：初學兩年 (1938–1940)

出試結束前，修院院長通知我將去耶穌會神學院攻讀神學，那兒可以考取羅馬高教部承認的神學碩士學位，並囑咐我自修希臘文。但我做了神操，鄭重考慮之後決定加入耶穌會，我向耶穌會會長姚贊唐寫了申請書。我辭別了師友，處理了我私人所有的書籍。

1938年8月30日我進了耶穌會初學院，同時進入的有兩名震旦大學畢業生，一個名叫楊賚詮（震旦醫學院畢業，在初學時即病死），另一個名叫章顯猷（震旦理工學院畢業，1955年9月8日被捕判刑，長期在安徽勞改，改革開放後被聘在安徽師範大學教書，死於安徽）；兩名匯師中學的畢業生，蔡良申、范忠良（今日上海教區地下主教）；一名大修院的修生陸達源（小我兩歲，後來被捕，刑滿釋放後去加拿大定居，已故）；四名徐匯中學畢業生（徐簡谷、陳才君、鄭聖沖、周德福，後兩人長期在台灣工作，已故）。這麼多的初學生，在上海耶穌會歷史上是空前的，以後也沒有。初學導師為法國人山宗泰（Eugene Beauce），曾做過耶穌會會長和上海教區副主教，副導師為張士泉神父（七寶南張人），他年老，高度近視，寫過許多書，其中一本名為《一線之光》。

初學院設在總院最高一層，都是大房間，一間作臥室，一間作自修室（十幾人擠在一間），一間大的休息室，一間課堂，還有一間圖書室，百分之九十是法文書。自修室內每人有一張小桌，寫字台與跪凳成一體。

初學院的訓練包含：

1. 一個月避靜，即神操，這是訓練的中心；
2. 不帶錢，步行去各地朝聖一個月；
3. 給兒童講要理兩個月；
4. 去醫院侍候病人兩個月（我去的是安當醫院，是仁愛會修女專為最窮的人們開設的，在重慶路，來往得各步行50分鐘）；

5. 下伙房幫廚兩個月；
6. 打掃大樓的衛生兩個月。

每個月有一次「仁愛」行動，所謂仁愛行動就是幫助行動，被幫助的同學跪在課堂中間，其他初學生輪流逐個發言，指出他的缺點和違犯紀律的次數。被幫助者端端正正地聽著，不能解釋，最後還要感謝大家的仁愛。所謂休息就是涼台上集體散步。一起進堂公念經文，公望彌撒，公領聖體，公念聖書。除了三頓飯外，不可吃零食，身邊既無零食，也無一分錢。除了休息時間外，絕對守默靜，不准說話。除了上廁所，嚴格的集體行動。這樣的生活是導師法國人山宗泰五十年前在本國初學時的規定，完全照搬。他20來歲來中國以後沒再回去，不知道本國已改革，這種訓練卻使我十七年後對監獄生活不感到太痛苦。

當時神修的觀念：為了修德成聖必須不斷與三仇鬥爭。三仇即肉身、魔鬼、世俗，肉身居首位，為此必須與肉身鬥，控制肉身，壓制肉身，磨難肉身。進初學院後發給每人一根苦鞭，用以鞭打自己，一個帶尖頭的短鏈，縛在臂上（現在不行了，早已沒有人用）。我們同睡在一個大臥室內，誰鞭打自己，誰打得猛，其他人都能聽到，知道得清清楚楚。

當時上海耶穌會士絕大多數是法國人，我們吃西式飯，初學神師也教我們如何進食，吃飯時，尤其喝湯不能出聲。吃水果時，應用刀削，用叉吃，不准用口咬；吃麵包不准用刀，只用手掰。伙食按常日、慶日、節日區分。節日有三個酒杯，慶日有兩個。我首次吃奶酪時感到臭，尤其是節日飯桌上的奶酪出奇的臭，但慢慢也愛吃了。有時上進食課，神師單獨和我們一起進食，重點教我們怎樣把一隻整雞分成六份。睡覺前讓我們每人喝一杯金雞納霜粉的乾紅酒。

我們用餐時不准談話，有人朗讀，中午念法文書，晚上念中文書。初學生輪流上台念，念錯、發音不準時，就有一位負責的神父高聲令重念。神師教導我們吃飯時精神不應集中於吃，應想著學習或提高神修。回顧前半生，在飯廳內聽到的都是好書，的確學到很多東西，增長了不少知識。

吃飯時，有的會士想做補贖，伸手跪在飯廳中說自己犯了錯誤，請集體寬恕。也有的走到其他會士前跪下親吻人的腳。初次見到曾是我老師的會士或年老的神父跪著吻我的腳，我很感動。還有的會士跪在食堂

中，在一小桌上用餐等。但我心想，用餐本是放鬆自己，享受美味的時刻，為什麼搞得這樣嚴肅？據說梵二會議後，耶穌會已改了。

上述六個訓練，我們做了五個，其中外出不帶錢，步行到各地去朝聖，因當時日寇侵略，戰火連天，無法實行。在院中掃地時，我以前的學生見我剃了光頭，穿著舊衣服低頭掃地，就大聲說：「金修士落難了，大家來看！」使我很難堪。步行去醫院服務，我們不懂醫學常識，姓何的修女只叫我們為來治病的窮人（大抵是苦力、拉黃包車、拉板車的病人）洗腳，抹抹紅藥水等粗活。去伙房幫廚，主要是打掃衛生和削土豆皮，不准我們和工人交談。

在我們初學院的高班有兩名同學，一位姓張（已忘了他的名字），很文靜，一位姓陳，名鳳鳴，橫沙島人。陳很會投機，神師叫他做學長，他投神師之好，不斷打小報告，找同學違規之事，逐一匯報，深得神師的歡心。他對人嚴，對己卻極自由主義，姓張的看不慣，憤然離院。在陳後，初學神師任命陳才君為學長，他自命不凡，比陳鳳鳴更會打小報告，認為自己應是神師的耳目。但他很神經質，神師不叫他做學長，他認為神師不信任他，情緒一落千丈，一言不發，整日呆坐，精神病發作，送到普慈精神病院治療三個月。回院後，初學神師照顧他，遷就他，仍叫他再做學長。他頓時精神振作，努力工作，還是打小報告。發初願後，他的精神狀態仍不正常。1952年討論他能否接受鐸品的會議上，有參議員表示反對，但我表示同意他晉鐸，他得以接受鐸品，這是後話。

初學導師認為我有「傲氣」，自恃年長，資格較老，時時處處打擊我的「傲氣」，我當時很痛苦，多次想離開耶穌會回修院，在一次最痛苦時，我隨意翻開新經，看到了《路加福音》第9章第62節耶穌的教訓：「手扶著犁向後看的人，不配進神的國。」於是我決心留下，堅持到底。

一般會士都說：「初學兩年是一生中最幸福的兩年。」對我來說，初學兩年是我修道生活中最痛苦的兩年。

然而初學兩年我有很大的收穫，給我的神修生活打下了扎實的基礎，我無人可訴苦，只能多祈求。我們有一個圖書室，我看了許多為我一輩子受用的書。這些是：萊昂斯·德·格萊梅森（Léonce de Grandmaison）寫的《耶穌：他的人格、他的訊息》（*Jésus-Christ: sa personne, son message, ses preuves*）和婁白東（Jules Lebreton）神父寫的《耶穌的行實和教訓》（*La vie et l'enseignement de Jésus Christ Notre Seigneur*）、《基督之

光》(*Lumen Christi*)、《你是唯一聖者》(*Tu Solus Sanctus*)和《最後晚餐後的訓辭》(*Le Discours après la Cène*)。

這幾本書我看了好幾遍，我的神修生活集中於耶穌基督，他是我信仰的基礎。我知道人的推理不能完全證明造物主的存在，我信基督、天主的聖言，從而深信天主和天主的愛，基督是從天父那兒降到塵世成為人，但從未離開過聖父。我一生也應儘管在塵世中，但心中從不離開天主。我信基督，他不但教導我們真理，他本身就是真理和道路。有了基督才有生命，我活著應活出基督。1947年初我去法國巴黎拜望了婁白東神父，向他致敬，他熱情地接待了我，和我談了兩個小時，對我啟發很大。1951年我回國，讓人把《基督之光》和《耶穌的行實和教訓》的後半部分譯成中文，放在「神修文庫」出版。1982年我回上海，知道紅衛兵把我們的書(法文的、中文的)全部燒毀，我寫信給法國友人，請他們寄來，他們回信說：「這些書早已過時，不再版了。」我悵然，這樣好的書怎麼會過時呢？怎麼會絕版呢？世界變得太快了，我跟不上。

另一本對我起作用的書是聖三依撒伯爾修女的傳記(*Soeur Elisabeth de la Trinité*)，這位26歲就去世的聖衣會修女的名言是：「我在世上已找到了我的天堂，天堂者天主也，而天主在我心中。」我一直記住這句話，在失去自由的漫長歲月中，這句話一直陪伴著我，支持著我，安慰著我，使我在最困難中不感到痛苦，使我能頂住種種困難。我恢復自由，再去法國時，知道教宗已於1984年11月25日把她列入真福。求真福保佑我，直到永遠！里昂總主教德古特雷(Albert Decourtray)也恭敬這位修女，陪我去該隱修院朝聖，我和修院通信迄今。

我又看了大量會士的傳記，會祖聖依納爵、東方宗徒方濟各·沙勿略、青年主保聖類思公撒格、聖若翰伯爾各滿、聖達尼老、輔理修士主保聖阿爾方沙·羅特利格、黑奴主保聖伯多祿·格拉物爾、聖師加尼削傳等，使我深信耶穌會的宗旨是「愈顯主榮」，重點在「愈」字，凡事要令天主有更大的光榮，也深信耶穌會的神操的中心是耶穌基督的愛，愛耶穌並以愛人為愛基督的具體表現，不說空話，多做實事。初學兩年使我愛上耶穌會，以當耶穌會士為榮，決不能玷污耶穌會士之名。我也養成了認為所有會士是我的兄弟的習慣，儘管我後來遭受的攻擊主要來自同會會士，但我仍愛耶穌會，這是後話。

導師還規定初學期間應與世隔絕，不准看報，少會見或不會見親友，兩年中只有我的一個學生沈保仁想著我，直接找我的導師才允許我

會見他。我很感激他，他很有辦事能力，年輕時就做了泗涇鎮的商會會長（今日的工商聯），可惜他壽命不長，1954年就去世，我一直懷念他，他聖名文都拉。

發初願：文學院（1940-1941）

兩年過去了，1940年9月8日，我和其他人一起發了初願。1955年被捕也在9月8日，是巧合嗎？是天意嗎？我發初願沒有通知人，所以也沒有人來祝賀我。我立即轉入文學院，不像今天修女發初願那樣熱鬧。接著會長要我在徐匯聖心修院教授二年級的拉丁文，這過去一直是法國神父教的，每天四節課，上午兩節課，下午兩節課，教西塞羅的演講辭和凱撒大帝的《高盧戰記》等。學生七名，其中有莊懷淵、宋之鈞（他們兩人在聖神父後去羅馬深造，由於全國解放，學成後他們去了台灣）、張光復（一直在上海，最近去世），還有姓周的（由於智商不高被辭退回家）。

我在課餘跟文學修生聽文學院的課，當時文學院主任是王昌祉神父，他是泗涇人，出身書香門第，國學根基極深。他在徐匯公學畢業後加入耶穌會，初學文學後在徐匯公學教書，後派去英國念了三年哲學，在法國里昂念了四年神學。畢業後，上海桑會長命他繼續在國外深造，三年中他在巴黎大學獲得國家級的哲學博士，論文是關於王陽明的；他同時在巴黎天主教大學獲取了神學博士，論文是關於聖奧斯定的聖寵論。記得我在里昂耶穌會神學院認識德呂巴克（de Lubac）神父，向他表示敬仰之心時，他回說：「真正的才子，是我青年時的同學王昌祉，他的神學造詣才深呀！」他問我王是否在教神學，我回答說，他一直在教文學修生漢文，又主編一個給兒童看的「聖體軍」刊物。呂神父回說：「這怎麼可能？這不是把寶石埋在土裡嗎？」王自己多次毛遂自薦向姚贊唐會長申請教神學，姚贊唐一口拒絕，王昌祉真是懷才不遇。

王昌祉教我們孔子的《論語》、老子的《道德經》以及莊子的《內篇》七篇和最後一篇《天下》。

《論語》的中心思想當然是「仁」，儘管孔子的得意門生曾子說過「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似乎「忠恕」概括了孔子的全部思想；儘管某些學者主張孔子一生追求克己復禮，但「仁」含義極廣，外文中找不到一個和它對稱而且正確的譯文，更不能給它下一個定義，只能從各個方面去闡述它。孔子偉大，但他只講今世不講彼岸，只講人，不講天，只講為入之道，如何正心誠意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講天人合一。

老子講「道」，可是他寫的《道德經》第一句說「道可道，非常道」，後又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講的道很玄，「道」一字從首，指原始，指萬有之源。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也從走，指行動，指前進，故道也成為路，即道路，道為原始，萬物來自道，人當然也來自道，道為道路，人經道而達於道。

莊子的《內篇》七篇是一個整體，文字美，境界高，一氣呵成，壯麗之極，其中心思想為與造物者遊，即天人相會。莊子對現世、塵世、人世看得很透徹。他主張齊物、超越生死等。莊子探索人類心靈中最深層的願望，試圖指出真正幸福之所在，以補足儒學之缺陷。自古以來中國不少知識分子往往外儒內道，就是外表、口上講孔孟之道，內心深處卻有道家思想。

哲學院 (1941-1942)

1941年8月底，姚贊唐派我去河北獻縣讀第三年哲學，上海修院只讀兩年，耶穌會士應讀三年，我要補課。按當時中國耶穌會的佈局：哲學院在獻縣，神學院在上海，卒試院在安徽蕪湖。我和朱樹德、陳天祥等於9月初乘火車到南京，渡江再乘火車到蚌埠住了兩夜，參觀蚌埠教區。意大利耶穌會士熱忱招待。主教卡西尼(Cassini)接見我們，我們參觀男女中學，女中由意大利烏蘇拉會修女管理，金福山的第四個女兒金靜修是該會修女。耶穌會院緊靠火車站，夜晚隆隆的火車聲令人無法入睡。第三日繼續乘火車北行，次日到達河北泊頭鎮下車。早在獻縣念哲學的沈戴淇修士已候在車站，把我們接到堂內，改乘大車向獻縣出發。當時泊頭到獻縣沒有汽車通道，我們乘的是一種騾子拉的木製平板車，木車輪，箍上一層鐵皮。一條黃土路，路中間有兩條深深的車輪經過留下的溝痕。我一坐上就在感性上明白這就是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這句成語意即：關起門來自己憑主觀造了一輛車，車子兩輪的距離和外面的轍不符合，車不就報廢了嗎？坐在這種車上，我想到兩千多年前孔子周遊列國時乘的就是這種車。交通工具兩千多年來沒有進步。晚上我們住宿在留信鎮教堂裡。車子顛簸得厲害，沈修士向堂裡借了被子鋪在車上，讓我們躺下，舒服多了。車夫不時揚起鞭子，空中一個響鞭，再往地上一抽，騾子以為另一個騾子挨了鞭子，就跑得快些。第二天繼續走路，半天後到離獻縣20里的雲台山停下，這是獻縣教區的後勤基地，約有200頃良田，種糧食、果樹、蔬菜，最多的是葡萄，自己釀酒，一應俱全。傍晚我們到達全國有名的張家莊天主堂。天主堂範圍廣，氣魄很大，周圍是用磚砌起的又高又厚的牆，類似城牆，牆上有空眼可架槍，牆頭可跑馬。1900年義和團扶清滅洋運動時，八國聯軍為了保護外國僑民，派了一支法國軍隊來保衛天主堂。獻縣教區分

男院、女院，男院有主教座堂、主教府、耶穌會總院、小學、中學、修院、初學院、文學院、哲學院、印刷廠、出版社、很大的藏書樓和養殖場。女院有育嬰堂、孤兒院、女子小學、中學、獻堂會修女院、拯亡會修女院、加拿大籍的聖神隱修院，還有一個規模不小的醫院。天主教區自己有發電廠、自來水廠，冬天有暖氣，院內有大池子，冬天可溜冰，夏天可划船。我們去獻縣縣城，城牆是土壘成的，城牆內很少磚瓦房屋（電視劇中的紀曉嵐是獻縣人）。傳教士的生活水平遠遠高出普通老百姓，容易引起群眾的反感。

到後沒幾天我們突然被日本兵包圍。原來前幾天幾個日本鬼子在雲台山玩時，有八路軍向他們投擲炸彈，炸死了幾個鬼子。日本兵把我們中國人連同主教押到雲台山監禁，我們擠在一所樓內，荷槍實彈的日本兵監視我們，不讓我們說話。在張家莊堂內大肆搜查，在學校內找到國民黨黨旗，就把校長馮神父帶走，在印刷廠內發現正在印反日的傳單，他們就把負責的修士以及幾個排字工人銬了起來，押到監獄。隔了一日，正在雲台山的一位比利時神父 Lichtenberger（中文姓李），從張家莊給我們運來被子和給養。

日軍包圍獻縣張家莊天主堂，並帶走了趙振聲主教及以下所有耶穌會會士和修士等的消息，傳到了天津的工商學院，院長尚建勳神父就四處奔走，請法、意、西、加、美、英的領事聯合向日本總領事施加壓力。一天早上，日本軍隊把我們全體集合在大院內，一個一個點名，重點問河北人，凡是河北人排在左面，非河北的我們排到右邊。盤問結束後讓比國神父把我們領回張家莊，所以我們只被關押了半個月。而站在左邊的人被投入監獄。日軍槍斃了一位馮神父、一位修士（也姓馮）和五名印刷工人，半年後把關在監獄內的人放出來，我們到獻縣縣城歡迎他們。

這裡順便說一下那位比利時神父，他原是護士出身。獻縣天主堂醫院幾名重要的醫生，尤其開刀醫生，見日軍進入教堂怕了，逃回上海。醫院沒有外科大夫，怎麼辦？每天送來的病人很多，包括八路軍的傷兵，向他們說沒有醫生了，病人不肯走，別處也沒有好醫院。那位比利時神父說：「我來開刀！」他卷起袖子穿上白大褂，督促護士做好準備，就做手術，他剖膛、割手臂、割大腿……到抗戰勝利，做了不少於一千個大手術，無人死亡。勝利後耶穌會領導把他送回比國，進醫科大學，要他做正規的大夫。1948年夏天我去比國首都，在耶穌會院見到

了他，他非常高興，我們緊緊擁抱。他有牢騷，說醫院要他從頭讀起，拿文憑得好幾年。他說：「我動過的手術比那些課堂上教課的醫師多得多，我比他們技術高，還得跟他們學書本上的知識，浪費時間！」

獻縣張家莊是法國人的傳教基地，哲學院的學生除了中國人外，還有一名意大利會士普留利 (Priuli)，三名西班牙會士魯伊斯 (Ruiz)、Goyoyaga、拉朗熱 (Laranaga)，以及一名法國會士，此人名叫皮埃爾·特里茨 (Pierre Tritz)。解放後他被派到菲律賓，在馬尼拉窮人中工作，創辦了多座麻風病院，治癒了數以萬計的麻風病患者；又開設多所免費學校，使無數兒童免為文盲，找到職業。菲國政府給他頒發勳章，法國政府給他榮譽勳章，他是我們一班中最有成就的一名會士，現在還健在，仍在四處為窮人奔走。

哲學院有多名老師，西班牙籍的帕拉西奧斯 (Palacios)、加拿大籍的達萊爾 (Dallaire)，還有匈牙利籍和法國的幾位神父，基本上講的是傳統的士林哲學，法籍會士重點講了兩名法國哲學家：伯格森 (Bergson) 的《創造性的進化》(*L'évolution Créatrice*) 和布隆代爾 (Blondel) 的《行動》(*Action*)。前者更出名，後者，以我看來，更深。匈牙利籍老師以批判的立場講了康德和黑格爾，批判性地淺淺講了馬克思主義。沒有中國老師，沒有講中國哲學。

日軍一包圍張家莊，蚌埠意大利主教卡西尼就趕來獻縣慰問我們，並去拜會日軍頭頭。日本耶穌會派來了一個德國會士，讓他長住在張家莊。日軍來時，他出來應付。德、意、日是軸心國，日寇對他們比較尊敬，耶穌會是國際性的組織，得到各國耶穌會的大力支持。教堂大門前掛起法國、德國、西班牙、匈牙利、意大利、美國、加拿大等國的國旗，用以顯示其國際性，一般日本軍隊到此止步。

我們的生活很優越，每天除了牛奶、咖啡外，還有兩個雞蛋、鹹肉、黃油、果醬。我在上海吃慣新鮮麵包，覺得饅不如麵包。一次我去農村看小朋友們，我居然無知地問小孩「饅好吃嗎？」小孩回答說：「饅？白麵饅？我們只在過年時才吃，平日只吃窩窩頭(玉米麵)。」我頓時感到非常慚愧。小孩這句話牢牢記在我心中，現在農村都吃細糧了，玉米窩窩頭反而上宴席了！

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軍偷襲珍珠港，向美英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才向日本宣戰。此前，美國的物資仍然輸往日本，宋美齡於1941年在美國向美國人民的演講辭中說：「截止今天，日本用來打中國

軍隊的槍炮所用的鋼材來自美國，日本空軍轟炸中國無辜人民的汽油來自美國。」現在，打到自己頭上時，才和日本人開戰。獻縣張家莊天主堂有美國和加拿大的神父、修女，日軍又來到天主堂，把他們帶走，押去天津，關入集中營。

日寇包圍了張家莊，原會長兼副主教饒孟 (Joman) 嚇得生病，寫信給耶穌會駐華巡閱使毛倫 (Marin) 辭職，毛急電調前面講過的天津工商學院院長尚建勳 (René Charvet) 到獻縣任會長，任命艾西爾 (Aisier) 為工商學院院長。對尚來說，這是苦差，他一句話不說，立即離津到獻縣，巡視教區各地，慰問神父教友，獻縣主教趙振聲則留守獻縣。日軍投降後，八路軍解放河北南部，把尚當作國際間諜逮捕，發動群眾控訴他，投入監獄，後驅逐出境。解放初期教科書中有尚建勳一頁，「臭名」家喻戶曉。他出身名門望族，家族人眾，回國後到處宣傳中國教會。我於1949年在他的故鄉見到他，他已衰老。他死前和家人說：「追悼會上你們不必講話，我自己講。」他預備好一篇評論自己一生功過的講話並錄了音，追悼會上放了他的錄音，他給自己蓋棺定論。

講了尚建勳，不能忘記趙振聲主教。20世紀30年代末，獻縣法籍劉主教 (Le Croix) 患了老年癡呆症，基本上失去記憶力，羅馬知道了，任命趙振聲為獻縣第一任國籍主教。趙是耶穌會士，曾留學法國多年。老劉主教的癡呆有一特點，他別的事都忘，唯有自己是主教不忘，他天天仍要穿主教服，佩戴十字架，戴主教權戒。一聽到要祝聖一位主教來代他，他就大吵大鬧，趙沒法在張家莊座堂祝聖，就去天津請文主教私下祝聖。回獻縣後慶祝他的彌撒中他不戴主教高冠，不拿權杖降福教友，拍照時趙不坐在劉旁邊，而站在劉後面，當攝影師快按快門時，他才拿出十字架套在頸上，拍完照，他又快快摘下。好不容易等到劉主教蒙召歸主，日本人卻來了，限制他，不許他自由活動，他只能待在獻縣張家莊。日寇投降了，八路軍入駐，他逃到天津，後到北京，1945年12月蔣介石去北平活動，趙去見蔣，請蔣早日派國民黨軍隊進入河北南部，田耕莘樞機逃亡國外前任命他為北京代理主教。全國解放了，他惶惶乎不可終日，到處躲。最後獻縣有一個教友，因抗戰時打地道戰，家有地道，就把他接到家藏起來，天天給他送三頓飯，他過的是不見天日的日子。一年後共產黨終於找到了他，請他出山，仍做獻縣主教，收藏他的教友卻遭了殃。1957年開全國教友代表會，政府押了他去參加，會上選他為全國愛國會副主席。他陪同主席皮漱石主教到處祝聖自選的主

教。「文革」時，紅衛兵揪住他不放，狠批狠鬥他，打他，把他關在牢內，不久死去。他真是一個悲劇人物。

1942年4月，上海耶穌會會長姚贊唐到獻縣來看我們幾個上海會士，他把我叫到他的房內說：「日本人節節勝利，香港、菲律賓都落入它手中，看來他們會長久待在中國，我們需要一個精通日文的人，決定今年9月底派你去日本東京好好學習日文，在東京大學讀書，考取一個學位回來，我命令你6月去天津工商學院，有人教你日文，8月底去日本上學。」我心想，這不是要我做漢奸了嗎？在政治上置我於死地嗎？我將遺臭萬年嗎？怎麼辦？外國人不知道中國人多恨日本。我心中矛盾得很，是服從還是抗命，我決心先消極抵制。

1942年5月底，在獻縣學習一年結束後，我帶著消極抵制的態度和朱樹德兩人離開獻縣先去北京玩一個星期再說。

在北京我們住在耶穌會德勝院，白天拿著地圖到處玩，不能走遠，西山等處已在八路軍游擊隊手中，我們去拜見了國際有名的古生物學家兼大思想家德日進神父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他熱情招待我們，領我們到陳列室去，拿出一塊又一塊化石，興趣濃厚地向我們講解。他滔滔不絕地講了半個小時，發覺我們對此不感興趣，說：「還是跟我去餐廳吧。」他拿已預備好的豐盛茶點招待我們，我們向他道謝後回德勝院。我們去見他只因為他是名人，是幫助鑒定北京人的專家而已。我們對古生物學其實一竅不通。

離開北京我到了天津位於馬場道的工商學院，我的朋友劉乃仁神父高興地招待我。我認識了匈牙利修士勞達一 (László Ladány)，此人解放前夕逃到香港，創辦了一份名為《分析中國》(China News Analysis) 的反共雜誌，以後他大力攻擊我，說我是叛徒，因出賣兄弟才爭取到回上海的機會，這是後話。

工商學院院長艾西爾說他已請了一個日本人教我日語，早晚各兩小時。那個日本人倒不錯，用心教我。我只是不學，兩個星期後連平假名和片假名也背不上來。最後他灰心了，他向院長反映，他無法教我這樣的學生，艾西爾匯報了姚贊唐，姚寫信要我9月初回到上海讀神學。我的消極抵制生效了。

艾西爾不得人心，校中外籍教授寫信給巡閱使毛倫，毛倫派了德雷克塞爾 (Drexel) 神父來調查 (毛倫是加拿大人，不能離開上海，德雷克塞爾原是奧地利人，希特勒吞併奧地利後，他拿了德國護照)。他和所

有會士談話，發覺大家一致推薦中國會士劉乃仁為院長。他回申匯報，毛同意了，把艾西爾調走，任命劉為工商學院院長。他是第一位當上天主教大學校長的中國人，有領導才能，會團結人，善於交際，他募得許多捐款，把工商學院提升為津沽大學。劉出生公教家庭，弟兄四人，三人為神父。我發覺獻縣教區的法國領導更領會福音的精神，更努力執行教宗的指令，1936年任命中國人為主教，1942年任命中國人為大學校長，1950年任命中國人為會長，更早派中國會士去國外深造，比上海的耶穌會領導開明。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寇進一步推行奴化教育。每一所學校得有一個日本人當副校長，劉乃仁通過尚會長向在日本的耶穌會士求助。日本耶穌會士設法把一名天主教上智大學畢業的名叫三浦的日本天主教徒派到天津做副校長。

三浦到津沽大學後和劉乃仁相處得很好，三浦對劉說：「我來保護你們，不來控制你們。我只要你給我一所小洋樓、一輛汽車和一個漂亮的辦公室，日本司令部來人，我來應付，其餘事我不管。」一次他向劉說：司令部要抓某進步學生，我們把他送出日軍佔領區吧。他們兩個把那學生叫來，三浦坐在駕駛員旁邊，劉坐在後座，讓學生橫臥在劉的腳下蓋上一毯子。到了分界線，三浦下車和日本哨兵打了招呼，日軍放行，駛進無人管的地區，三浦和劉鬆了一口氣，劉向學生說：「現在你自由了。」這事是劉親口對我講的，三浦這個人幫了教會很多忙。天津津沽大學沒有遭到日寇干預，可以和以前一樣授課，名聲大增，學生人數急劇上升。日寇投降後，三浦被遣送回日本，不再有他的消息，劉曾向東京的耶穌會士打聽，回信說不知他的下落。可見日本人中也有好人。

天津解放了，共產黨天津領導之一專程去拜望劉乃仁。劉心想共產黨那麼注意我，可能不妙，三十六計走為上策，他帶了300銀元化妝成農民隻身出走，出城時，哨兵搜出他的錢，問他帶那麼多錢幹什麼，他說回老家娶媳婦，解放軍放他走，他先逃到內蒙，再輾轉去西安、上海、香港，最後到東帝汶，不久死在那兒。

讀神學 (1942-1946)

1942年8月下旬，我離開天津回上海，當時日寇全力守衛鐵路幹線，北京、上海間火車還暢通，在浦口下車渡江，到南京震旦附中睡了一夜，改乘滬寧鐵路，回到上海，去徐家匯神學院報到，當時神學院所在地即今日東方商城與附近的大樓所在處，桑黻翰院長熱誠接待了我。

神學四年制，學生有103人，教師有14人，分屬中國、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哥倫比亞、烏拉圭、智利、法國、愛爾蘭、意大利、西班牙、奧地利、瑞士、荷蘭、匈牙利、德國、葡萄牙、比利時、印度尼西亞十幾國，其中有些還是交戰國，但同學們之間相處極和諧，像兄弟般生活在一起。這應該歸功於我們的院長，他領導有方，儘管我們的文化、政治等背景不同，他教我們超越國家，使我們處處不忘是聖教會耶穌會大家庭的成員。桑黻翰院長曾是震旦大學校長，上海教區耶穌會會長兼副主教，他完全以慈父的關懷對待我們。他對我特好，我神學第二年就讓我當學長。學長的作用是下情上達，一方面代表同學向院長反映他們的想法，一方面又要代表院長貫徹他的旨意。每天早上8點鐘我得去他的辦公室請示匯報，他向我講述怎樣做一個好會士，如何做好牧靈工作，怎樣做領導。他常向我講他自己的經歷，指出怎樣處世，怎樣待人接物，處事應怎樣小心謹慎，他有時也和我講一些他仍在學習的事情和學習的心得，這些都讓我終身受益。我迄今認為他是我的恩師，我永遠不會忘記他高大的形象。

徐匯神學院得到羅馬梵蒂岡教育部認可，能授予碩士學位。神學院四年，所授課程為：信理神學、倫理神學、聖經學、天主教法律、歷史、禮儀、神修等科目，一律用拉丁文授課。為了讀《聖經》原文，必須學會希伯來文和希臘文，課程安排得很緊。

當時徐匯神學院教學很傳統，也可以說很保守，全是特利騰(Tridentinum)和梵蒂岡第一公會議神學，教授們教的全部是士林神學。尤其是一位美國老師瞿光華(McCarthy)，他教創世論，反對進化論，說天主直接創造了宇宙，按字面解釋古經《創世紀》，說天主親自直接造出我們的原祖亞當和夏娃兩人等。難怪我們的老師在1946年初聽了德日進的演講後搖頭不贊成，難怪1947年我在巴黎去見德日進神父，和他長談後，他送我出門時，拍拍我的肩膀說：「小兄弟呀，你至少落後四十年。」

前面我說了，在學習哲學時我有一位好友名皮埃爾·特里茨，現為菲律賓的著名慈善家，他以愛關懷最窮的人群。在學習神學時我也有一位好友劉易斯·魯伊斯(Luis Ruiz)，西班牙人，中文名字陸毅，長我三歲，他當時是副學長。我們學習、工作均配合密切，我和他同一天聖神父，但不在同一教堂。畢業後他去安徽安慶教區做福傳工作，上世紀50年代初被驅逐出境，在澳門工作，他一生為殘疾人服務，在澳門受人愛戴，他在我國先後創辦了幾十所麻風病醫院，治癒了無數的貧苦、遭人遺棄的窮人。我在神學院的一百餘名同學都已蒙召歸主，只有特里茨和魯伊斯這兩位仍健在，「仁者壽也」。

按傳統教信理神學並不太難，信理神學內容分別是：天主實有論、天主聖三論、天主啟示人類論、創世論、贖世論、基督論、教會論、聖事論、聖寵論、末世論、聖母論、天使論等，每一論設幾十個命題。上課時先講這命題的內容，講其重要性，接著敘述歷代與之相反的意見。接著打開幾本摘要：一、聖經上怎麼說的，引用幾段；二、教父們怎麼說的，引用幾段；三、教會怎麼說的，引用幾段公會議的決議或教宗的上諭。這幾本摘要隨時帶在課堂上：教父摘要、教會訓導摘要。引用時，只讀幾段，不介紹其來龍去脈，往往斷章取義。比如基督論，先要證明歷史中確有耶穌其人，然後講歷史中的耶穌怎樣被認默西亞，又成為我們信仰中的天主之子，講歷史上如何通過與反對者的交鋒而成為信條。現今不這樣講了。

教授中比較開通的是一位西班牙籍的倫理學與聖教法典專家剛濟亞(Eliseus Escanciano)，他在羅馬額吾略大學法律系攻得博士學位後來上海教書，並任上海教區法律顧問。開始他很嚴，凡有疑難或要求主教寬免的事，他總引用法律某某條予以拒絕。桑黻翰院長認為他全是書本知識，不切實際，安排他周末做牧靈工作，派他去松江泗涇鎮天主堂和青

浦小東圩天主堂服務。他接觸了群眾，尤其勞動人民後，態度逐漸發生了變化，他同情教友，常常設身處地考慮問題，從此他遇到別人請示，他的回信是：根據某某條是不許可的，但根據另外條款是可以的。他不再嚴辭拒絕了，而是為人民找出路，可見牧靈工作的重要。坐辦公室，抄書本的人不知勞動人民的苦衷，不知體諒人。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人把和它交戰的國家的人民都關在集中營內，一點自由也沒有，生活條件很差。上海教區負責財務的萬爾典 (Verdier) 與日本總領事交涉後，日本人同意把與日本交戰國的傳教士集中於上海徐家匯耶穌會院內，在神學院讀書的繼續在神學院讀神學，萬爾典又向日軍說情，把在徐州傳教的一批加拿大傳教士轉移到徐家匯大修院。這樣，在上海的日本交戰國傳教士享受到較好的待遇，他們在徐家匯範圍內可以自由活動，日軍派一個小軍官每天早上去耶穌會總院、大修院兩地點名。凡要去上海市區的都向他請假。來點名的是一個天主教徒，態度非常好，有求必應。

耶穌會有一特恩，教宗准許會士念了三年神學即可聖為神父，再繼續讀第四年神學。我於1945年5月19日在董家渡天主堂(當時的主教座堂)由上海教區主教惠濟良祝聖，我們一個班共有33位同學，惠已年近七十，說自己年老體衰，無力替33人行祝聖禮。我和朱樹德兩人是上海人，由他祝聖。其餘31人由徐州教區邵主教 (Coté) 在徐家匯大堂舉行。第二天我在重慶南路天主堂舉行首祭，下午給我的好友李俊儀、姚德芝證婚。我的兩位堂叔金鶴聲、金鶴汀為我張羅，舅父張宗培開咖啡館，在首祭日送來將近三百客西點，金鶴聲夫婦還安排我在我的出生地老天主堂和老家金家巷天主堂舉行謝主彌撒，我的親伯伯一無表示。

聖了神父，放暑假，姚贊唐派我去浦南金山、亭林、虹橋做兩個月的代本堂(本堂在上海休假)，8月15日聖母升天瞻禮日突然到處炮竹聲不絕，人們奔走相告，日寇投降了，抗戰勝利了，期待了八年的慶日來到了。感謝主恩！

歡欣鼓舞的心情沒有持續多久，重慶飛來的接收大員大肆掠奪，使老百姓感到失望。不久內戰爆發，渴望多年的和平夢想破碎，籠罩著神州大地的是一片悲觀的情緒。

蘇北 (1946-1947)

1946年6月下旬我畢業了，畢業的第二天姚贊唐叫我去說：「你畢業了，假期中我派你去蘇北東台接替 Klement 神父，你是代本堂，8月底回來，去安徽蕪湖。」我知道蔣介石撕毀了停戰協定，國共又開戰，蘇北緊靠長江，離南京極近，東台在新四軍統治之下，是國民黨必爭之地。國民黨軍隊向東台挺進，戰事已打響，很激烈。美國人的生命寶貴，必須讓他脫離危險，轉到安全地帶，讓我去替死。第二日我就坐火車到鎮江，渡長江到揚州，再改乘長途汽車到泰州，本堂周神父熱誠招待。第二天搭上一條小船，船上乘客互不交談，不久船離開泰州，約兩個小時後進入新四軍地區，河邊有兒童隊手持長矛在巡邏，船老大說，兒童隊員很認真，不放過沒有路條的行人，再三盤問不好對付。船行十個多小時，旅客內急，就到船頭站著解開褲子方便，我可做不到，只好使勁憋住，很難受。傍晚到達目的地，即抗戰前號稱小上海的東台。我敲開了堂門，本堂神父 Klement 見是我，喜出望外，他早就知道我去替他，他可以脫險，第二天就高高興興回上海去了。

東台堂內有三位獻堂會修女，領袖姓沈，約50歲；年長的姓黃，海門人，年70；年輕的姓榮，蘇北沐陽人，約30歲，我到時她正在教小孩兒唱歌，扭秧歌。Klement 沒有留下錢，日常開支靠黃修女看病掙的錢，她會針灸，尤其擅長看小兒科的病。Klement 也會看病，留下一些西藥，我不會看病，就把藥品送給人民醫院魏院長，他大喜，因為國民黨封鎖，新四軍缺藥。東台城內沒有幾個教友，平日我獻彌撒時，只有三位修女和一個姓解的看門工人，此人長鬚垂到胸前，褐色長臉，有人說他是猶太人的後裔，他自己說老祖宗是開封人(宋朝時開封確有猶太人，但現已漢化)。星期天有二十來個在東台郊區開荒的教友來望彌撒。我終日無事可做，實際不過派我來看堂。幾天後安豐教堂魯神父

(Rouxin, 法國人)派人來告訴我他病了,我就趕去,他拉稀,見了我很高興,我們談了半天,見他精神好,我就回東台。過兩天,有教友來說魯神父死了,我連忙趕去料理喪事,魯神父之前的安豐本堂是徐丕文神父,徐調回上海時留下一大箱子的小說,沒有帶回去,我就選了幾本帶到東台看。

當時國民黨軍隊一部分從泰州、揚州向北推進,張靈甫的軍隊則從徐州南下,南北夾攻新四軍。上空國民黨飛機不停盤旋,東台完全籠罩在戰爭的氣氛中,街上盡是緊急調動的新四軍,路上行人稀少,市面蕭條。抗戰八年,終於望到了勝利,誰知人民又陷於戰爭。

隔了幾天,在鹽城傳教多年的晉神父(de Prunelle, 法國人)來看我,說他認識東台縣縣長董希白,他在徐匯公學當舍監時,董曾是他的學生。董畢業後曾留學法國,加入了共產黨。晉說「我領你去看他」,我們去了,縣政府設在一個大廟裡,我們通報後,董縣長立即出來,請我們到他的辦公室內上茶。董說自己少年入徐匯公學,他生得瘦小,同學欺負他,晉神父特疼愛他,他感激晉。董和他手下一批人都穿灰色土布中山裝,我們辭別時,董送我們到大門口,對我說遇到難事去找他。1951年我回國後在報上看到董在外交部任條約司司長。我才進入解放區時,心裡忐忑不安,拜會董希白後心中踏實了,安心、放心地留在解放區看堂。

Klement 神父知道我冒險代他到戰地,使他能回安全地帶,後來去菲律賓傳教。他很感激我,1982年我釋放回上海,他知道我在創辦修院,很需要捐助,他有良心,每年為我捐得3000美元匯給我,一連十二年直到他去世。

在東台兩個月,沒有麻煩,沒有什麼牧靈工作,主日上也只有二十來名教友來望彌撒。他們是來自啟東開荒種棉花的農民,生活很艱苦,我曾去探望過他們兩次。他們住的是極簡陋的草屋,往往只有一間,裡面放一張床、一張小桌子、兩三隻小板凳,中間一隻鍋。這些農民種的是鹽鹼地,必須多次用水沖洗才可播種植物,主要種棉花,供南通紡織廠用。啟東農民種的田和當地農民種的田,一眼就能分辨出,啟東人種的農作物長得很壯,周邊無雜草。過去項總鐸在東台時,每月給來參與彌撒的教友發銀元,我兩個月中什麼也沒有給。教友中一姓張的是頭,有文化,我回上海後和我通過信,下面將談到他。

在東台日子過得平平淡淡，沒有報紙看，沒有收音機聽新聞，因是暑假也沒有學生，有足夠的時間祈禱。鄰居有一名姓徐的中醫，經常來和我聊天，我給他講些天主教要理，他表示願意奉教。

兩個月中只有一次插曲，一天下午忽然來了一支軍隊，約200人，不少馬匹，為首的對我說，「我們將在你處紮營，你們得讓出地方」，一時間馬嘶不絕，人聲鼎沸。我叫老解和他周旋，我則到小堂去念經，特別求大聖若瑟保護，像保護聖家一樣保護東台教堂和教友，祈禱後我感到內心平靜，步出聖堂，見士兵們牽了馬離開了教堂。我又回到聖堂感謝大聖若瑟。

好不容易到8月底，我向董縣長告辭，向他要了張路條。在解放區內，一路上有兒童隊巡邏，好厲害的革命小將，無路條決不放行。船向泰州馳去，進入國民黨區，上船檢查的國民黨小軍官懷疑我是新四軍派去上海的，我被盤問了好久，起初說要扣留我，最後才放行。

回到上海，姚贊唐對我說：「你不去蕪湖，改去蘇北淮陰。」原來已被任命為淮陰與漣水本堂的傅勝蘭神父知道那兒戰事激烈，不肯上任，於是臨時決定我去代他，為期一年，又一次去替死。那時國民黨整編第74師，張靈甫一支軍隊正向淮陰漣水挺進。國民黨軍隊猛攻，新四軍奮勇迎戰，一場惡仗，確是極危險地帶。漣水一位獻堂會修女見蔣方飛機來轟炸，為了保護自己，居然去屋頂掛梵蒂岡國旗，被新四軍看見就地槍決。在國民黨區的法籍 Homo 和 Robert 神父，帶著張孝松和張景超神父離開海州，去城頭阿湖解放區奔向沐陽，去張登儼神父處過本堂瞻禮。張靈甫的74師在奪取漣水後猛攻沐陽縣，新四軍把他們五人扣留，就地挖了一個大坑立即槍決了他們。傅就是被派到那裡接任，他留在上海不肯去，情有可原。我服從命令，回揚州，準備搭船前去淮陰。我到了揚州等船時，知道共產黨戰略撤退，國民黨打通了運河。

沒有津浦鐵路以前，運河是我國南北運輸的大動脈。北方尤其京城需要的糧食大米和食鹽都通過運河由南方到達北京。運河很怪，高出平地一丈多，活像一條懸在空中的帶子。運河沉積淤泥不挖去，河床上升，就加高堤岸，越加越高，站在堤岸上向下俯看街上的房屋和行走的老百姓。一旦決堤，河水一瀉千里，大批良田淪為沼地，老百姓無家可歸，無田可耕，成為難民湧向江南做苦力。我坐船離開揚州，經邵伯、高郵、寶應、淮安而到淮陰，路程約400里，行一天一夜。淮安是一座古城，出名的景點是胯下橋，以漢朝大將韓信少年時忍奇恥爬過一惡少

胯下之地而得名。淮陰天主堂在城外，有一座小學，神父住的小屋名也可居。淮陰是基督教的大本營，有很具規模的綜合醫院，也有很大的教堂，牧師樓很有氣魄。著名的女作家賽珍珠 (Pearl Buck) 出生此地，她寫了 50 部以中國為題材的小說，1928 年得到諾貝爾文學獎。

淮陰也叫清江浦，是個水陸碼頭，商業發達，教堂在城外，教友只有幾十個 (信基督教的很多)，天主堂內有一所小學，有三百餘名學生。我到後請了多名年輕的師範學院畢業的老師，教學質量提高，學生人數劇增，每天下午 4 點鐘放學前，學生集中在操場上，我給他們講話，感到極大快樂。星期日看不到學生，很寂寞。我在淮陰時為學校增添了教育用具、體育設備，以後又修了三間大教室，我對淮陰、對蘇北很有感情。過去我有上海人的偏見，瞧不起蘇北人，自從到了東台和淮陰後，我喜歡上蘇北人，聽蘇北話也感到親切。

我到後不久，聯合國救濟總署淮陰辦事處主任張某某來看望我，聘請我為他的顧問，我欣然接受。一次我和他一起去漣水調查，順便看了天主堂。我走過的地方，漣水城最窮，城市窮，沒有樓房只有平房，還有草房；老百姓窮，室內沒有多少家具，老百姓穿的是打補丁的破舊衣服，縣領導領我們參觀，真是慘不忍睹。我們要保長把每戶登記造冊報上來，隔了幾天我和張主任及他手下的工作人員帶了幾卡車的麵粉去發放。張主任說不經過政府，更不經過保長的手，直接發到每一個老百姓手中。我們根據報表核對人口，一包一包地發給老百姓，每戶兩袋白麵粉。回去路上張主任高興地說：「看老百姓多高興呀！」誰知道我們高興得太早了，事後我們知道，在我們走後，這些保長也按戶索取說：「我們不報你們，你們會拿到白麵粉嗎？如果下次還想要，就分一半給我們。」老百姓為了下次再領，不得不忍痛上交。國民黨如此腐敗，不垮才怪呢！

我待了幾個月，知道新四軍只讓出城市，國民黨只能佔領交通要道和鄰近公路，及沿運河的一些市鎮，廣大農村基本上還是共產黨控制著。最不得人心的是那些還鄉團，共產黨進行土改，把地主的田地分給貧下中農，地主逃到了城市，組織還鄉團。國民黨軍隊來時，還鄉團跟在後面，地主們反攻倒算。還鄉團有武器，從貧下中農手中奪回房屋土地，非常殘酷。國民黨大失人心，失民心者必亡。

我以小學的名義向張主任要了幾百袋麵粉和豆子，我用此修建了幾間教室，擴大我的小學。落成那天我請張主任來剪綵，他在致賀辭時

說：「我撥出了那麼多的救濟物資，但最後有成果的只有天主教！」（張主任曾是揚州一中學校長，為人廉潔，不許家人拿救濟物，連一寸布也不准拿，我去過他揚州的家，沒有什麼好的家具，我佩服他。）

蘇北的淮陰教堂內也有三位修女，領袖是位年老的，姓陳，另兩位年輕，以教書為主。一位姓繆，揚州震旦附中畢業；一位姓榮，是沐陽人，從東台調來。她們給我的伙食很好，每頓四個菜。一次我偶然趁吃飯時間去看她們（從男公所到女公所，先得走出男的大門再從女的大門進去，我一般不去），發現她們三人只有兩碟子菜，我對她們說：「你們必須吃與我同樣的菜。」她們口頭答應，過了幾天我再去，她們仍是兩碟，我發火了，說：「你們如再陽奉陰違，我就罷吃了。」我再去時，她們改了。淮陰天主堂在城外，沒有電，用煤油燈，她們省錢，用豆油加燈草的燈，在微弱的燈光下改作業，我又生氣，勒令她們改用煤油燈。這些修女真好，神貧、聽命、全心全意為堂區服務，值得我效法，但願今日的修女也能像她們一樣。求主俯聽我們！

我前半生（被逮捕前）和獻堂會修女合作，只東台和淮陰兩處。外國姆姆培養出那麼好的修女，使我終身難忘。在我腦中獻堂會修女的形象極高大。當時上海教會外國修女都在市區工作，條件好，住洋樓，吃西菜。廣大農村全由獻堂會承包，她們吃苦耐勞，忘我工作，絕對服從，不求任何報酬，處處為教會著想，多偉大！但願我們今天培養出來的修女超過外國人培養的。

1947年3月來了一個法國人，在我的生命史上，他起了關鍵作用。這人名叫皮德（Marcel Bith），是耶穌會巴黎省一會長，上海教區隸屬於該省。該省會長每六年來視察一次。這次他來後指名要見我，我到揚州看他（格壽平 Fernand Lacretelle 陪著他），他和我談了一個小時，第二天他說要去淮陰。我們三人就搭長途汽車，那時那兒的長途汽車很簡陋，硬板凳，低矮的車廂，皮神父個兒很高。汽車開了六個小時，一路顛簸得很。他住了一天，體驗在蘇北傳教士的生活。我向張主任說了，讓皮和格兩人搭救濟總署的吉普車回揚州。回國前，他開了一個諮議會說他想帶著我回法國，再去羅馬念神學考取博士學位，回國後當神學教授，幾個法國諮議表示反對，尤其萬爾典，居然向皮德拍桌子高聲說，中國人去了歐洲回來就不服從、不尊敬他們法國傳教士，又說，中國人沒有資格當神學教授，法國傳教士來上海已一百年了，震旦大學、天文台、

神學院這三個地方從來沒有中國人進去工作過。皮德沒法，只得說去請示總長，讓他決定。

我在上海的耶穌會生活十多年，也曾在獻縣生活過一年，上海屬法國巴黎省管轄，獻縣屬法國香檳省領導，兩者相比之下，香檳省更領會教宗本篤十五頒布的《夫至大》通諭，努力培養當地神職人員，把教區權力移交與本國籍人。香檳省的領導更開明，更有遠見。

30年代河北省獻縣的法國耶穌會向羅馬報了中國人趙振聲做主教，40年代讓中國人張思謙當會長，並且還送會士去外國進修。而1942年上海教區主教惠濟良多病，法國巴黎耶穌會考慮選接班人，他們選定的仍是法國人茅若虛 (Dumas) 做未來的上海主教，把他從天文台調出來，任命他為佘山總鐸，茅和自己的朋友說，領導不讓他幹天文台工作的真正原因，是培養他當主教。但茅這人不會中文，到了佘山和教區神父不能溝通，教區神父不歡迎他，主教惠濟良和會長姚贊唐認為培養茅失敗，又把他調出佘山，放到震旦大學做院長。可見，到40年代中法國人還不想交權，全國解放，還不願放權，最終被驅逐出境。

我在蘇北時姚贊唐也去蘇北，他從泰州去東台再去鹽城，一進入解放區阜寧，當即被扣留。他蓄有長鬚至胸，頗有仙人味道，新四軍把他軟禁，限制他的活動自由，將近三個月的時間上海沒有他的任何消息，耶穌會和教區認為他必已遇難，在大堂內為他舉行追思大禮彌撒，全堂掛的是黑彩帶。那時解放軍戰略撤退，姚贊唐自由後返回上海，彌撒中間出現在大堂，向眾人說：「我還好好活著！」滿堂教友鼓掌歡迎，追思彌撒馬上變成謝恩彌撒。

第三部分

留學生涯

旅歐途中

1947年6月中旬我收到格壽平的來信說，省會長皮德請示了總長，總長批准我去歐洲了，叫我回上海準備去法國學習。我所屬的揚州總鐸區洛神父(Lauzon)知道後寫信給格壽平說，已知總長批准我去歐洲，但應留在淮陰至8月底才可離開。洛神父當時親自趕往淮陰想留下我，然而在他趕到淮陰時我已離開三個小時，正在回上海的長途汽車上，當時還沒有手機，他無法追我回去。

到上海後，知道張伯達竭力推薦朱樹德去法，才爾孟(Germain)又建議他手下王仁生神父去法考察。還知道才爾孟給王買的是二等艙船票，給朱樹德和我買的是三等艙船票。6月下旬我們三人搭 *Andre Lebrun* 號郵船離開上海，這艘船原屬德國所有，第一次世界大戰後，1918年法國人從德國人那兒作為勝利品接收過來。鄧小平20年代去法國勤工儉學坐的就是這艘船，可見其老舊了。航行的第一站是香港，在香港停兩日，上客人和貨物。當時香港只有四十多萬居民，規模遠不如上海，我們上岸參觀了香港主教座堂和耶穌會管理的華南修院和華仁書院。第二站是西貢，即今日的胡志明市。船停三天，巴黎外方傳教會的神父熱誠招待，參觀了一些教堂。我們去了西貢旁邊一個叫 Cholon 的城，整個是華人的世界(當時約有二十餘萬華僑)，在 Cholon 似乎置身於廣州一樣。第三站是錫蘭(現為斯里蘭卡)首都科倫坡。

上岸後我們去參觀教堂、教會學校與醫院。傍晚，主母會修士在他們瀕海的花園中宴請我們。這時夕陽西沉，萬道金光，風景極美。萬籟俱寂，躺在長椅上，身心放鬆，「大海呀，請讚美天主！」的歌聲在我腦海中出現，這真是人間天堂。到處是椰子樹，高高的樹上掛滿椰子。一個少年抱著樹幹輕鬆地爬到樹頂，摘下多隻椰果。劈開，吸取椰汁，清香美味，直入心腑。園中擺上晚餐，頭道菜是一盤麵條，旁邊有一小

碟，裡面放有黃色顆粒，我見主人把它倒在麵條上攪拌後，用叉捲好送入口中，我也照葫蘆畫瓢，把一碟調料全倒在麵條之上，一放入口中，其辣無比，如火燒灼，原來是印度咖喱，出於禮貌，不得不忍辣吃一口麵，喝一大口水。一盤下肚，只覺得肚內似有火燒，好像是從天堂一下子墜入了煉獄，但仍保持笑容和主人對話。當晚的尷尬情景至今未忘。

郵船離開科倫坡駛入印度洋，已值盛夏季風時節，風浪極大，時而把船身高高舉起，時而又把它拋下，船身忽上忽下，大多數乘客都嘔吐不止，躺在床上不能站立，晃得厲害時可同時容數百人的餐廳裡空空蕩蕩，只有我一個人用膳。

在印度洋十幾天，生活單調，只看到大海，沒有其他景物進入視線，但有兩次插曲。一次一名法國婦女和丈夫吵架，氣憤之下，從船的一側縱身跳入大海，船上的遊客見狀擁上甲板，驚慌萬分，只見那婦女沒有沉入海中，雙臂一起一落，頭部時隱時現，游向輪船。船行較快，婦女顯然沒法追上。旅客見到人影逐漸縮小，焦急萬分，船長下令，船掉頭回去救援。幾名水手卸下救生艇，在海上找到該婦女，把她拉入艇中，其他水手拉起小艇，把濕漉漉的婦女送到她丈夫跟前，一場家庭悲劇戲劇性地結束，大家鬆了一口氣散去。另一個插曲是一位老年旅客心臟病突發死去，時值盛夏，氣溫極高，當時沒有空調，船上也沒有冷凍設備可以保持屍體十幾天不腐爛，經家人同意實行海葬，把老人抬到甲板，覆上國旗，輪船停駛，奏哀樂，把老人連榻用滑輪送到海面，收回繩索，老人沉入海中，船隻繼續西駛。老人是旅越法僑，想落葉歸根回到故鄉安度晚年，卻猝死葬身大海。前者婦女不欲生而求死，但死到臨頭，求生心更切，終於獲救。

郵船在印度洋中行駛了十多天，季風肆虐，終日海浪咆哮，又不斷降雨，真是風雨交加，旅客不能站立，終日躺在艙中床上，無聊之極。天上無飛鳥，海面無游魚，除了看到已經熟悉的面孔，見不到其他任何生命。

為避免正面和季風頂沖，船長改變航向，延誤了時間，食用水又告急，船長決定臨時在亞丁停靠補充用水。

郵船減慢了速度，遠離季風帶，風平浪靜，雲中露出太陽，人們漸漸望到海岸，擁上甲板的旅客頓時歡呼起來。人不能無土地，也不能離開人群。

亞丁位於印度洋與紅海接壤處，是歐亞貿易必經之地，尤其蘇伊士大運河開通之後。它位於紅海之口，英國把它佔領，先作為託管區，後乾脆把它作為殖民地並建成重要軍港（1967年11月也門共和國成立，亞丁成為首都）。我上岸後發現亞丁築在岩石之上，整個城市呈灰色，無一片綠色，因為沒有土，寸草不生，偶爾見到幾棵樹，也是運來黑土才能種植，大風一起，土層被捲走，樹木又枯死。市內沒有農業，沒有種植業，沒有畜牧業，蔬菜水果肉類全部進口，但有工業，有極大的煉油廠（阿拉伯半島盛產石油）。亞丁有士兵，有工人，有公務員而沒有農民。亞丁有一所主母會修士辦的很好的中學，我們去參觀，修士們熱情招待我們。

船駛入紅海，頓時想起了古經上所記載梅瑟帶領以色列人民逃離埃及前往福地時，怎樣走過紅海，法魯王率領軍隊追趕他們時淹死在紅海之中的故事。然而見到紅海，發現紅海並不紅。海面非常遼闊，如果海水中斷，讓一大群攜老帶小的以色列難民拖著疲憊的身軀徒步前進，兩旁海水豎立，形成一座宏偉的液體大壩，直插雲霄，何等壯觀？這樣持續幾天幾夜，當法魯王率領大軍追殺過來，也走進紅海之底，剎那間液體水壩傾倒下來，把追兵全部淹死在大海之中。這樣驚天動地的一幕，既壯烈又悲慘的場面真是曠世罕見的奇跡，為什麼未見正史記載？我不禁沉思起來。

船進入蘇伊士運河，紅海與地中海幾乎隔岸相望，但這岸實際有200公里闊，把兩海隔開，卻把亞非兩大洲接連起來。自古以來，從意大利、西班牙、法國等地去亞洲，船隻不向東行而是往西駛入大西洋，揚帆往南航行約8,000公里，到達好望角，繞過南非再沿非洲東海岸往北6,000多公里，才向東駛向亞洲。這樣繞一個大圈子需多走萬多公里。19世紀法國工程師斐迪南（Ferdinand de Lesseps）認為必須在亞非接壤處開一條運河，可省時又省錢。他到處奔走呼籲，實地考察、設計、籌集資金，歷盡千辛萬苦，費了十多年時間終於實現他的夢想，運河長190公里，深20米，寬67米（後加寬、加深），造福人類，他功垂千秋。也是他設計開通了南北美洲之間的巴拿馬運河。我們的船在運河入口處蘇伊士和出口處塞得港各停半天，才進入地中海駛向法國馬賽市。

當時地中海尚未污染，海水碧藍，海面平如鏡，行駛在地中海的幾天裡，天高雲淡，傍晚時分，夕陽照耀海面，霞光萬道，天空佈滿星辰，使我不禁不斷念叨：「大海，請讚美天主！」

不幾天駛近馬賽，遠遠望見山上大堂尖頂的護愛聖母銅像。馬賽是個古城，紀元前就是港口，居民不是漁民就是海員，他們出海前都祈求聖母護佑他們平安歸來。在與海浪搏鬥時，他們把希望寄託在聖母身上，在岸上的家屬也去祈求聖母保佑家人平安回家。我從上海登船到馬賽下船，在船上共32天，現在乘飛機從上海到巴黎只用12個小時。

法國卒試 (1947-1948)

馬賽的一位老年輔理會士來接我們三人，他幫我們辦入境手續，取行李，然後去耶穌會院。

1947年夏，距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已兩年，港口裡仍見到不少被擊沉的船隻，只有桅杆或煙囪露出水面，人們顧不上打撈它們。行走在大街上，到處可見斷牆殘垣，滿目淒涼，使人倍感戰爭的可怕，人類需要和平。

在馬賽停留兩天，第三日乘快車前往巴黎，列車早上8點鐘開，晚上10點鐘到達，800公里走了14個小時，今日高速鐵路只需要3個小時。幾位年輕的會士候在車站，接我們到德格勒內勒大街(Rue de Grenelle) 42號的耶穌會巴黎省總院。第二日我們三人去拜見了省會長皮德神父，他見我們到了，非常高興，讓我們先參觀巴黎，然後去參加他建議召開的省際研討會，主題為耶穌會如何在促進世界持久和平中做出貢獻。

來巴黎的會士很多，來辦事的、旅遊的、過境的。理院神父招待他們，很忙。他告訴我1946年一年招待過二千多會士。依照住會院的天數為前來的會士安排若干彌撒，一天一台，不收其他費用，教會中有此慣例，拉丁文說 *Ubi Missa, ibi Mensa*，意即凡有祭桌就有飯桌。

我和法國耶穌會修士一起生活將近十年，所以飲食方面很適應，但也有尷尬的局面。午餐最後是一小盤水果，往往是一串葡萄，我開始依照中國人的吃法把皮與核吐出來，然而一看周圍的人都連皮帶核吞下，我只好不吐，可也吞不下去，只能把皮核含在嘴裡，越含越多，旁人和我說話也不應答，只是微笑，好不容易等到院長打鈴念飯後經，整隊出餐廳去小聖堂拜聖體時，溜進廁所將其吐出。

到巴黎後，理家神父把朱樹德和我領到巴黎警察局去報戶口，然後可以領證取得糧食。當時憑證供應，每人每天供應黑麵包（摻有玉米粉）500克，以後減到每天只250克，其餘吃土豆。我覺得伙食比上海差。美國有馬歇爾計劃，向歐洲輸送包括農產品等許多物資以解決饑餓問題，並借款或贈送資金以幫助歐洲重建工業。法國認為接受嗟來之食有損國家尊嚴，起初不接受，其餘國家加入這項計劃，民生立即改善，經濟復興迅速，法國意識到拒絕外援的路線顯然是錯誤的，也就加入了。百姓立即有白麵包，有大量肉類，跟上了其他西歐國家。

巴黎曾是法國及歐洲的文化中心，屬世界級的美麗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納粹德國入侵，法軍節節敗退，法國政府宣布巴黎為不設防城市，自動撤退，德國飛機大炮沒有轟炸巴黎，巴黎得以不受損失，否則如果戰火燃燒，巴黎會成為廢墟。正如後來我國解放戰爭，蔣介石下令死守北京，不惜玉石俱焚，傅作義將軍起義和平解放北京，北京才得以保存。

在法國的耶穌會派兩名年輕會士陪我們參觀巴黎市，首先當然要去看聖母大殿（或譯巴黎聖母院）和耶穌聖心大殿。宏偉的聖心大殿建築在郊外一座小山上，山腳下有女修院，聖依納爵和他的初期同伴在那兒發了願，耶穌會形成了。我在那兒也獻了祭，求天主賞賜我能終身為合格的耶穌會士。

除了聖堂，我們還參觀了博物館，去了凱旋門，有九條大馬路以該門為終點，極為壯觀。並在香榭麗舍大街和沿塞納河散步，使我感興趣的是河畔上有許多舊書店。又去了埃菲爾鐵塔，因為沒有錢買票，只能在下面往上望。以後我多次去看鐵塔，每次票價都在上漲，總是買不起票。後來去巴黎時身邊有錢了，可沒有時間去玩兒，至今也沒有登上鐵塔。

巴黎市的建築有一個特點，政府不准許建高樓，這樣就使每處屋頂上都能看到巴黎市區的全景，無高樓擋住視線，摩天大樓只能建在市區外。這和我國開發大都市的理念不同。北京的城牆不見了，四合院也拆得差不多了。

我們也參觀了耶穌會在巴黎管理的幾所中學和社會問題研究所，我去了《學習》雜誌社，拜望了我所欽仰的婁白東神父，他是著名的神學家和聖經學家，我讀過他的許多著作，他熱情地接待了我。

我也拜望了德日進神父，他是世界聞名的古生物學家和思想家（前面我提到過）。由於他的超前思想，揭發、控告他的信件像雪片似的飛到羅馬。他去羅馬想為自己辯護，當時耶穌會總會長楊森斯（Janssens）是研究天主教法典的專家，他信任的比利時同鄉神學家丹尼斯（Edouard Dhans）神父等，都反對「新現代主義者」，無法理解德日進，也不為他辯護。羅馬許多以道明會內加里古·拉根奇（Garrigou-Lagrange）為首的神學家大力攻擊他，一次集會上德神父指著拉根奇向他人說：「此人真想把我燒死呀。」後來德神父只能離開歐州，去比較開放的美國紐約耶穌會院以避風浪。離開巴黎時他想把自己的著作交給《學習》出版社，院長及總編杜安斯（d'Ouince）勸他說：「放在我這兒，肯定不能出版，因為必須得到教會當局的審查和批准，進步書必遭封殺，不如交給一個可靠的友人，請他保管，由他設法出版。」德聽了院長的話，交給了他可靠的朋友。此人在德死後把他的書出版，風行全世界。德在美國耶穌會過著類似隱修士的生活，1955年耶穌復活瞻禮日蒙召歸主，送往墓地的只有十來人。

耶穌會省際和平推進會於巴黎附近凡爾賽召開，凡爾賽宮原是路易十四世建造，為他和朝廷大臣及貴婦享福作樂之用。1919年第一次大戰結束後的所謂和平會議，就在凡爾賽宮內的明鏡廳（四周牆壁皆為明鏡）內舉行。這次會議是列強的分贓大會，對弱國尤其對我國不公道，而對德國與奧地利特別苛刻，簽字日主持會議的法國總理克里蒙梭（Georges Clemenceau）用極輕視的口吻高聲道：「把德國人帶上來。」以羞辱德國人，種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種子。會議又把德國在我國山東的特權轉給日本，對德國人民、中國人民都是一個國恥。

耶穌會在凡爾賽有一所很著名的日內維爾學校（Ecole Sainte Genevière），學生都是高中畢業生，為報考法國名牌大學做準備而來，學習期為兩年，校園很大。

和平推進會與會的除了法國四位省會長和會士，還有來自包括美國在內的不少省會長與教授們，濟濟一堂，皮特省會長致開幕詞。他說年前為選舉新總長而待在羅馬時和許多省會長交談，發現彼此關心的問題基本相同，尤其是如何培養年輕一代追求和平、熱愛和平、促進和平的精神，他感到即使在耶穌會內部仍缺少溝通、缺少合作，為此他召開這樣一個非正式的會議。大會請了許多位專家作報告，如：馬克思主義專家加斯東·費薩特（Gaston Fessard）、《學習》雜誌總編杜安斯、神學

家德呂巴克 (de Lubac, 不久被打倒, 後又升為樞機)、德日進和他的助手勒羅伊 (Pierre Leroy) 等。在發言中, 一位美國的省會長說:「我們討論的問題極重要, 尤其應在青年中播下和平的種子。我注意到, 在這所學校內掛滿了第一次大戰、第二次大戰的照片, 法國青年看後只會激起對德國的仇恨之心, 我建議法國耶穌會在這兒和其他學校內換下這些照片。」他的發言博得了長久的掌聲。一次我在一個旅社內和一個法國青年講應對德國人民友好, 他斬釘截鐵地說:「不可能。」我說:「將來我們都要去天堂, 會永遠在一起。」他回說:「天堂上有德國人, 那我不去天堂了。」可見法德人民之間仇恨之深。幸而第二次大戰後法、德、意出了三名偉大的政治家: 德國的阿登納 (Conrad Adenauer)、意大利的加斯貝利 (Alcide de Gasperi)、法國的舒曼 (Robert Schumann), 他們主張法、德間應消除仇恨, 彼此友愛, 先來煤鐵共管, 資源同享, 以消除挑起戰爭的根源。他們認為戰爭實際是由資本家的貪婪、爭奪資源、控佔市場而爆發的。為此簽訂羅馬條約, 逐步發展成今天的歐洲共同體公約。現在歐洲共同體人民之間沒有仇恨, 法、德人民友好相處, 戰爭發動不起來了。

會議後, 在上海傳教時曾任巴黎省耶穌會傳教部主任的賴神父 (de la Largère) 來找我, 說他新買了一輛汽車需要磨合, 問我是否願意與他一起旅行。我當然願意, 於是乘了他的汽車, 訪問了埃夫勒 (Evreux)、魯昂 (Rouen)、托魯斯 (Tours)、萊蒙 (Le Mans)、拉瓦 (Laval)、普瓦捷 (Poitiers) 等城市, 參觀了許多大教堂和耶穌會辦的學校。拉瓦有耶穌會初學院, 見到了兩位認識的人, 一位是養病的老神父, 姓廖, 外文名 Alliaume, 曾在上海橫沙島上當過多年的本堂和徐匯大堂副本堂, 他身在法國心在中國, 希望病好後再回上海。另一位是個青年, 名德馬爾熱里 (de Margerie), 震旦大學法學院畢業, 他的父親曾是法國駐上海總領事, 當上海還有法租界時, 總領事權大, 此人是一名不進教堂的天主教徒, 其夫人極虔誠, 我沒有想到這名青年會進耶穌會。兩人見了我十分高興, 這名青年後來又偷偷去蘇聯傳教, 2003年死在巴黎。

汽車在法國西北部走了一圈回到巴黎, 我再去凡爾賽, 那兒有八名要求去中國傳教的青年會士在讀中文, 教他們的是兩位 Oratoire 會的修士, 一位姓吳, 江蘇蘇州人; 一位姓黃, 安徽人。他們兩人愛唱京戲, 愛拉胡琴, 每天晚上給我們唱幾段, 他們原是共產黨員, 在黨內的地位很高。蔣介石 1927年4月大規模反共時逮捕大批共產黨人士, 因他們兩

人家境富裕，父母送他們到法國避難，先在里昂大學念書，接觸到耶穌會士後，他們拋棄了馬列主義，改信了基督，領了洗，他們請德呂巴克神父為神師，決心棄家修道，終身宣傳福音。他們想加入耶穌會，呂神父認為根據他們的個性參加 Oratoire 修會更適合，他們成為該會會士，後成為神父。黃會士把《老子》譯成法文，是我知道的眾多譯本中最貼切原意的一部。我的一位好友高里埃 (R.P. Golliet) 也是該會會士，我建造光啟培訓中心時他捐了鉅款，他不願留名，只說：「用以紀念吳、黃兩位中國會士。」1951年我回國前又見到他們，他們說和劉少奇、周恩來等是朋友，他們回國一定沒有問題。今日想來他們如果回國，一定作叛徒、特務處理，關進監獄，受盡折磨而死。

在凡爾賽學中文的會士中，大多數去了中國，新中國成立後，一位名叫勒古韋羅 (Legouvello) 的去了台灣，死在那兒，其餘的回法國，其中一位名叫比徹姆 (Beauchamp) 的成為著名的聖經學家。

10月16日我和朱樹德神父離開巴黎去里昂附近巴萊慕尼亞 (Paray-le-Monial) 的高隆汴會院報到，開始卒試。顧名思義，卒試是最後一次實習、考核，為耶穌會所獨有。耶穌會入會初試，即初學兩年，兩年後可發初願，此後讀書，文、哲、神學等，聖神父後有一年的卒試，也稱第三年初學，卒試後可以發終身願。訓練期結束，成為正式會士。

巴萊慕尼亞是一座小城，因耶穌聖心在那兒發顯給往見會修女瑪加利大而聞名，也吸引許多女修會來此設分會，許多教友來朝聖，成為著名的朝聖地。

已報到的有三十餘人，其中來自美國兩人、黎巴嫩一人、埃及一人、巴西一人、阿根廷一人、中國兩人，其餘都是法國人。2003年我去法國訪問時了解到他們都已蒙召歸主，只有我一人尚留人間。神師即導師為一位老神父，名韋尼爾 (Verny)，已七十多歲，第一次大戰時失去一臂，他大半生在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度過，曾在耶穌會辦的聖若瑟大學擔任教務長多年。他愛黎巴嫩，講課時不斷提到他在黎巴嫩的經歷，經常講黎巴嫩的美麗和當地人民的和諧，殊不知它現已淪為戰事頻發的地區。

卒試專務神修，每隔一天，神師神父向我們講神修課，並詮釋耶穌會會規。加強神業功夫，多做默想、祈禱，多閱讀聖書，最主要的是做一個月的聖依納爵神操，又去堂區講道四十天。這四十天院內無人，朱

樹德利用這段時間去巴黎大學聽課寫論文，神師派我到里昂耶穌會神學院去。

該神學院位於里昂城外富爾維耶山丘(Fourvière)頂端處，離著名的無原罪始胎大殿和總主教府很近。當時的神學院充滿活力，雲集許多有名的神學家如德呂巴克、邦西爾旺(Bonsirven)以及楓多瓦農(Fontoinon)、加納(Ganne)、杜蘭德、龍代(Rondet)等，他們主張神學應回歸泉源即聖經與教父，用現代人的語言表達猶太、希臘所傳下的基督原意。富爾維耶神學院的影響極大，使傳統的神學家們感到恐慌，他們的揭發、告密信件不斷地送到羅馬。凡有團體，即有打小報告者，領導們也往往喜歡聽小匯報，古今如此，中外也如此，無例外。耶穌會總長派他的親信，同是比利時人丹尼斯神父作為巡視員，視察法國耶穌會的兩個哲學院、兩個神學院，尤其以富爾維耶神學院為重點。其結果就是1950年教宗庇護十二世(Pius XII)發表「人類」(*Humani generis*)通諭，隨後徹底改組富爾維耶神學院的教師隊伍，把原有教授調出，調進一批保守派的老師。

我在神學院時，院方安排我住在德呂巴克神父旁邊一室，我有機會和他長談，受益匪淺。他在里昂大學教書，教授宗教學。他領導一批青年，成為他們的指導司鐸。他和達尼埃盧(Daniélou)神父合作出版教父們的著作，稱為「基督教泉源」叢書，銷路很廣。達尼埃盧後任巴黎天主教大學校長，又升為樞機。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法國男子應徵當兵，工廠缺少勞力，中國北洋政府輸送了許多中國青年去支援，使工廠得以繼續開工，維持生產。庚子賠款協議，法國政府退還一部分款項，中國在法國里昂辦了一所中法大學，一時間里昂華僑特多。耶穌會在里昂創辦一個「中國僑民之家」的小機構，為華僑服務，星期日我去服務。我很佩服勞工中的一名青年，溫州青田人，他家極窮，文化程度也不高，但他決意闖天下，挎著一籃青田石，一句外語也不懂，卻從溫州出發經東北，經西伯利亞，經烏克蘭、波蘭、德國直到里昂。幾年後他娶了一位漂亮的法國姑娘，開了一個不小的店鋪，專賣皮件，溫州人真了不起！

有人告訴我，離我們會院不遠處有一座著名的苦修院(Trappists)名叫七泉院，院規極嚴，會士入院後終生不出院門，專務祈禱和勞動，天天唱大日課，半夜也需要起來集體祈禱，嚴格守默靜，只和天主交談。解放前在我國河北省楊家坪和正定有這種苦修院，我的兩個同學在那兒

讚美天主，一位叫朱似碧，是上海青浦蔡家灣人；一位姓尤，名鍾傑，上海若瑟堂教友，我很欽佩這類苦修士。一天，我向導師請了假，去七泉苦修院祈禱，接待我的修士很高興地告訴我，修院中有一名年輕的中國修士，並叫他來陪我。很快來了一個很英俊的青年，他說一口標準巴黎口音法語，但他不會講中文。他自我介紹叫王川，只會寫這兩個字，姓王即三橫一豎，名川即三豎。他父親是國民黨外交官，母親是商務印書館董事李執可的女兒，他父親原本在巴黎國民黨大使館任職，調去南美洲時把幼小的王川寄養在一個法國友人家中，於是他只會法文，不會中文。大戰結束後父母來看他，不懂法語的父親只能通過懂法語的母親作翻譯來交談。他在寄父寄母家中看到聖女德肋撒 (Teresa of Lisieux) 的《靈心小史》(The Story of a Soul)，大受感動，皈依了天主教，畢業後經過思考、祈禱，決定棄家修道，選擇最嚴格的苦修院，終身為全人類祈禱做苦工。他離開巴黎冒險越過德國佔領區的分界線，進入維希政府控制的地區求進七泉修院。我們交談甚歡。我回國後一直和他保持通信，直到我被捕入獄止。我聯想到吳經熊博士也因閱讀《靈心小史》而皈依天主教，聖女小德肋撒不愧為傳教主保。

在卒試院時，導師邀請有名的神學家和社會活動家來院裡做講座，許多名人的報告我都不記得了，但一位耶穌會工人司鐸的演講卻深深打動我的心，迄今未忘。這位神父年齡40左右，中等身材，方方的臉，穿著一身工人衣服，滔滔不絕向我們介紹他的聖召，他說：

過去，法國是以農業立國，教會紮根於廣大農民之中。每一個村落，中心是教堂，旁邊有一所教會辦的學校，另一側是公墓。教友們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歸，然後去教堂念經。所有的人都是出生後在聖堂領洗登記，幼年、少年在教堂的學校念書，大了在教堂內領受婚配聖事，死後埋在教堂的公墓內，教堂是農民生活的中心。有事去詢問本堂神父，有糾紛本堂神父為他們仲裁。千百年來一直如此。

工業革命了，城市開了工廠，農村的多餘勞動力湧入城市，他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也沒有自己的房屋，擠在資本家為他們蓋的簡易棚房內。他們也脫離了教會，脫離了本堂神父。資本家殘酷剝削他們，卻又無人出來保護他們，替他們說話，他們心中滋長了孤獨和仇恨。孩子們沒有人照顧，受不到

教育，兩三代下來工人們失去家園，失去宗教信仰，成為工人階級，淪為社會最底層的無產階級。農民人數逐漸縮小，工人隊伍不斷擴大。他們與貴族、與資產階級、與教會對立，階級矛盾激化，社會動盪不安。

這位神父說，過去的主教、院長都是貴族出身，他們更多想到的是為富人服務而很少為窮人服務。二百年來，教徒人數少了，無神論者多了，無產階級中沒有教會存在。教會必須對無產階級進行福傳工作，不要只在工人以外福傳，而是要深入工人，以身作則，重新福傳，於是掀起了一個工人司鐸運動，司鐸不應養尊處優過資產階級生活，而是要成為工人，和工人一起勞動，過無產階級的生活，工人才會接納你，才會聽你、信你，才會再做基督徒。他說，工人司鐸的生活很艱苦，住的是一間小屋，沒有像樣的家具，你生活豪華了，工人不會理睬你。吃的不能超過工資的收入，穿的是廠方發的工作服，或從市場裡買的最廉價的衣服，別的工人八小時後可以回家休息，對我們來說工作才開始，訪問工人，幫助窮人，我們應拋棄華麗的辭句、文雅的舉止，而學會樸實的語言、粗獷的性格，使工人接納你，不認你為異類。

他說，有一次，一名工人在垃圾筒內撿到一隻死兔子，燒了請他去吃飯，他必須與這名工人一樣高興地同嘗這頓美餐。久而久之，工人司鐸和工人們有了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價值觀念、共同的利益。工人司鐸也加入了工會和工人們一起和資本家鬥爭，一起抗議，一起遊行，有的也遭到警察逮捕。上世紀40年代末，工人司鐸運動日益博得工人階級的歡迎，但也引起資本家和上層社會的不滿，他們認為這批工人司鐸不務正業，惹事生非，有失司鐸的尊嚴，揭發的信件又飛向羅馬。教宗庇護十二世也表示出否定的意見，巴黎大主教莫里斯 (Maurice Feltin) 特去羅馬拜見教宗，為工人司鐸辯護，但教宗不聽這位主教的意見，下令禁止司鐸再去當工人，這個蓬勃發展的運動就此夭折了。有一些工人司鐸不願離開工人，繼續當工人司鐸，但也是少數而已。很多人為後繼無人而感到惋惜。我心中深處向工人司鐸致敬。

過了復活瞻禮，我回到卒試院。一次我被邀到一所女子中學作報告，介紹中國教會，事後一名婦女帶她的女兒來院找我的神師，說她的女兒聽了我的報告後，決定將她歷年來的積蓄約1000美元捐給中國教會，我十分感動，這女孩名叫德肋撒。我也被邀請去馬貢 (Macon)、克

來左 (Creuzot, 鄧小平曾在此做過工人)、歐坦 (Autun) 等地大修院介紹中國。在聖福瓦 (Sainte Foy) 堂區，一個名叫 Raphael Cannard 的小孩子給我寫信說，他一直是一個頑皮的小孩，不用功讀書，聽了我的講道後決心做一個好學生。我和這兩名小朋友一直保持通信，被逮捕後失去聯繫，我一直想念他們。我在巴萊慕尼亞時多次被派往堂口幫助做彌撒、聽神工，使我更了解小城市和農村的法國老百姓。

學習英語

卒試結束前我向省會長申請去愛爾蘭學英語，省會長批准了。我打算先去比利時昂奇恩(Enghien)神學院。一名會士知道我要去比利時，來找我說，他的姑媽明天下午將回比國，問我可願意搭她的車。我當然願意，第二天下午她和丈夫來會院接我，這節省了我好多錢，他們很友好，他們家在科特賴(Courtray)，離里爾(Lille)市不遠。車行四個小時到他們的家，好大的房子，好大的花園。然後他們送我上火車站，給我買了車票，約一個小時就到目的地，參加了好友特里茨兄弟的晉鐸禮和慶祝禮。

離開昂奇恩我去了布魯日(Bruges)市的聖安德肋(Saint-André)本篤會隱修院，陸徵祥在那兒，我得去拜望他。陸是上海人，原信基督教新教，少年時考入清朝培養外語人才的學校，後進入外交部，派在清朝駐沙俄使館工作，與比利時駐沙俄大使的甥女結婚，而改信天主教。他聰明勤奮，許景澄大使很賞識他。後來許調回北京，適逢義和團起義，高呼扶清滅洋口號，又稱刀槍不入，慈禧太后開始利用義和團，滿以為他們真能把洋人趕出中國。許認定義和團盡說假話，是一群烏合之眾，只能搞亂中國，就上書勸阻。為了博得義和團的支持，慈禧下令把許推出午門斬首。陸徵祥升任駐俄公使，辛亥革命成功，袁世凱成大總統，把陸召回北京，任命他為外交總長，一度曾為內閣總理。袁世凱有野心，想做皇帝，日本軍國主義提出二十一條條約，妄想獨佔中國，袁屈服於日本的威脅，下令陸簽字接受，陸認為這是他一生的污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1919年協約國召開凡爾賽和平會議，陸任團長參加，美、英、法把德國在山東半島的特權轉給日本，引起我國人民強烈的抗議，爆發五四運動，陸與團員顧維鈞拒絕簽字，乘船回到上海，受到人民的盛大歡迎。他夫人生病想家，陸辭去外交總長職位，陪夫人回比利時，

北洋政府任命他為駐瑞士公使。夫人病重，因病痛而不斷發出呻吟，陸向她說，如果她蒙召歸主，自己就去隱修院，夫人聽後，內心頓覺平靜，忍受病魔折磨，不再叫痛。他們沒有小孩，只領養過一個女兒，夫人去世後，料理完後事，他著手進行修道之事，經過考慮選擇了比利時的本篤會，院長收到他的申請後表示歡迎。日子一到，他的親友陪送他去布魯日，隨帶行李十四大箱，院長驚呼說，那麼多呀！陸回說，他每次赴任至少四十箱。經過培訓，他發了願，1935年他在剛恒毅(Celso Costantini)大主教手中接受了鐸品，這天他的好友顧維鈞等去參加典禮，他要求院長不另設宴席，讓他的親友和會士們一起用日常的餐飲。

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我國，院內靜修多年的陸徵祥待不下去了，他去各地演講揭露日本的罪行，由於他的特殊身世，吸引許多聽眾。他也發表不少文章呼籲各國伸張公義，後半生真正成為愛教愛國的楷模。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羅馬教廷任命他為歷史上有名但已消失了的一個修院的院長，他有院長名銜而不必負院長的責任。我去布魯日，他的秘書諾伊特(Neut)神父負責接待我，此人深愛中國，深愛陸氏，視之為父；他也研究漢學，精通中國的思想史，他在生活上無微不至地照顧陸院長，每晚為陸洗腳，有時還為陸通大便，他既是秘書也是兒子，陸氏晚年能有這樣一位會士陪伴著，真是有福。秘書告訴我陸有遺囑，死後靈柩要運回自己的祖國。

諾伊特神父告訴我：「陸院長身體不太好，自己不舉行聖祭，他將望你的彌撒，彌撒後接見你幾分鐘，不要多講話。」我見他進入小聖堂，穿普通會服，五短身材，白白的臉，很瘦小。彌撒後我去他臥室，一床、一桌、兩把椅子、一個書櫥、一個衣櫃，牆上掛著他自己寫的兩個字「慎獨」。他請我坐下，他頗矜持，以長者的口吻和我談話，快結束時我向他說，我代陸隱耕、陸納英一家向他問好，並說明我和陸家的關係，他頓時高興起來說：「我和陸伯鴻先生一家是聯了宗的，伯鴻先生是教會的功臣，我很欽仰他。」這樣我比預計的時間多坐了十來分鐘。

我去大廳，看到牆上掛滿他帶入會院的中國書畫，茶几上有些古董，我是外行，只知道這些東西很值錢。陸死後，院長撤去這些文物放在倉庫內，後任院長認為應清理一下，請在巴黎的中國神父衛青心來鑒定，保存貴重的，處理一般的。衛神父趁此機會向管倉庫的會士要去了好多，凡是他自己喜歡的就說：「這個不值錢，給我吧。」修士說：「拿走吧。」衛死後，這些物品不知落在誰手。

我參觀修院會士辦的一所很好的中學，還有一所規模不小的印刷廠，他們編了一本《教徒手冊》(*Le Livre du Chretien*)很實用，銷路極廣，先後印了幾百萬冊。

1949年1月陸徵祥病故，他留下遺囑，請把他葬於中國。由於時局關係，遺囑未能實現，就葬於會院內。我1990年去比利時，到他的墓地為祖國祈禱，同時我想，如果1949年靈柩運回上海，將和上海去世的多位主教一樣遭到紅衛兵的破壞，掘出屍骨撒在路上。上海四百年來埋葬神父、修士公墓的場所，南市聖墓堂，包括明末清初著名畫家吳漁山的墓，都無一例外被破壞。

離開布魯日去奧斯坦德(Ostende)，乘船到英國的多佛爾，上岸過海關，邊防官員問我帶多少錢，我回說：「20磅。」他驚奇地說：「這麼少？」我回說：「我是耶穌會士，凡有耶穌會院就是我的家。」過關後改乘火車，當時火車還是蒸汽機車頭的，燒煤做燃料，每小時只跑60公里，過隧道時必須關窗，否則大量煤灰吹進來。下車後去耶穌會 Mount Street的主要會院，會院對面就是柯南·道爾(Conan Doyle)寫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時所描寫的白克(Baker)路221號。常有遊客尤其是美國人前去參觀，我也去看了一下。

每天清早做好彌撒，吃了早飯，就拿著一張倫敦市地圖和遊覽指南，一個人去參觀教堂、博物館、美術館、白金漢宮廣場、泰晤士河、海德公園等等。西敏寺內有許多名人的墓，包括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納粹曾對倫敦狂轟濫炸，到處仍能見到戰爭的創傷，許多場所滿地斷牆破瓦，戰爭已結束三年，尚未清掃完畢，滿目淒涼。

一天晚餐後，我和理家長談，他先說起我和去年來的中國神父王哲不一樣，王整天關在房間裡什麼地方也不去，我則整天在外跑。我說，關在室內不如留在家裡。他問我對倫敦有什麼感想，我說自幼知道倫敦，也想看倫敦，今日完成了心願。可惜倫敦破壞得厲害，戰爭真可怕，和平可貴。他說古代羅馬人有句名言：「你要和平嗎？就準備戰爭吧！」(*Si vis pacem, para bellum*)第一次大戰後，協約國認為敵人已徹底垮了，偃旗息鼓，安享和平，享福作樂。德國納粹上台後，全力搞軍備，大造戰鬥機、坦克。英法企圖躲避戰爭，節節讓步，不斷妥協，滿足希特勒的要求，一廂情願地想以此求得和平。法國總理達拉第(Daladier)、英國首相張伯倫(Chamberlain)飛往慕尼黑謁見希魔，卑躬

屈膝，於1938年9月28日深夜簽了慕尼黑條約，拱手把捷克大部分領土送給德國。張伯倫飛回倫敦向歡迎他的群眾說：「我保證你們有二十年的太平日子。」英國人民高聲歡呼和平萬歲，然而不到一年，希特勒與斯大林結盟瓜分波蘭，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法國由於沒有準備戰爭，德國軍隊長驅直入，俘虜了150萬法國軍隊，法國只能屈膝投降。這位英國神父說：「沒有軍事實力的國家，將受人欺侮，敵人就會侵入，羅馬人的話有道理。」

在倫敦我印象最深的有三個人。一次我在倫敦市中心迷了路，就去找站崗的警察，他詳細地和我講去目的地的路線和應該乘什麼公共汽車，非常耐心。我向他致謝並說向英國人學習，他頓時沉下臉說：「我不是英國人。」我說：「那麼是愛爾蘭人。」他說也不是，我反問他：「你究竟是什麼國籍的人？」他挺起胸說：「我是蘇格蘭人。」以後在愛爾蘭，我也領教了愛爾蘭人不喜歡英國人的幾件事。一次一名愛爾蘭友人拿兩個硬幣給我看：一個是英國的，有英國國王的頭像，一個是愛爾蘭獨立後自鑄的硬幣，他說：「你看！這兒不是英國國王，而是一隻豬頭！」

一次我在倫敦大街上走，看見對面人行道有一位穿中國白大褂的人，我仔細一看，原來是神學院中教我們新經的奧地利省耶穌會士蓋特爾(Gaechter)，我就越過馬路向他問好，他見到我高興極了，緊緊擁抱我。第二次大戰時他反對納粹，納粹要抓他，領導把他送到中國避難，第二次大戰結束後他返回奧地利，他向我說了許多中國好的話，他說他喜歡中國，他在大街上穿了中國大褂就是證明。他教的書是什麼內容我都記不清了，只記得他一句話，當時我們有一首歌開頭是：「耶穌會，我們的母親。」他說：「母親，不要太多，我們有聖母為母親，有教會為母親，夠了！不如唱：『耶穌會，我們的家』吧！」

一個星期六晚餐後，在食堂工作的一名小青年來見我，說：「神父，明天我休息，我想陪你遊覽一天，你歡迎嗎？」我回說：「當然！」第二天一清早他就來了，穿一身整齊的衣服，領我去了好多地方，包括動物園，他搶著買票，中午又請我吃快餐，傍晚送我回會院。我緊緊握著他的手說謝謝，他說：「不用謝，只要你離開英國時，對英國人有一個好的印象就夠了。」我很感動，說明他真愛自己的祖國，他自願充當形象大使。我想，我自己能做到嗎？我們國人能在國內對外國人，在國外讓外國人留下好印象嗎？

離開倫敦我去了牛津，英國最有名的大學一是牛津，一是劍橋。我去牛津，因為牛津有一耶穌會院，院內有二十名年輕會士，他們在牛津大學攻讀不同的專業，住宿在耶穌會辦的坎庇恩宿舍 (Campion Hall)，宿舍名為坎庇恩，以紀念在英國去世的耶穌會會士。院內設一名院長、一名理家、一名神師、一名輔理會士，他們分工不同，但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為學生服務。

一名會士領我參觀牛津大學，牛津大學是英國最古老的大學，略早於1209年創立的劍橋大學，學校組織機構不同於公立的一般大學，大學內有三十來個公學，學生必須向公學註冊，公學內都是本科生。每個公學是獨立的，內有聖堂、餐廳、圖書館、教室、宿舍、校園，都古色古香，學生學習都在公學內。另有六所公學收研究生，學校設總監一人，他不住在內，副總監一個（有實權），下有公學院長組成的理事會，類似政府的內閣，另有一個委員會。在校內，教授都是委員，類似議會。他們在學校中心的行政大樓辦公。

中心還有一座擁有數百萬冊圖書的大圖書館，有許多珍本，所有學生都可前去借閱。自古以來牛津市實際就是牛津大學，醫院、商店等都為大學服務，現在闢有新區，內有汽車工業和其他工業。

英國人喜歡飲茶，工廠、機關下午4時都小休20分鐘，讓工人、職員飲茶。在坎庇恩宿舍，院長告訴我，下午4時必須和全體會士一起飲茶，當時食品供應緊張，什麼都憑票，但在飲茶時總有水果、蛋糕、糖果等。

辭別了坎庇恩宿舍的會士，我乘火車到利物浦 (Liverpool)，住在耶穌會院，參觀了港口。第二天傍晚乘船去愛爾蘭，我的艙位緊靠機房，一夜轟鳴聲，不能入睡，上午到愛爾蘭首都都柏林 (Dublin)。愛爾蘭是一個島國，位於歐洲的最西端，再往西就是大西洋，橫渡大西洋就到美國。愛爾蘭面積7萬平方公里，小於我國的浙江省，人口約300萬。

由於愛爾蘭人民堅信羅馬天主教，英國亨利八世改信新教後，他與他的許多繼任者就對愛爾蘭無情迫害，殘酷鎮壓，無所不用其極地剝削愛爾蘭人民。愛爾蘭人民幾次反抗，由於寡不敵眾，總以失敗告終，並引來更大的災難。經過十幾代人的努力，終於20世紀30年代取得完全的獨立，但很難洗去被迫害的苦難史。第二次大戰時愛爾蘭不喜歡英國，保持中立，沒有受到戰爭破壞。我踏上愛爾蘭國土，感到人民安居樂業的幸福氣氛。當時愛爾蘭是歐洲最虔誠的天主教國家，百分之百的

人領洗，百分之九十的人每主日進堂，公共汽車駛過教堂時，司機總是劃十字聖號（最近隨著進一步現代化，人民也進一步世俗化，進堂人數急劇下降）。愛爾蘭曾是一個農業國家，較窮，大量農民移民去美國，國內人口一直不增長，長期停留在三百萬這個數字。但最近加入了歐洲共同體後，經濟來了一個飛躍，人民生活大大改善。

離開都柏林後去耶穌會初學院，院內有神師神父、理家和幾位老神父，以及二十來名初學修士。初學院遠離城市，設在萊伊什郡 (County Laois) 的艾莫庭院 (Emo Court)，院內有大草坪和一個湖，夕陽照在湖面上金光萬道，藍天、綠草、水面相映生輝，美麗極了。每天下午我都去散步默想，讚美天主的化工。

神師神父指定一名初學修士教我英文，他很認真，每次我說 OK 他就阻止我說：「這詞俗，不登大雅之堂，有教養的人不說，應該說 all right。」事隔幾年，世界各地包括我們中國都說 OK，OK 成為世界上使用最多的一個詞了。

初學院每天用餐五次，彌撒後早餐，11:30 午餐，15:00 正餐，17:30 飲茶，20:00 晚餐，每天花在吃上的時間不少。我從法國來，和法國人民簡樸的生活相比，更覺和平之可愛。

在初學院待了一個月後回到都柏林文學院，一位名叫里德 (Reid) 的修士用心教我英文。里德聖了神父去香港傳教，曾任華仁書院校長多年，退休後留校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一天早上，打掃衛生的工人發現他死在垃圾箱內，他的死是個謎，我很懷念他。

額吾略大學 (1948–1950)

假期滿了，我回到巴黎，從巴黎乘火車到羅馬，到宗座額吾略大學 (University of Gregoriana) 報到。該大學前名羅馬公學，為聖依納爵創辦，已有四百多年歷史，由耶穌會和梵蒂岡高教部雙重領導，位於羅馬市中心，地址是皮洛特 (Pilota) 廣場4號，旁為宗座聖經學院，這兩所高級學府都由耶穌會管理。當時教授都是耶穌會士，來自世界各地，校長保羅·德紮 (Paolo Dezza)，意大利人；教務長兼神學院主任查爾斯·波耶 (Charles Boyer)，法國人；哲學院主任為阿諾 (Arnou)，也是法國人；傳教學院主任迪利亞 (d'Elia)，意大利人，他在上海傳過教，曾把三民主義譯成英文，以後專心研究利瑪竇 (Matteo Ricci)，經手出版利瑪竇全集。另有法學院和歷史學院，我請波耶神父做我的導師，他欣然接受。他指示我，聖若望福音的中心思想乃天主聖父和聖子的合一，以及聖子和我們的合一，耶穌的最終遺願就是讓我們合而為一，應從教父著作中找他們的詮釋並綜合之。除了大量閱讀以外，我也選了幾門課。

額吾略大學、聖經學院和東方學院是耶穌會的重點院校，三者都直屬於耶穌會總長，總長任命一名代表領導他們，當時的代表是法國人德布瓦納 (de Boynes)，曾任耶穌會巴黎省省會長，很關心上海教務，對我很友好，上海耶穌會的許多領導曾是他的學生。

額吾略大學位於羅馬市中心，地理位置雖不在梵蒂岡，但根據意國政府與羅馬聖座簽訂的拉特朗 (Lateran) 條約，該大學屬梵蒂岡，我們的給養來自梵蒂岡，麵包、肉類、蔬菜、水果包括煙酒在內，都由梵蒂岡供應，梵蒂岡不抽稅，東西特別便宜。我們每人每天的伙食比在法國時好得多，每天每人的費用只一美元，一條美國駱駝牌香煙只是市場價的四分之一。

額吾略大學有學生二千多名，當時只收男生，而且只收神父，不收女性，不收平信徒和修女。以後改了，既收平信徒，也收女性，其中有不少是修女。額吾略大學是全世界主教的搖籃，據2001年的統計，全世界三千多位主教中，在額吾略大學讀過書的超過七百多名，約佔四分之一。

當時大學內有六十名駐校教授，都是耶穌會士，另有訪問學者，除了意大利籍外，另有德國、法國、西班牙、比利時、荷蘭、英國、秘魯、哥倫比亞等國會士，沒有亞洲和非洲人。教授中許多是各聖部的顧問，有些具有很大影響。比如校長德紮曾是教宗庇護十二世的神師。萊納(Lernerz)，德國人，是教宗的神學顧問。另有一個人，矮個兒，走路時總是低著頭，沿牆壁走，很少與人打招呼，人家告訴我，他名叫萊布(Leib)，德國人，是教宗的親信秘書。教宗的倫理學、聖教法律顧問也都是德國會士。

大學實際是一座大樓，在市中心，沒有校園，進門是一個很大的長方形廳，開大會時，就作禮堂用。四周從底層到四層是教室、階梯教室，校長、教務長、圖書館主任、系主任都在二樓辦公。大樓最右側有圖書館和檔案室，內有幾百年積下的師生名單和資料，所有碩士、博士論文等，隨時可調閱。四層以上是教師們的生活區，有一夾層，大小飯廳、大小聖堂、休息室在其中。按耶穌會的慣例，除院長外，每位會士只能有一間房，屋頂是個平台，兩邊是一些教授喜歡養的花。當時耶穌會的博士生也有百名住在教授中間，隨時可以去請教所有的教授。我最後一個報到，已無室給我，理家把一個小倉庫騰出給我，沒有窗戶，整天需要開燈。兩個星期後，獻縣教區張基所(一名思德)神父來了，他原是修院院長，理家叫一名輔理會士讓出其居室給他。

所有學生都走讀(除了我們考博士的耶穌會士)，所有學生分別居住在三十多個公學與不同修會會院內，他們各有聖堂、飯廳、圖書室、教室、宿舍等。規模最大的是德國公學，以德語學生為主，包括奧地利、瑞士、匈牙利等國的學生等。也是聖依納爵創立的，有四百年歷史。當時德國青年性直，血氣方剛，容易與人爭吵，甚至在街上打架，聖人讓他們穿紅色長袍，引人注目，也使自己警惕，這種校服沿用到60年代。

德國公學在鬧市區，沿大街下面幾層出租作商店及辦公大樓用，租金昂貴，收入不少。德國公學畢業生不少成為紅衣主教，他們不忘母校，慷慨捐助，公學資產較多，在近郊有一所花園，內有操場，假日裡

學生去休息和運動。在離羅馬100公里，另有一所別墅，內有菜園、花園、運動場、游泳池，復活節和其他假日全體學生前去休養，我也去度過假。德國公學歷年購買了不少良田，租給農民收租金。

我欽佩的兩位偉人

在大學內安頓好後，我急於拜訪兩位我所敬佩的人，一位是剛恒毅總主教，一位是吳經熊博士。

我上面講述了教宗任命的第一位駐華代表剛恒毅總主教，他在華十年，辛勞過度患了重病，不得不回去治療。離開上海時，上海教友送了他一把萬民傘，表示敬愛之心。他康復後教宗任命他為傳信部（後改名為萬民福傳部）秘書長即次長，他全力以赴為傳教區服務。傳信部下屬的傳信大學在他的領導下教學水平大為提高，傳信大學乃是普通大學，只給學士學位，不收研究生，學生聖了神父就應回國。剛總主教認為應為傳教區培養更高水平的人才，他創辦了一所聖伯多祿公學，專收來自傳教區攻讀碩士、博士學位的神父們，他委託聖言會神父管理該公學。蘇州教區的劉德宗神父、海門教區的施安堂神父在那兒攻讀博士學位。他們後來去了台灣，都為台灣教會做出很大的貢獻。剛總主教喜歡藝術，他自己就是一名藝術家，有他的雕刻品傳世。在中國，他提倡中國天主教包括藝術應該中國化，他在中國倡建的輔仁大學、宣化總修院、香港華南總修院都帶有中國色彩。他見到我很高興，和我談了許多話。據說（沒有書面證據）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那一年，中國成為戰勝國，國民黨駐梵蒂岡公使謝壽康晉謁教宗庇護十二世，請求他任命一名中國樞機，他拒絕了，說人選已定，無空額。原定的樞機名單中有剛總主教，他得知後主動去見教宗，要求教宗不要任命他而任命一名中國主教，謝壽康得知後，要求教宗任命于斌或陸徵祥，教宗不喜歡聽別人指揮，任命了青島德國修會聖言會的田耕莘主教為樞機。1953年底護十二世再次任命樞機時，剛恒毅入選，離開傳信部成為掌璽大臣。剛總主教在聖伯多祿公學的一個祭台下面設計了自己將來安葬之處，但1958年10月17日死後，由於親友的要求安葬於故鄉。

吳經熊博士是位才子，浙江寧波人，原信奉新教，早年留學美國，獲法學博士，後又去德國深造，回上海後成為名律師，獲推選為上海律師公會主席。抗戰時避居友人袁家璜家，見到聖女小德肋撒像，又閱讀了《靈心小史》，皈依天主教，寫了《愛的科學》一書。以後他去了重慶，他是法律專家，時任立法院院長的孫科十分賞識他，請他住在他家中，草擬一部憲法。吳在重慶時先用《離騷》的體裁譯了聖詠，繼而用文言文譯了新經，兩次譯文均交蔣介石先閱，蔣通讀了幾遍並作若干修改建議，吳給我看了原稿，蔣的建議，吳都接受。1946年底國民黨政府任命吳為駐梵蒂岡公使。我到了羅馬就去拜見他，他請我吃飯，我見到他的夫人和十三個兒女。他的參贊羅光蒙席（後在台北任總主教，又任輔仁大學校長多年）也在座，他的一個兒子後來修道，參加美國的瑪理諾修會，聖了神父在台灣傳教。吳公使以道德文章博得各方對他和中國的尊敬，教宗庇護十二世也喜歡他，並與他全家合影，其他使節也要求教宗和他們的家人一起照相，教宗回說：「凡帶十三個子女來的，我會和你們合影。」吳公使告訴我，教宗交給他一個任務：把拉丁彌撒經文譯成中文。教宗說，拉丁文雖美，但對中國教友太難了，他想特准中國教會用中文舉行彌撒，教宗這個意願十幾年後實現了。他的繼任人教宗若望二十三世（John XXIII）召開梵二會議後，教會進行禮儀改革，讓世界各國教會都用本國語言舉行聖事。在吳公使身上我見到一位中國大儒，也見到了具有聖德的基督門徒，他自己在額吾略大學作演講，主題就是：「從儒學到基督教」。1948年東北解放後，孫科當了行政院長，急電召他回國，請他當一部長，吳經熊回國後看了國內形勢，向孫科說：「大勢已去，無法挽回，我勸你辭去行政院長一職。我也不再當公使，另謀出路。」他返回到羅馬，接受夏威夷大學邀請去教書，後去美國西東大學（即後來墨菲神父當過校長的那所大學）任教授並創辦了亞洲研究中心，最後死於台灣。

幾位同窗好友

我曾認為要搞學問必須讀懂德文，有人給我出主意，去德國公學學習，我就寫了一封信給該院院長，表示我的意願，隔了幾天他來學校找我說，他歡迎我聖誕假期去。他曾是前任耶穌會總長的參贊，負責德語的耶穌會，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人靠邊站，他被派到德國公學當院長。院內有一位神師神父，名克萊因 (Klein)，原是德國西部的省會長 (於 2003 年去世，終年 104 歲)，另有理家神父和三位補課神父 (也稱複習老師，大學內許多課為大課，學生人數多，無法輔導所有學生，公學內設有複習老師，個別指導學生)。師生們熱烈歡迎我，我先後去度過三個假期。我對克萊因神父的印象較深，他名 Klein，即「小」的意思，他身材的確很小。他很幽默，知道我要學德文，就教了我兩個字：dummkopf，即「傻瓜」；donnerwetter，即「討厭」。這是最先學到的兩個德文字，至今沒有忘記。

我和年輕修士們相處得很好，他們熱忱教我德文，他們都是各教區保送來的尖子，很聰明也很活潑。其中一名擅長攝影，他把照相機放在書包中，開了一個小洞，聽課時，對準教授們偷偷拍攝，取的鏡頭都是教授們授課時的種種怪相，他洗出後給同學們看，同學們都爭先購買，他發了一筆小財。教授們看了，有的哈哈大笑，有的卻很生氣，可又奈何他不得，我也買了一套，可惜後來丟失了。

1986 年我受邀重返德國時，打探四十年前的德國公學學生，他們有的已歸主了，能聯繫到的一名是 Hildesheim 教區的副主教，名叫阿克曼 (Ackermann)，當時已患上癌症，由他妹妹照顧著，他請我吃了飯，後來我再去德國時他已去世。另一次訪問德國，聖奧斯定 (St. Augustin) 聖言會中國中心的主任馬來克 (Malek) 神父告訴我，下午有貴賓來，是聖座駐德國大使，匈牙利人卡達爾 (Kádár) 大主教。我們談了很久，他

很開明，大部分人歡迎他，只有少數人對他不滿。教宗調他去做駐西班牙大使，我去馬德里時，他請去飲茶。他調離德國後見到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說自己在德國很好，和主教們相處融洽，很受歡迎。教宗回他說：「可也有人對你有意見。」事實上，是少數幾個保守派在教宗面前說了他的壞話，要求調走他（駐德大使往往會升為樞機，而西班牙的不易再升）。後來他退休回老家，患癌去世。另一位是著名的神學家漢斯·孔 (Hans Küng)，他著作等身，每有新書出版，都簽名寄給我一本。他曾是梵二公會議專家，和當時的拉辛格 (Ratzinger) 教授很投機，以後分道揚鑣，一位成為主教、樞機、教宗，一位一直被視為持不同意見者，屬另類。他曾寫過一書，題為《永無謬誤嗎？一種探討》(Infallible?: An Enquiry)，這得罪了前任教宗，聖座不准他在教會大學任教，但杜賓根 (Tübingen) 大學仍聘用他直到退休。他來過中國，我請他給修院中的修士講話，有人向老教宗匯報，教宗對人們說：「金主教走得那麼遠，甚至請漢斯·孔去修院講課！」其實我只請他向修士們即席講話，這使我知道為什麼我身邊老有人向上面打小報告，而且言過其實。梵二會議後，一些神學家出版了一份稱作《公會議》的雜誌，為了慶祝梵二會議 25 周年，在比利時開了一個神學研討會，是漢斯·孔建議請我去的。到會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神學家。開幕那天，丹尼斯 (Danneels) 樞機到會，主席台上就坐的有漢斯·孔、雷奧那多·波夫 (Leonardo Boff，方濟各會會士，解放神學專家)、希萊貝克 (Edward Schillebeeckx)，還有我，人們看到這些多多少少持不同意見者成為貴賓，就知道會議的大方向。那時我沒有發言，我知道羅馬在密切注意我，還是沉默較好，沉默是金。另一次在美國休斯頓 Rice 大學開一個神學研討會，也是漢斯·孔提議請我去的，我介紹了中國教會。我一直很尊敬漢斯·孔，他不斷努力把二千年前用當時人的語言啟示給全人類的真理，用今天人們所能聽懂、所能接受的語言來闡述而不失原意，用心良苦，我欽佩他。新教宗本篤十六世 (Benedict XVI) 上任後，漢斯·孔給他寫了一封信，教宗立即回信，並在夏宮接見了他，兩人暢談四個小時，教宗又和他共進晚餐，這就恢復了他的名譽，教宗這個舉動在普世教會中反應極好。大家都說，拉辛格教授成為本篤十六世後，換了一個人，但有人說：「未必，應拭目以待。」

另一位成為重要人物的是慕尼黑大主教魏泰爾 (Friedrich Wetter) 樞機。慕尼黑是巴伐利亞州的首府，巴伐利亞曾是王國、共和國，加入德

意志聯邦最晚，庇護十二世年輕時曾當過教廷駐巴伐利亞大使，以後改任駐柏林大使。慕尼黑教區為德國第二大教區，有教徒200萬。我去德國公學時，他已是神學二年級學生，他考取博士後回教區工作。40歲時教宗任命他為施派爾(Speyer)主教，1982年升任慕尼黑大主教，當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提升他為樞機，滿75歲後他多次申請辭職，教宗一直不批，2006年末他快80歲了，教宗本篤十六世接受了他的辭呈，同時任命他為宗座署理，繼續管理慕尼黑教區，可見聖座對他的重視。到2008年，教宗才任命他的接班人。我每次去慕尼黑拜見他，他總盛情接待。我的訪問日程一般由中國中心安排，一次我去了慕尼黑，中國中心沒有安排我去見他，我回波恩後，他立即打電話給中國中心說：「怎麼金主教到過慕尼黑，不來看我？」第二天，中國中心的主任又驅車送我去慕尼黑專門拜見他，來回一千公里。他慷慨支持上海教區的事業，有求必應，我很感激他。

我在羅馬念書時認識的另一位同學名叫阿爾伯特·德古特雷(Albert Decourtray)，他是里爾教區新聖的神父，到羅馬攻讀神學博士學位，課後我們談得很投機，他請我暑假時去他家，他家離里爾市不遠，在一個名叫塞克蘭(Seclin)的小鎮上。他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軍入侵，他的父親帶了全家外出逃避。法國投降後，回到家中，家已炸掉，蓋了一個較小的房屋，父親死後，家裡有一個賣酒的小鋪，由他的姐姐管著。他姐姐叫保萊特(Paulette)，在家守貞。我去他家時他祖父尚在，年已80。晚飯後全家圍著爐子既取暖又聊天，他向我說：「祖父沒有錶，但8時整他必起來回自己臥室。」的確，在他家幾天，他站起來時我看錶總是8時整，分秒不差，可見人身上有一時鐘。他獲取神學博士後，他的主教利埃納爾(Liénart)樞機要他再讀聖經學，我回國後與他失去了聯繫。他先在修院教書，後當上了院長、副主教。教宗先任命他為第戎(Dijon)教區主教，本來打算任命他為巴黎大主教，因他患口腔癌失音，改任命呂斯蒂熱(Lustiger)為巴黎大主教。他在第戎得知教區內聖衣隱修院內有一名叫聖三依撒伯爾(Elisabeth de la Trinité)的修女非常有聖德，他求了該修女，病好了，恢復了聲音，教宗就任命他為里昂大主教，後又升為樞機，又獲選為法國科學院院士。1985年我應馬尼拉大主教辛海梅(Jaime Sin)樞機的邀請去菲律賓訪問，見到資料里昂樞機為德古特雷，我就寫信問他是否就是我的同學，他立即回信說：「是我，我一直懷念你，你還活著！我請你來法訪問。」這是後話，下面再講。

到了羅馬我得去耶穌會總院，它緊靠梵蒂岡和伯多祿大教堂，只隔一條街。上海屬法國巴黎省，我就去拜望法國區參贊戈羅斯塔祖(Gorrostazu)神父，他原是法國圖盧茲(Toulouse)省的會長，以思想開放而有名，也因此獲選為參贊，協助總長管理法國耶穌會(當時法國耶穌會分四省，即巴黎、里昂、圖盧茲和香檳，共有三千餘名會士)。誰知他到了羅馬總院後一年，思想來了一個180度的轉變，成為極傳統的會士，同事們都跌破眼鏡。另有人說，不足為奇，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絕對是常見的事，羅馬這座永恒的城市會溶化人嘛。

我又去拜見了財務主任、加拿大籍的迪羅謝(Durocher)神父，他在意大利金融家中享有盛名，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由於意大利政府與梵蒂岡簽訂了拉特朗條約，給予梵蒂岡數額巨大的賠款，梵蒂岡在意大利銀行擁有大量存款。第二次大戰一爆發，迪羅謝神父認為戰事一發生，交戰國一定會通貨膨脹，建議梵蒂岡將該款轉存美國或瑞士銀行。梵蒂岡接納他的意見，後來意大利里拉果真一再貶值，物價飛漲，梵蒂岡卻沒有任何損失。

傳教部主任是一名加拿大會士，他多次找我去談話。他曾在中國徐州傳過教，向我講述了教宗首任代表剛恒毅在中國工作初期遇到的困難。他到北京後，當時中國中央政府在北京，北京主教是法國人，不讓他住在北京，上海也不表示歡迎，他只能住到漢口去，因為漢口主教是意大利人，後來中國教友捐錢在北京燈市東口買了一所房子給他，他才搬到北京。一次他沒有預先通知，突然到了徐州，原來上海祝聖助理主教發信邀請他，他原以為請他去主禮，因為他是聖座的代表。到了南京準備換火車去上海(當時沒有長江大橋)時他才知道，上海請的主禮是河北獻縣劉主教，法國人，兩位襄禮也是法國人，上海只是禮節性地發一張邀請書，他只得打道回去，順路訪問徐州。這位加拿大會士說：「剛主教不容易呀！要打破外國勢力控制中國教會的局面，千難萬難。」

1948年對歐洲來說是多事之年，被德國佔領的波蘭、捷克、匈牙利等國的精英人士，逃亡英國組織流亡政府，第二次大戰結束，德國納粹無條件投降，他們紛紛回國重新掌權。1948年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取得了政權，開始實行社會主義。法國、意大利等國的工人黨、共產黨勢力強大，部分知識分子也嚮往馬克思主義，共產黨成為強大的政黨，贏得許多選民的擁護，共產黨也自認為可以通過普選取得政權。法、意等國的政要、宗教領袖大為恐慌，梵蒂岡更是不安，許多紅衣主教、各部和

各修會總部都做了兩手準備。許多部門將重要檔案整理好，準備發往美國，深怕它們落入共產黨手中。教宗表示共產黨上台後他仍留在梵蒂岡，決不離開，但某些部門可以遷到瑞士或其他安全的地點。大選前夕，教宗打破不干預政治的常規，向意大利人民發表演講，要求教徒擁護天民黨，不投共產黨的票。選舉日，從不出門的隱修院的修士、修女都上街去投票，投票結果天民黨獲勝，天主教上層人士才鬆了一口氣。德加斯帕里 (de Gasperi) 繼續執政並推出改革方案，穩定了局面。他先後七次擔任意總理，主張西歐聯盟，和德國的阿登納、法國的戴高樂，並稱 20 世紀中葉歐洲的偉大政治家。

羅馬整個城市是博物館、世界文化的寶庫。羅馬帝國時代、中古世紀、文藝復興時代等文化遺產受到尊重，無論誰執政都一直加以保護，任何政治勢力上台文物從未遭受破壞，他們都知道這是祖宗傳下來的極寶貴的遺產，不能破壞，如果誰破壞了它，那他就將成為千古罪人。每星期六下午，羅馬的法國耶穌會會士請一名研究歷史的人作我們的導遊，我也參加。兩年間，增長了很多知識，這是在羅馬讀書時期的副收穫。

于斌總主教

1948年12月8日，我住在羅馬額吾略大學，同學王哲神父、高玉樸神父告訴我，于斌總主教到了羅馬，住國民黨政府駐梵蒂岡公使館內。我們就趕到聖伊挪斯大街5號見吳經熊公使，于斌主教出來接見我們，當時公使參贊羅光蒙席和傳信大學教務長杜神父也到了。于主教向我們簡單講了國內情況，末了說，他離京前與國防部領導通了電話，了解當時軍事形勢（遼沈戰役才結束，平津、淮海兩戰役還未開始）。他對我們說，國民黨準備退守台灣，他還說，他臨走前告訴南京教區神父：「我不回去了，你們也可以逃離。」並準備把修生送到西班牙繼續學習。他對我說：「金神父，你也別回去了，我深深了解共產黨，今天的東歐就是明天的中國。」

這兒順便寫幾句有關於斌主教的事。他1901年生於黑龍江省海倫縣的一個教外家庭，少年皈依天主教。吉林的法國主教派他到上海報考徐匯公學，神父看了他的試卷後向他說：「依你的法文程度，你只可錄取在中學一年級，但依你的中文程度，可以聘請你做學校的中文老師。我看，你還是去震旦大學的特別班吧，一年後就可以讀大學一年級。」他去報考了震旦大學，但不久主教改變了主意，派他到羅馬傳信大學去讀書。他畢業後留校教中國學生中文。課餘之暇，他考取了包括法律學在內的兩個博士學位。1933年回國，路過上海時，參觀了我就讀的聖心修院，那是我第一次見到他。他身高1.9米多，聲若洪鐘，出口成章。1936年他獲任命為南京教區宗座代牧，在北平祝聖禮上，眾多貴賓中有一位是失勢的軍閥吳佩孚。抗戰時他去了重慶，多次去歐美譴責日本軍國主義並呼籲國際援助中國，到處受到熱烈歡迎。他這次到羅馬受到冷遇，使他想到1945年他到達羅馬機場時，由於中國是勝利國，又是五大

強國之一，有好幾位樞機主教去迎接他一名普通的主教。在教會內，祖國必須強大，否則得不到應有的尊敬。

他去見教宗庇護十二世時，教宗對他與國民黨蔣介石過度親近表示不滿，明確告知他不准去台灣，應回南京。于斌自知不能返回大陸，就請求去美國，庇護十二世明確告知他，到美後應服從教宗駐美代表，沒有他的批准，不能離美。于斌主教在美國流亡十年。1958年底護十二世去世後，他去羅馬奔喪，各主教參與追思彌撒大禮時都有座位，于主教未得到安排，只能在旁邊站立。當他得知龍卡利(Roncalli)樞機當選，取名聖若望二十三世時，大喜，他與龍卡利熟悉，立即寫了信給新教宗，請他准許自己回台灣成立一所天主教大學。不幾日新教宗召見了他，批准他去台灣並資助他十萬美元。于斌回到台灣後，積極籌建輔仁大學，邀請教區神父、聖言會、道明會、耶穌會共同參與這項工作，他又請宋美齡為董事長。梵二會議上他發言說，不出幾代的努力，中國將在世界舞台上起重要作用，保祿六世(Paul VI)升他為樞機，若望保祿一世去世後于斌赴羅馬奔喪，準備參加秘密的選舉，在選舉新教宗前夕因心臟病發死於羅馬，享年79歲。

耶穌會應變巡視員蒲敏道

耶穌會也準備應變，耶穌會總會長楊森斯 (Janssens) 於 1949 年 1 月急召在河北景縣教區傳教的耶穌會景縣教區會長蒲敏道 (Burckhardt) 來羅馬面授機宜。

當時耶穌會在中國有 880 名會士，分佈在三個省和香港、澳門，他們分屬十一個耶穌會省。在中國的會士有重要事，應向各自的省會長請示匯報。上海教區屬法國巴黎省，揚州教區屬美國加州省，徐州教區屬加拿大法語省，蕪湖教區屬西班牙加斯底律省，安慶教區屬西班牙雷翁省，蚌埠教區屬意大利羅馬省，河北獻縣教區屬法國香檳省，景縣教區屬奧地利省，大名教區屬匈牙利省，香港耶穌會會士屬愛爾蘭省，澳門教區會士屬葡萄牙省。耶穌會總會長任命蒲敏道為中國巡閱使，擁有總長權力，統一管理。鑒於澳門、香港情況特殊，總長又任命美國籍的殷保祿 (O'Brien) 神父為副巡閱使。當時 (1948 年底) 梵蒂岡認為解放軍將迅速佔領整個大陸，但他們錯誤地認為美、蔣不久會返回大陸，即使美、蔣回不去，中國共產黨也會走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道路。梵蒂岡指示其公使黎培里留在南京不要離去，又指示傳教士盡量留在大陸，凡被驅逐的不要回他們的祖國而是在大陸附近寄身，等待美、蔣反攻後回大陸。總長又指示把年輕的會士、修士送往國外深造，學成後歸國 (事實上，送出去的年輕人數以千計，學成後沒有一個人回大陸，都滯留在海外)。

蒲敏道是位中國通，青年時就來中國河北景縣，做過本堂、修院院長和會長。抗戰時景縣先淪陷在日軍手中，抗戰後期，八路軍進入景縣、獻縣、大名等地，抗戰勝利後沒有落在國民黨手中 (1945 年 12 月 12 日蔣介石去北平時，獻縣教區趙振聲主教曾晉謁蔣，請求蔣派遣軍隊去河北南部)。他深知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策略。

蒲敏道當河北景縣教區會長時，已把景縣總修院遷到北平王駙馬胡同。蒲敏道在羅馬時把王哲、高玉樸和我叫去，和我們談了一次話，說中國教會前途不容樂觀，但一切在天主手中。他叮囑我們好好學習，不必多想國內政局。他在羅馬只待了幾天，回瑞士老家探望老母親後就飛回中國。他從羅馬回北平後，第一件事就是包了兩架飛機把總修院全體師生送去菲律賓馬尼拉。他又指示上海教區把上海總修院的修生由蔡忠賢神父率領，送往香港華南總修院，上海的主母會修士由張家樹和連國邦兩位神父率領去澳門，耶穌會的初學院和文學院也遷到馬尼拉，年輕神父和修士送往法國的耶穌會神學院，蒲敏道自己則長駐在上海建國西路的徐州教區上海辦事處辦公，他的秘書是意大利會士姓李（當時菲律賓政府深怕中國共產黨派人潛入菲律賓，拒絕接收大陸人士，天主教會通過美國史貝爾孟樞機請美國政府向菲政府申請到四百個名額，大陸的神父和修士才能進菲國）。

接著原天津津沽大學校長劉乃仁神父也到羅馬述職，耶穌會會長接見他，允許他去美國考察天主教大學。他告訴我，共產黨必定席卷全中國，共產黨將長期控制全中國，他去美國考察如何辦大學實際沒有用處了，只想隱在海外，離共產黨越遠越安全。後來他去了印尼南帝汶島，病死在那裡。

此後，陸續有從大陸逃出來的傳教士到羅馬匯報，帶來的都是令羅馬教廷和耶穌會總院沮喪的消息。只有景縣教區的凌主教 (Berlinger) 保持樂觀，說天主一定會保護中國教會。那年，羅馬教宗把1900年義和團在「扶清滅洋」口號下殺死的中國神父和教友列入真福品，委任凌主持在伯多祿大殿舉行的盛大典禮，凌事後向人說，這是他一生最大的光榮。對這個真福列品事，中國政府沒有任何反應，我自己則全心全意寫我的論文。

度假瑞士、奧地利、西德

一年很快過去，暑假到了，歐洲大學暑假特長，約三個半月。我為了學習德文，得到法國新省會長古索(Goussault)的批准，先去瑞士，後去奧地利再去德國度假。我先去佛羅倫薩、威尼斯、布雷西亞(Brescia)，以及聖類思·公撒格的故鄉加斯底里約內(Castiglione)朝聖，再去米蘭，到意大利與瑞士邊界的多莫多索拉(Domodossola)。去瑞士邊境布里格(Brig)的車要路過辛普朗(Simplon)大道(海拔2000米)。等長途汽車時我和邊境的海關官員聊天，很開心，來了一輛大巴，是瑞典一家人出來旅遊的，海關官員向他們說：「你們把神父帶上。」他見他們不表態，就說：「你們不願帶他，我得好好檢查你們的行李。」他就行動起來，瑞典人連忙說：「帶，帶。」請我上車，海關官員見我上了車，手一揮就放行了。一路風景極美，在群山環繞的公路上前進，天如此之藍，從來未見過，天空無一片雲，空氣如此清新，沁入心扉。途中停下休息飲茶，是夏天，但環視四周山上積雪未化，萬籟俱寂，自感離天國、離天主較近。

傍晚到布里格，我下車，謝了他們，揮手直到他們的車子漸漸消失，就按地址找到人們介紹的烏蘇拉(Ursula)修女管理的一所女子中學，有兩位耶穌會會士在這中學教書。瑞士是全世界最開明、最自由的國家，但很奇怪，瑞士憲法有一條規定：不准耶穌會在瑞士活動。當然有政策必有對策，瑞士耶穌會化整為零，三三兩兩分散在合法的團體內工作。女子中學的耶穌會會士熱情接待，院長修女請我給全體約五百名學生作一個報告，介紹中國。我用法文演講，並回答他們的問題。瑞士居民百分之七十左右講德語，百分之二十五講法文，其餘的講意大利文和羅馬尼亞語，四種都是官方語言。一名年老會士里克特(Richter)陪我參觀，當時讓我感到耶穌會的溫暖。耶穌會確是一個大家庭，會士之間都親如兄弟。

離開布里格我去了盧塞恩 (Lucerne)，這是著名的風景區，市中心有一個湖，四面是山 (最高山峰約有 2,500 米)，和杭州西湖相似，但湖面大於西湖，山也較高。在盧塞恩我投宿於有耶穌會士教書的大修院，有八十餘名修生，十來位教授，老師和修生在同一餐廳中用餐。

我去參觀安老院。在歐洲許多城市的安老院中都有上海修女，在那兒我問了門房，知道有，就打電話叫她出來，原來她是青浦蔡家灣人，管理廚房。人極其樸素，很膽怯，看見我很拘束，問一句，答一句。接著院長姆姆出來，是位年輕美麗的美國修女。修女往往派到外國去為老人服務，她們謙虛、樸素、熱心、溫柔，青浦修女見院長來就退了出去。院長出身於極富有的家庭，受過高等教育，遠離父母來異鄉服侍外國老人，使人欽佩不已，我和青浦修女只談了十分鐘，和院長卻談了兩個小時。院長陪我參觀了養老院，老人們在休息室坐在沙發上，看報的、下棋的、聽音樂的，到處清潔整齊，比我國的高級多了。院中有大花園，有老人在曬太陽，其樂融融。我想回國後如有權必須建一個不亞於瑞士的養老院，現在我建了兩個養老院，但遠未達到這個水平，仍需努力。

離開盧塞恩市前，我向修院院長付飯費，他收下了。耶穌會士見了不高興，去向院長說：「他是我們的弟兄，我們在你這兒教書，你不看我們的面子嗎？」院長連忙帶笑地把錢還給了我，並再三向我道歉。

下一站去著名的艾恩西德倫 (Einsiedeln) 聖母大殿朝聖。聖殿由本篤會管理，院長兼當地的主教，本篤會也辦了一所寄宿中學，我就住在學校，校長熱心招待。學校已放暑假，校舍內空無一人，只參觀了一個圖書館和實驗室。

1949年瑞士沒有失業者，銀行業、旅遊業十分發達，瑞士鐘錶業十分著名，我也買了塊歐米茄 (Omega) 手錶，一直用到我被逮捕。瑞士沒有石油，沒有地下寶藏，全靠人民的智慧和勤勞過著富裕生活，根據前幾年的數據，人均收入在全世界名列第一，超過美國，甚至超過石油生產國。我國一解放，瑞士就承認中國，比法國早十多年。

瑞士鐵路很發達，火車站沒有圍牆，沒有檢票，隨時上下車，檢票員就在車內。一下車就可以在月台上換汽車，很方便。我在等車時想去廁所，就跟另一遊客打招呼，請他留心一下我的行李 (我從意大利來，意大利小偷的多和專業天下聞名)，他說：「放心，這兒沒有小偷。」

我看到所有的自行車都沒有上鎖。但最近瑞士友人說：「那是過去的情況，現在也有小偷了。」

離瑞士向東走到奧地利邊境，氣氛就不一樣。奧地利作為戰敗國由美、英、法、俄四強分別佔領，我去的地方是法佔領區，過境查護照，火車繼續向東走，我在因斯布魯克(Innsbruck)下車。

下車後，去耶穌會神學院投宿，院長不在，理家熱誠招待。除了神學院外，耶穌會也管理 Canisianum College 的總修院，專收德語修生，有來自德、奧、瑞士等國的修生約三百人。我被邀請去作了一次演講，是一名修生幫助寫成德文的。許多耶穌會會士在國立因斯布魯克大學教書，校長雨果·拉內(Hugo Rahner)也是耶穌會士，是著名的歷史學家，他的弟弟卡爾(Karl)是神學教授。因斯布魯克位處阿爾卑斯山高處，風景極美，老城市古色古香，名勝古跡很多。我和卡爾立即成為朋友，每天下午一起在外面散步，討論神學問題，討論教會面臨的挑戰等，無所不談。末了同去一家咖啡店飲咖啡、用點心，他是一名普通會士，身邊沒有錢，我在旅途中有錢，由我埋單。

我出獄後打探他的情況，才知道他已成名，著作等身，桃李滿天下。我寫信給他，告訴他我的近況，他同意我出來工作，鼓勵我。他80歲生日做壽，累了，隔了幾天就心臟病發，猝然歸天。看來壽是不應做的。死後哀榮，有些人把他與聖奧斯丁相比，還有說他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年輕時想考哲學博士，導師拒絕了他的論文，居然名落孫山，讓他不及格。如今無人再記得導師之名，而卡爾·拉內卻流芳百世。會中有兩名修士志願去中國傳教，由於政治風雲去不了大陸，去了台灣。

不少奧地利人向我說，奧地利原是奧匈帝國，是天主教國家，版圖遼闊，第一次大戰結束淪為戰敗國。英、美兩個基督教國家對天主教的奧地利特別苛刻，讓匈牙利獨立，還把大批土地割讓他國，尤其給意大利。意大利原和德、奧一起打英、法，眼看英、法將勝，就背叛德、奧與英、法打德國，成為戰勝國，撈到好處。第二次大戰前夕，希特勒入侵奧地利，吞併了它，它是受害者。意大利先和德、日同盟，稱為軸心國，大戰末期，轉而投靠英、美，搖身一變又成為戰勝國，而奧地利卻作為戰敗國，由美、法、英、俄共同佔領，奧地利人民感到很大的委屈。1949年我去奧時，奧沒有自己的政府，全國劃成四個區，美、英、法、俄各佔一區，首都維也納也分四區，但由俄佔領區包圍，從其他三個區去維也納必須經過俄佔領區。法佔領區以因斯布魯克為中心，行政

權在法國手中，為了方便與法國人打交道，奧省耶穌會省會長向法國耶穌會求援，耶穌會派一名曾是軍官的神學修士來因斯布魯克讀書，他除了學習外，整天跑法國佔領軍司令部，解決不少問題。成功的一例如下：匈牙利「變紅」，教會處境困難，耶穌會總長指示年輕會士全部撤退，但他們處在嚴密的監視之下，政府不給護照，申請不到出國證。正在受訓的約二百名會士偷偷地分批分期去了一個火車站，集體登上了火車，司機是虔誠教徒，同情他們，決心支持他們的行動，到了邊境，正等待檢查時，火車突然起動衝出邊境進入奧國國土。邊防軍不知所措，呆若木雞，眼睜睜地看著他們溜走。年輕會士然後改乘奧國火車平安來到法佔領區，休息幾天後，法國會士為出逃的會士取得法國佔領區許可，平安去意大利離羅馬約20公里的耶穌會院繼續學習。

離因斯布魯克不太遠有一個村子阿爾帕(Alpbach)，由於風景優美成為旅遊勝地，9月初有一個歐洲大學師生聯誼會，雨果·拉納神父、法國達尼埃盧(Daniélou)神父都獲邀請。達尼埃盧研究聖父學，在巴黎天主教大學教書，後獲選為該校校長，保祿六世提升他為樞機。拉納神父介紹我去，並安排我住在本堂神父那兒，這位神父非常友好地接待我，並向我說，這個村莊原來很清靜，村民務農，極樸素，自從成為旅遊勝地後，旅客眾多，失去了原味，空氣污染了，民風變壞了，他嘆息不止。奧地利國家電台採訪我，請我向奧地利人民講一次話，我的德文不過關，猶豫不決。這時一名德國青年女學生陶納德來看我，她毛遂自薦願意幫助我，她向我說：「你講拉丁文，或法文，或意大利文，我來譯成德文。」我和她談話，她一口法語如法國人，一口拉丁文極流利，她也會說意大利文。我就用法文講，第二天，她把我的講話稿謄寫得清清楚楚交給我，電視台記者來採訪我，錄音時我就照念，據聽眾說，效果良好。我對她刮目相看，她才20來歲，掌握的外文已那麼多，那麼深。我在小組討論後和她一起散步，發現她知識也淵博，她說對中國有感情，她家裡有不少譯成德文的中國書，如《紅樓夢》、《水滸傳》，以及《論語》和老子的《道德經》，她都瀏覽了一些，她家內也有麻將牌和筷子，她母親是心理學家，在科隆大學當教授。她知道我將去德國，把她家的地址和電話給我，要我一定和她母親聯繫。陶納德先後去意大利、法國留學，獲取了文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是關於法國作家貝納諾斯(Bernanos)，後來她改行學心理學，她認為德國人對猶太人負罪太深，決意嫁給一個猶太人代自己的民族贖罪。後患癌症去世，在世只有

三十九年，她是我認識的最聰明的一位女性。下文將再提到她。聯誼會結束後，我回到了因斯布魯克會院。

理家神父見我左手有灰指甲，就介紹我去大學醫院看皮膚科主任醫生。他是位教授，一見我雙腳和左手都有灰甲，馬上叫來他的十幾名學生，指著我的腳向他們說：「我向你們講過這類病，書本上有，可這兒沒有實例，今天你們看到了。」他又誇誇其談地向學生說，生活在比較潮濕的地方而且吃大米的人易得這病，很難治，可用放射療法。我依照他的話去醫院放射治病，初見成效，但簽證期滿，只得半途而廢。上海患此病者很多，我腳上的趾甲迄今是灰的。

奧地利由四國佔領後，人民黨和社會黨很快聯合起來爭取成立了一個共和國。四個佔領國擁有最高權力，一切立法必須四國批准，美、英、法三國先同意，蘇聯反對。1955年臨時總統訪問莫斯科，得到蘇聯同意後，四國軍隊全部撤退，將權力交給奧政府，奧國宣布永久中立，並獲接納進聯合國，以後發現了石油，從此走向復興道路。

我先去音樂之都薩爾茨堡(Salzburg)，後經帕紹(Passau)入德國境。德國是戰敗國，如奧國一樣由四國佔領。它與奧地利不一樣，四國各自為政，開始他們不准德國成立一個國家，各國在佔領區派有一名高級專員，集行政立法等權於一身。1948年英、美兩區先合併，稍後法國也加入形成以後的西德。最後，三國同意成立一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於1949年9月在波恩(原是一個文化城，人口只幾萬，無工業，西德成立後成為首都)召開議會，選舉總統和總理(德國如英國，總理或首相擁有實權)。1949年9月15日我在波恩知道情況就去會場(會場設在一所學校的禮堂內)，開始人家不讓我進，我說我是在波恩唯一的中國人，有代表性，他們請示了上級，讓我去記者席觀禮，我見到了選舉過程：阿登納(Adenauer)險勝，社會黨的舒馬赫(Schumacher)落選。據說阿登納投了自己的票，事實證明阿登納當選更合適，更有利於德國。阿登納1876年生於科隆，先為律師，後從政，1917-1933年為科隆市長，把科隆建成一個現代化都市，納粹上台後被撤職。第二次大戰結束後又任科隆市長，創立了基督教民主黨，1949年獲選為德總理時已73歲，在任十四年，振興了西德。前幾年德國民意調查德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人是誰，結果得最高票的是阿登納，第二位是基督教創始人路德，第三位是馬克思。1949年後西德在阿登納的領導下走和平道路，走獨立自主的道路，復興很快，德國人懷念他。

我1949年進入德國，感到民生凋敝，人民穿著破舊的衣服，有的小孩子上學赤腳，糧食供應不足，勉強維持最低生活水平，德國的黃金儲備全被佔領軍沒收取去，西德工廠的機器重要的都被美、英、法三國佔領軍拆走，而東部的則全部運去蘇聯，為此德國工廠開工不足、失業人員很多。通貨膨脹驚人，物價急劇上升，消費品甚至糧食的供應也不足，人們告訴我一套百科全書只能換得幾十斤麵包。有時汽車開過一處，路旁沒有房屋，也沒有行人，但路上有有軌電車的軌道，一問才知道原來是個城市。第二次大戰末期，英美派上千架飛機排成一行投擲炸彈，稱為地毯式轟炸，飛機一陣過去，下面的城市就在地圖上消失，納粹飛機飛得低飛得慢，毫無招架之力，可是死的多是無辜百姓。人們告訴我魯爾區沒有遭到這樣轟炸，因為大工廠的一半股權在美國資本家手中，他們不願意破壞。兵士們在戰場中為了祖國你死我活地戰鬥，大資本家在中立的瑞士頻頻舉杯互祝健康。阿登納上台後強調為了消除戰爭，首先消除德、法之間幾個世紀的仇恨，他主張資源共有，共同開發，戰爭往往由於強國分贓不勻而引起，兩個敵對國的資本家利益一致就可減少戰爭的爆發，他提議建立歐洲共同體，法國的舒曼積極響應，他們的功勞不可抹殺。

我先到普拉赫(Pullach)耶穌會的哲學院，又去法蘭克福耶穌會創辦的總修院，最後到了科隆，科隆大教堂世界聞名，先後建了七個世紀才竣工，真是偉大。我請一名耶穌會士打電話給陶納德的母親，她約我去她家，我記得她家的地址：Paulistrasse 1號。她的父母和另一位友人等著我，他們說陶納德兩次去電話，他們要好好招待我。

我認識陶納德是天主給我的一個大恩，通過她認識了她的母親埃德爾特魯德(Edeltrud)、她的後父喬治·馬埃斯特曼(Georg Meistermann，後來成了著名的抽象派畫家，為許多大教堂設計了彩色玻璃窗)，她的哥哥克勞斯(Claus)通過奮鬥成為德國著名的漢諾威(Hanover)再保險公司的總經理、董事長。他們一家對我幫助極大(下面還將提到)。我尤其佩服她母親，她是個偉大的母親。她18歲中學畢業和一名軍官結婚，生了四個孩子，兩男兩女，軍官性情暴躁、喜怒無常，兩人沒有共同語言，終於離婚，她什麼也不要，只帶走四個小孩。她在大學攻讀哲學，同時還要賺錢，讓子女都受到高等教育。大戰末期納粹窮途末路，連少年也要當兵。她帶了孩子躲到農村去，兩個男孩子

逃避了兵役，大戰結束後她進科隆大學當助教、教師、副教授、教授，開心理診所，寫書，出了名，獲得英國皇家學會會員的稱號。

離開羅馬時，傳信大學、海門教區的修生顧雲瑞托我買一架德國萊卡 (Leica) 照相機，說意大利有，但很貴，在德國買只需要 200 美元，我給買了，離境時海關說不准帶出境扣留了。我把德國亞琛耶穌會士的名字留下，我到比利時後請該會士去領出，他郵寄到額吾略大學，額吾略大學屬梵蒂岡不抽稅，郵局送到額大，我把照相機交給了顧，顧轉手按照羅馬市場價賣出，賺了錢。這人很有經濟頭腦，傳大畢業後去了法國，里爾大學畢業後留在法國，教法國人打太極拳，一直到今天。

暑假快結束了，我離開德國，經比利時去法國，在同窗德古特雷神父家中又住了幾天，比利時的斯特韋林 (Stervelynck) 夫人知道了，開車接我去她家用中飯，再送我回法國，以後回羅馬繼續上學。

羅馬的第二年

1949年末，耶穌會為博士生會士裝修的會院竣工，取名聖師伯拉明院。它離額吾略大學不遠，緊靠聖依納爵大教堂，院舍很大，共三層，有三架電梯。我被安排在二樓，明窗淨几，很舒適，三人一組有一浴室，我們都認為太奢侈了。如果今日上海教區的神父、修女住進去，也許會不滿意，因為室內不帶浴室，沒有電話，沒有電視，更沒有電腦。耶穌會總院負責建築的專員名德拉特 (Delattre)，很大方，全世界耶穌會凡有重大建設項目都得呈報他的辦公室批。他說，一次報上一個耶穌會神學院的藍圖，他一看就把圖中的餐廳用紅筆劃掉，並退回去。申報者不得要領，來信責問怎麼可以沒有餐廳，他回說，圖紙上沒有廁所，當然不需要餐廳了。他說呈報者怎能如此粗心。

我用法文寫好了論文，先交給我的好友德古特雷潤飾，法文究竟不是我的母語，以後德古特雷在答記者問時，還提到此事。我把論文交給了我的導師德博耶爾 (de Boyer) 神父，他看後很滿意，接著是答辯。由於我的拉丁語很流利，博得好評。最後有一堂模擬授課的口試。我的導師公差出門，請了三位西班牙神父來主考，我犯了很大錯誤，在引用參考書時，我沒有提到西班牙耶穌會的神學家蘇亞雷斯 (Suárez) 之名，他們大為不滿，主考者立即嚴肅地向我指出，並說我藐視這位西班牙大思想家，他們只給我打了個及格評語。

我的學業結束了，在羅馬讀書的兩位上海教區宋之鈞和莊懷淵神父邀我同去那不勒斯 (Naples) 旅行。那是著名的旅遊城市，意大利人有句俗語，「去看了那不勒斯，就可瞑目」(Vedere Napoli Puoi Mori)。該市西臨地中海，三面環山，有山有水，風景的確極美。近日報載，那不勒斯垃圾堆積成山，無法處理，已成為該市和國家一大難題。過去，那不勒斯以其美麗聞名世界，今日卻因處理不好垃圾而臭名遠揚。該市附近

海上有一小島名卡普里 (Capri)，更是旅遊勝地，世界聞名。從英國倫敦、法國巴黎每天都有專列到達，我們也乘渡輪前往，上岸後只見人山人海，摩肩接踵，走不動也，我們知難而退，返回市內。第二日我們去了附近的維蘇威火山，導遊領我們走向原噴火口，越靠近越熱，火山雖已熄滅，但餘熱尚存。該火山是世界著名火山之一，最早一次噴發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威力最大的一次發生在公元79年8月24日，噴出的火球般的岩漿把整個龐貝城全部淹沒。我們走近火山口，只見到一個很深的、直徑約4公里的大潭，可沒有水，不像我國吉林的天池，在火山爆發後留下一個大坑，深312米，雖然附近沒有溪流，但坑內卻有水，當地人稱它為天池。維蘇威是座活火山，多次爆發，最近一次發生於1944年。

下山後我們去龐貝，離那不勒斯23公里。龐貝曾是羅馬貴族地主的休閒娛樂城，一般高級別墅均有游泳池、運動場以及閱覽室，游泳池分高溫、低溫、室溫幾個池，當時紙還沒有發明，所謂書都是抄寫在羊皮上的手抄本，一卷一卷地放在架上。貴族都是騎士，遠征勝利後，帶著大批戰俘作為奴隸回鄉，由奴隸服侍，過著奢侈的生活，他們喜愛美食，吃飽後進嘔吐藥，吐後再進食。公元79年8月24日，火山突然爆發，當時正值午夜，人們都在熟睡之中，突然數以千萬噸的岩漿從天而降，瞬息把整個城市全部淹沒，岩漿無孔不入，密不透風，所有居民不分富貴貧賤，所有寵物、家禽同歸於盡。岩漿層3米厚，上面再覆蓋3米厚的灰層，龐貝城不見了。直到16世紀才有人想到去挖掘，但是挖掘造成破壞，19世紀政府才有計劃地開採，沉睡地下的龐貝重見天日。由於被埋的城市裡面沒有水，沒有空氣，一切保持完好，龐貝逐漸成為一個大博物館，為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提供了一個極大的寶庫。面對廢墟我不禁想：難道城市中沒有義人，為什麼天主用火消滅它，如同古經所載，天主消滅索多瑪城。又想起，歷史記載某處海嘯一來，某個島嶼一下子無影無蹤，全體人民沉於海底。仁慈的天主怎麼允許？為什麼不保護他們呢？我同時想起了老子的一句話：「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道德經》第五章），我沉思很久，回顧自己卻又覺得天主上智安排奇妙，明顯天主特別寵愛我，多次絕處逢生。我想天主創造宇宙萬物給予自然規律，任其運行，但又干預人類的進程，派遣聖子進入人類歷史，施予恩寵，使許多人蒙選得救，天主的奇妙，無比深奧，我只能感激，感主於眾人中特選了我，也應祈求在天大父使更多的人蒙召得救。

第四部分

回 國

奉命 (1951-1955)

1950年5月，我接到上海格壽平會長的信，要我在獲取博士學位後回國。在國內的怕有危險奉命逃出，在國外的我卻被派遣冒險回去，又一次置我於絕境。我思考之後回信表示接受。第一，我認為自己沒有歷史問題，沒有什麼可以怕共產黨。第二，我年輕時，上海有許多「白俄」，都是革命勝利後逃來上海的沙俄貴族、達官富翁，他們當時都幻想蘇共失敗後再回祖國。然而革命成功了，蘇共政府鞏固了，他們坐吃山空，生活清苦，處境淒涼。我想，中國共產黨也一定能成功而長久地治理中國，我留在外國不回，不將成為「白華」嗎？第三，有辦法逃離祖國的是外國傳教士以及外國傳教士看中的人，他們是極少數。我國教友極大多數是農民，一部分是工人，少數知識分子，他們出不了國，傳教士走了，年輕的神父修士走了，我們教友將成為無牧之羊，我是中國人，中國神職人員，我應是善牧，回去照顧他們。基於這些理由我寫信給格壽平，接受指示，決心回國。

我去傳信部拜見時任次長的剛恒毅大主教。他熱愛中國，熱愛中國教會，曾是聖座第一任駐華代表(上面已提及他)，我非常尊敬他。他聽說我要回國，立即表示反對。他說他知道中國共產黨政府已開始為難教會，回去是冒險。他又說可以派我去拉丁美洲工作，那兒缺乏教授。他問我耶穌會領導是怎樣想的，我回說是上海的會長寫信給我希望我回去，剛總主教思考了一下說，「那你回吧！我降福你。」1950年6月我離開羅馬，到今天已是2008年，儘管去過歐洲十來次，卻沒有再去過羅馬，很是遺憾，不知何日能再去。

我畢業後，法國巴黎省會長給我三個月的假期，我可以去兩個地方，或去美國或在歐洲度過。我對美國不甚了解，在羅馬念書時有美國同學，他們自成一個小圈子，我卻和法、德兩國的神父修士來往較多

(其中有後來成為法國科學院院士的里昂總主教德古特雷樞機、慕尼黑總主教魏泰爾樞機、著名神學家漢斯·孔等)。我於是先去西德，那兒我曾認識陶納德一家人(上面已提到)，她的母親待我特好，我稱她為夫人，她不高興，說應稱她為媽，我就叫她 Mami，她滿意了，她成為我的乾媽。陶納德的兄長克勞斯後來是漢諾威再保險公司董事長。我在德國一個月，她每天抽時間用心、耐心地教我德文。德國後，我去了比利時一個熱心的家庭，先生查爾斯·斯特韋林(Charles Stervelynck)是大企業家，在比利時、阿根廷都有工廠，夫人蘇誠(Suzanne)是慈善家(我當時有一個想法，中國教難開始了，教會可能轉到地下去，我得學一門手藝謀生，神學沒有用途，我幼稚地想回國後當個出租車司機，既可賺錢養活自己，又可到處串門訪問教友)。他們家在緊靠法國的科特賴市，我住在比利時耶穌會院內，早上到附近的聖女加辣隱修院(即方濟各女會)獻彌撒，然後去企業家斯特韋林的工廠。上午學開車，下午學修車，廠方指定一名老工人負責我，我也用功學習，晚上去斯特韋林家用膳後返會院。我拿到了國際駕駛證(是斯特韋林托人辦的，未經考試)，也學習修車，至少路上車子拋錨後自己能初步處理。臨走前我向隱修女會院長姆姆辭別，說我即將回中國，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宣傳福音，請修女們為我祈禱。她立刻叫來了一名年輕修女，她和我同齡，告訴她今後的任務是為我求天主。那位修女名叫瑪麗(Marie)謙恭地接受了。我1987年出獄後再去訪問比利時，韓德力神父告訴我瑪麗修女一直為我祈禱著，我就去 Rolaire(修女已調離科特賴，而在 Rolaire 修女院內)感謝她。先由修會院長接見我，叫來了全體修女，向我指出瑪麗修女，我起身向她鞠躬道謝，並說我能活到今天，在獄中二十七年保持信德，實非易事，她的祈禱起了作用，她低下頭，什麼話也不說。1950年11月初次見到，1987年再見，事隔三十七年，我們都老了。回國後我和她通信，再去比利時，人們告訴我她已蒙召歸主，她在天上為中國教會求天主更有效力了。順便說，我回國已五十七年，一次車也沒有開過。

我在比利時得知耶穌會巴黎省傳教部主任已給我訂好了船票，將於12月8日在法國馬賽乘 *Champolion* 號郵船去香港，我就去法國駐科特賴領事館申請簽證去法國，領事館人員說：「你可填表，三月後來取。」我急了，向他說我回國的船票已訂好，必須去馬賽。他說這是政府規定。我垂頭喪氣向斯特韋林太太訴苦，她說沒事，「明天我送你去法國」。第

二天她自己開了車，到邊境時，她向比國警察亮出自己的身份證，海關人員向她敬禮，什麼也不問，放行。我到了法國境內，改乘火車到巴黎。

我急於要看望德呂巴克神父，上面我提到，這兒我再簡單重述。他是我在里昂耶穌會神學院認識的，是一位既有聖德又有才學的神父，在里昂大學教授宗教學。當時，教會內有一批有真才實學的神學家，提倡神學應一方面回到源頭即聖經與聖傳，尤其主張研究挖掘聖父學這個寶庫，另一方面，應跳出士林神學的框框，主張各宗教之間的對話和現代社會相適應。法國耶穌會和道明會士中有不少傑出神學家，尤其里昂耶穌會神學院中的一批教授們，他們寫的文章、編的講義都具有這種傾向。這使教會中的保守分子感到不安，教會內部思想領域中的爭辯，導致羅馬教宗庇護十二世在1950年8月12日發表了一個名為《人類》的通諭，打擊了被稱為「新現代主義」而尚未盛行的學派。德呂巴克神父成為被打擊的主要對象之一。耶穌會領導把他調離里昂，派他去巴黎一座耶穌會院內管理一間只有兩個書櫃的圖書室，不許他教書，不許他寫文章，不許他接觸青年學生。他服從了，默默無聞地每天去圖書室上班，一個人先用雞毛撢子撢去灰塵，然後聚精會神地看書，等個別會士來借書還書。我見他時心裡發酸，低下頭來找不出話來表示敬佩之心，最後我說了一句：「神父，你的沉默、你的服從比你寫的書更偉大！」他微笑讓我坐下，問我最近的情況，我告訴他我即將回到共產黨統治的祖國去。那時東歐教難的情況報上電視上都有報道，他凝視著我說：「服從？很好！也許你也將沉默，但聖神常在你心中，我的祈禱伴隨著你。」辭別的時候我跪下請他降福，他念完祝福經後也跪下要我降福。和他一起遭受打擊的還有一位著名的道明會神父舍尼(Chenu)，他想不通，去找當時的巴黎總主教哭訴，樞機對他說：「小神父，別哭成這個樣子，應當相信，不出二十年，教會大多數人將有與你同樣的想法。」這句預言提前實現，《人類》通諭發表於1950年，保守派代表道明會的加里古·拉根奇和耶穌會的丹尼斯神父等得意非常，誰知1962年若望二十三世召開梵二公會議，舍尼、德呂巴克、拉納神父以及和他們觀點相同的年輕一代神學家漢斯·孔與拉辛格等人被邀請為公會議的專家顧問，他們大大地影響了大會的進程。公會議發表的幾個憲章，比如關於教會的《教會憲章》(*Lumen Gentium*)、《天主的啟示教義憲章》(*Dei Verbum*)、《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Gaudium et Spes*)等都明顯出自他們。世

界在前進，教會也在聖神光照之下與時俱進，只是經常會慢半拍甚至慢一拍而已。問題在於：當領導的、作學問的是服從聖神的指引與時俱進，還是企圖拉住車輪，不讓教會前進呢？

在巴黎和里昂的神學院裡，我見到在共產黨解放前夕逃出來的顧保鵠神父，我記得顧神父在巴黎大學的論文是《公孫龍子》。沈戴祺、朱勵德、周德福和鄭聖沖等幾位修士學成後去台灣，都擔任了重要職務，此後除了周德福(後改名為周宏道)來中國修院講課外，我再也沒見到他們。

12月8日聖母無原罪瞻禮日，我在馬賽上船啟程回國，同船共行的有原津沽大學校長劉乃仁和若干越南神父，還有上海教友顧守熙先生的長子顧梅聖先生，他在他父親的母校巴黎高等政治學院畢業，他父親叫他回上海。還有一名姓丁的年輕修士，他在法國獲取了哲學碩士學位後，決心離開耶穌會還俗回國。

郵船目的地是香港，1951年初靠岸，愛爾蘭耶穌會神父來接我們，姓丁的修士沒有香港簽證，海關官員把他扣下，並聲明要懲罰船長。來接我們的神父認識海關關長，他打了電話，關長指示放行，小小風波平息了。我暫時住在香港華南總修院，準備回上海。

在香港時我見到逃到香港的上海教友陸伯鴻先生的三公子陸隱耕先生和富商郁秋令先生，前者去了美國，後者死在香港。還見到在《公教報》當編輯的諸正瑛女士，她客氣地叫我叔叔，她一直在《公教報》工作，直到退休，最近蒙召歸主。

我在香港旅行社買了香港到上海的火車票，把兩個箱子行李托旅行社用船運往上海，隨身帶了一個小旅行包踏上回國征途。離開香港時火車站沒有人送我，火車離開九龍，我心中想：別了，香港！別了，資本主義世界！永別了，歐洲的好友們！大陸上等待我的是什麼？我心中沒底，一切托給天主，只念一段經：「天主上智的安排總不會錯。」給自己打氣、壯膽，但主要的情緒是淒涼。心中在想，我的領導老把我置於死地。不必怕，上智安排不會錯，我會絕處逢生，不會死的。

1949年5月送到香港的修士們，已由上海代理主教姚贊唐召回上海(蔡忠賢神父帶回修生，張家樹、連國邦帶回主母會修士)，為這件事，蒲敏道大力反對，與上海代主教姚贊唐爭吵，姚說：「我是代主教，不屬你管轄，我認為共產黨不會迫害教會，一年來的事實證明這一點。我召回我的修生，你不能干涉。」蒲敏道寫了一封信給修院董事朱開敏主

教區報到

我於1月25日到上海北站，沒有人來接我，我一個人到徐匯修院向當時修院院長姚贊唐報到，接著就去看格壽平會長，他向我說：「你回來了？我正打算寫信給你叫你不要回來。」我想我在香港十幾天，他要是真想寫完全可以寫的，我的感覺是他很虛偽，但我什麼也沒說。

1949年8月羅馬任命龔品梅為新成立的蘇州教區的主教，南京教區的龔士榮為上海教區主教。龔士榮已遵從于斌的安排離開大陸到了台灣。毛澤東在北平發表過一篇重要文章，聲明將嚴辦戰爭罪犯，名單中第一個點名的是蔣介石，第二名是李宗仁，在四十名罪犯名單中，于斌赫然在內，而且名次靠前。龔士榮認為自己是于斌的秘書，又身在台灣，任命自己為解放的上海主教很不妥，回去也許未到站就先遭逮捕，對教會不利，上書羅馬辭職。1950年羅馬批准龔士榮辭職，調龔品梅為上海主教並署理蘇州教區事務。接通知後龔品梅立即走馬上任，把主教公署放在四川南路天主堂，任命朱雪帆為副主教，李式玉神父為教區秘書長，周士良神父為主教秘書，傅鶴洲神父為教區財務主任。這是他的班子，而實際上他依靠的不是這些人，而是法國人格壽平與才爾孟兩人。

我到徐家匯修院後第二天就去拜會龔品梅主教。那時按慣例，上海、海門、南京、蘇州幾個教區神父在董家渡做年度避靜，龔品梅、朱開敏、蒲敏道、格壽平四巨頭同時在董家渡。我去一處可同時見到他們四位，省時又省事。我到時，他們四人才用完午膳在休息室內談話。我敲了門應聲進入，向他們問好。龔、朱二人沒有請我坐下，就先急忙問我：「他們什麼時候回來？」所謂他們當然指美、蔣。我沒有想到他們連問候話也不說，卻馬上提這個問題。我毫無準備隨口說「早哩」。他們又急忙問：「那麼大約什麼時候？」我回道「難說」。我心想國民黨狼

須逃走哪能很快就回？他們再問時，我回說：「總得好幾年吧，也許十多年吧！」朱開敏主教說：「你知道什麼？今年中秋節就能回。」他們是主教又是老前輩，我只好不做聲了，我心想，蘇聯1917年革命成功到1951年已三十四年，中國革命不會短於蘇聯吧。我回國後第一次的拜訪，談話的內容竟是這樣，大大出乎我意料。

我在歐洲時，各國教會還沒有全國性的主教團或主教會議這種組織。每一個教區直屬羅馬主教部以及聖座駐各國的大使，這很不利於各國教會的全域和統一行動。但各國教會也有些措施予以彌補。在法國則是全國樞機和總主教聯席會議，每三個月舉行一次，討論全國性的問題，按時發出指導性文件。我認為這種做法也可用於我國教會，我國教會太分散了。我就天真地分別去拜訪龔品梅和朱開敏兩位主教，我對他們說，目前的形勢，共產黨將長久統治中國，外國傳教士或自動撤退或被驅逐出境，即使他們能留，他們的立場觀點和我們並不一致，我們中國神職人員應團結起來應付今天特殊的局面。「你們一個是上海主教，一個是主教中的元老，是中國首次獲祝聖的主教，你們兩個有威望，應聯名邀請中國主教來上海開個會，商討應變事項」，為中國教會找一個出路，找一條能長期存在的路線，或拉丁文所說的 *modus vivendi*。他們客氣地回說：「讓我們考慮後再說。」我正在等待他們的回音時，耶穌會長格壽平叫我去說：「金神父，你才回國，為什麼胡說八道？黎培里公使來信告訴我，說你才從外國回來就表現不好，叫我管好你，你究竟說什麼？」我說：「我只向兩位主教提些建議。」他說：「好好教你的書，別給我惹麻煩，我本向黎公使申請要他任命你為修院院長，他拒絕了。」我心想，在今日形勢之下，不做頭頭更好。

托運的書到了，我去海關領取，海關官員叫我打開，他們一看都是書，而且是外文的，就說還需水上警察來看了才可放行，要我等著。等了半個小時他們來了，他們一翻都是外文書，問什麼內容，我說都是哲學書，他們不說什麼就簽字放了。我雇了一個平板車帶回修院，姚贊唐院長問我書是否要留在身邊（王昌祉神父回國時，姚要他把書交給圖書館，他不肯，鬧到會長那兒去，桑會長批准了王的做法）。我想，我自身朝不保夕，隨時會失去自由，要那些書有什麼用？就說按慣例上交。他高興得很。我這個人回國初期即等待隨時被逮捕（現在則等待隨時死去），世界只是逆旅而已。

我開始深居簡出，用功備課，上課，幾乎也沒有人來看我。學生很好，也歡迎我教，第一次有中國人教神學，此前王昌祉神父再三要求教神學，姚贊唐總是一口拒絕。我是中國人，學生也是中國人，但我得用拉丁語來教。梵二會議前，普世修院都用拉丁語。老師、學生都感到彣扭。梵二也改革學習，一切改用本國語言，省事多了。但我認為拉丁文很美，把它全盤拋棄也很可惜。也許這是老人懷古情深吧！

我去徐匯中學拜會了張伯達神父，他是上海中國會士中唯一當院長的，儼然是中國會士的領袖。他很客氣。在徐匯中學工作的還有曾是我老師的王方神父、我的同學朱洪聲神父、陳天祥神父。我們相見很高興。此後到張伯達8月被逮捕為止，我每個月去一次，事後和我同去的也曾是我老師的陳雲棠神父告訴我：「我們見到你能主動先去看張伯達很高興，張伯達在你面前有些內疚，他在老主教惠濟良和老會長姚贊唐前沒有少說你的壞話。」這事我知道，否則我不會在蘇北待一年，但我應忘掉不愉快的事，我對陳說：「過去的事，談它幹嘛？現在是什麼時候了？讓過去的永遠過去吧。」張伯達由於公開在大會上反對「三自革新」運動（下文將提到），於8月被捕，11月因腦溢血死於監獄中。張出身名門，很有才華，特別善於交際，人們曾猜想他會做上海首任國籍主教或國籍會長，但未成事，英年早逝，令人惋惜不已。

各種運動

二戰結束前夕，斯大林、羅斯福、丘吉爾三巨頭聚首雅爾塔，羅斯福對斯大林做了重大讓步，允許東歐納入蘇聯勢力範圍，二戰結束時東歐反法西斯政黨建立的政權次第落入共產黨之手，東歐諸國成為蘇聯的衛星國的同時，西歐各國的共產黨勢力也日益增長，成為重要大黨。1948年意國大選前夕，意共呼聲極高，教宗庇護十二世公開號召教友們參選，投天主教民主黨的票。結果天民黨獲勝，穩定了西歐局勢。

1949年6月30日，中國共產黨取得全面勝利，教廷聖職部發布反對共產主義法令，強調唯物的共產主義必然反對基督信仰，即使中共領導有不反對宗教活動的言論，但事實證明，共產黨是反對天主教、反對宗教、反對基督教會的，因此依據法典1399條，禁止出版、傳播或閱讀袒護共產黨學說的書刊、報章及傳遞，並不得向有關刊物投稿。教友不能參與宣傳共產學說的活動，也不能為反基督的邪說辯護，否則會被視為背棄公教信仰。我當時心中想，這樣一個全面的禁令在資本主義國家執行也有困難，教徒中支持擁護共產黨的不在少數。事實上，各地教會也沒有傳達到基層。誰知道，我回到上海，發現龔品梅在格壽平的指示下，居然逐字逐句地傳達並執行這個指示。我當時感到，今後在中國做個天主教徒不容易了。

共產黨非常喜歡開會，特別是解放初期，幾乎天天開會，有時開一整天。學校、工廠、各單位、所有街道里弄組織不斷地開會，當會場群眾高呼共產黨萬歲時，格壽平指示教友不許舉手，會議上數千人在高呼共產黨萬歲，幾個教徒、老師、學生、工人只能低下頭不舉手、不高呼，人們用驚訝的眼光注視著他們。學校內，小學生爭戴紅領巾，以戴上紅領巾為光榮，老師動員教友小朋友加入少先隊，他們卻被告知不准

紅十字會不斷寄給他食品，尼克松總統來華前夕，政府宣布他能接受改造，表現良好，提前釋放回國，死在美國總院（逮捕華理柱時，一起逮捕了若干教友，榮德先的丈夫朱義生也在內，死在獄中）。

1951年初CCB開了一個應變會議，龔品梅也參加，會上商定黎培里不能行使職權時，將由龔接任教宗駐華代表之職。龔信以為真，1954年他天真地對我說：「怎麼梵蒂岡遲遲不明確任命我呢？」我心中想，要外國人交權給中國人是很難的。天主教明末傳到中國後，只任命過羅文藻一人為中國南京代牧，並讓他等了十多年才祝聖。此後二百多年只有外國主教，一直到1926年才由六名中國神父任六個小教區的主教。到1949年解放前夕，大多數主教仍是外國人，二十多位總主教中只有三人是中國人。以我自身為例，外國人能在中國時，會長、巡閱使是由外國人當，外國人沒有了，才輪到我這個中國人。教會由人組成，一般人的思想境界總是由其民族思想形態所支配，框框重重，很難越過。

1951年，黎培里被驅逐出境，先留在香港，後去了台灣。1947年他作為聖座公使來中國，我去了歐洲；1951年他被驅逐前夕，我才回中國，從來未見過他和他談過話，對他了解很少。有兩件事是我後來知道的：一、他在解放初期寫信給全中國主教，號召他們祈求佘山聖母護佑，並提議如果中國教會渡過難關，安然無恙，將來在佘山建立一座大殿感謝聖母。有三十位主教響應他的號召，寫了許願信寄給黎培里，黎培里交給龔品梅，龔交給佘山的總鐸呂道南（Prudhomme，法國神父），他把這些信放在佘山大殿聖母像腳下。龔被逮捕後交代了，人民政府把這些信取出，並以此為罪證，說明教會等待變天。我現在有個問題：佘山聖母不是保護了中國教會嗎？現在中國教會安然無恙，日漸發展，我們不是應當還願感謝聖母嗎？二、1947年11月才爾孟接替萬爾典為上海教區財務主任。他一上任，就向人說：「共產黨必勝，國民黨必敗！共產黨來後，將把教會財產沒收。」他著手把上海教區的房屋土地賣給人家，把錢用來買了許多美國大公司的股票並帶走，黎培里獲悉後，寫信給他禁止他再賣下去。黎培里說，外國傳教士將全部離開，但中國神職人員必須留下，應想著他們。才爾孟被驅逐出境後，在歐洲活動一年後回香港負責耶穌會在華的財務，他買進的股票都在香港。1967年盛傳中國將武力解放香港，羅馬下令把在香港的屬大陸教會的動產都轉到羅馬，交給福傳部。才爾孟管的所有美國股票都上交了。2003年我經過德國耶穌會院時，一名老神父向我說，那時他在羅馬耶穌會當財務

主任，是他經手辦的。他認為上海教區的最大一筆財產已轉移到安全地帶，沒有料到羅馬福傳部會把這筆錢吃掉，上海教區分文拿不到，幾十年來福傳部沒有給上海教區一分錢。而留在上海的房地產卻安然無恙，沒有損失，共產黨沒有吃去，上海教區以此維持生活。這有些諷刺意味，我困惑。

更大的打擊還在後面，政府在全國範圍內伸出重拳，出擊的對象是「聖母軍」。聖母軍起源於愛爾蘭，專為恭敬聖母並鼓勵教徒多做祈禱與行仁愛工作。黎培里任教宗駐愛爾蘭大使時發現這個組織，認為有利團結信徒，提高他們的素質。調來中國後他大力提倡這個組織，聖母軍從基層開始分地區發展，每一個小團體請一位指導司鐸，小團體內有會長，也有小組長，分別負責祈禱、培訓、聯繫、財務等工作。黎培里特調來愛爾蘭籍穆克勤神父作全國指導司鐸，全面負責。上海的聖母軍在青少年中特別在校學生中發展較快，個別神父也在堂區中組織。這個組織帶有「軍」字，特別引起共產黨的注意和重視，認為這個組織具有政治目的，帶有軍事性質。這類組織在共產黨統治的國家絕對不許存在，必須徹底消滅。中央政府把聖母軍定性為反革命組織，勒令所有會員立即聲明退出。文件指出參加者都是地主分子、國民黨反革命分子等，必須登記退團，並要求退出的會員進行檢舉揭發，務求一網打盡。全國公安機關立即行動起來，在上海設立了幾十個退團登記點，勒令會員報到、填表，交出會員證、會員手冊，聲明自己幡然覺悟，宣布退出，寫下受騙上當經過等等。解放後凡共產黨上級佈置的任務，下面一概雷厲風行，但在取締上海聖母軍行動中受到挫折，上海的聖母軍服從龔品梅、格壽平指示，幾乎全體拒絕公安局的命令，堅決不承認聖母軍為反動組織，令政府大為惱火。中央認為上海公安執行不力，把在天津鎮壓聖母軍有功的公安局長許建國調來上海，以鐵腕手段壓服上海聖母軍。原公安局長楊帆降為副局長（楊後與上海市常務副市長潘漢年同時被捕，作為反黨分子關押二十餘年，潘釋放後，「文革」中又被捕，最後死於獄中。楊在四人幫垮台後獲得平反昭雪，回到上海雙目已失明），許建國後升為上海副市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副部長，他的作風強硬，殺氣騰騰，九八事件逮捕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成員，由他親自指揮（當時陳毅市長已調往中央，擔任副總理並外交部長之職）。不知何故許建國後來調去當外交官，先任駐羅馬尼亞大使，後任駐阿爾巴尼亞大使，接著奉命回國述職，在機場上被逮捕，立即關進北京秦城一號監

獄，死於獄中（我從他女兒寫的並在《人民日報》發表的《為了紀念我的好爸爸》一文中得知許的情況）。

1951年我回國後，榮德先的兒子朱恩榮來看我，告訴我他是聖母軍，而且是負責圖書館的職員。當時風聲已緊，我說三十六計走為上計，趕快去香港，切不可留在大陸，他的父母同意他出去。他到了香港去華仁書院補讀英文，後來蒙天主召喚進入耶穌會，一直在台灣從事青年工作，對台灣教會做出貢獻，深受台灣天主教大學生的愛戴。他如不出走，一定會被捕，判刑發往東北或西北勞改。

上海政府在取締聖母軍的同時，逮捕了聖母軍的指導司鐸，如法籍耶穌會士傅若望（Jean de Leff，出身望族，兩個弟弟為神父，三個妹妹為修女。他被驅逐出境後回法國，出版了在獄中寫的詩，銷售很廣）和姚景星神父。姚曾任金科中學校長，被捕幾個月後釋放出來，後調往張家樓當本堂，後為修院教務長、光啟社社長，譯著很多，尤其出名的譯文為《愛的呼聲》。儘管在重大壓力之下，這些年輕的聖母軍表現極勇敢，信仰堅定，虔誠恭敬聖母，為了教會不怕犧牲。大多數會員準備了一個小包，內裝更換衣服及洗漱用具，準備隨時入獄，可歌可泣！其中許多人在1955年9月8日後失學、失業、失去自由。

上海的這些聖母軍，絕大多數是高中和大專學生，出身富裕家庭，有的父母非基督徒，他們奉命抵抗公安局命令時不被家長和親友理解。他們入獄判刑後去青海、東北等地勞改，勞動積極得到嘉獎，但堅持信仰，絲毫不動搖，有的還暗地裡做福傳工作。撥亂反正以後他們陸續回到上海，現在的生活條件遠不如今日的我，更不及曾流亡在美國的龔品梅等，但他們對過去從不抱怨，真是天主的好兒女，我內心佩服他們，自愧不如。

耶穌會中有七八位年輕會士，他們認為當務之急是加強教友們的神修和加深他們的信仰。這些會士是吳應楓、陳雲棠、蔡石芳（又名蔡忠賢）、王仁聲、朱樹德、朱洪聲、陳天祥和我。

我們決定輪流在各堂口內做教理講座，七講為一個單元，每人一講，每個單元有一個主題：論基督；論天主十誡；論七件聖事；論教會；論信德等。教理講座富有號召力，每次講道滿堂教友，除了教理講座，我們組織教友分批做依納爵神操，效果不錯。參加的大多數是學生，人們稱他們為公青，即天主教青年，1953年元旦他們由朱樹德、朱洪聲神父組織聚會，在君王堂廣場上向龔品梅祝賀新年時約有

二千人。公青其實不是一個組織，既沒有章程，也沒有領導，只是一個統稱，凡是天主教家庭的青年學生，都稱為公青，一如文革時的知青一樣，然而有人把天主教青年扣上一頂公青的帽子，使他們成為反革命分子。九八事件後他們中大部分被集訓交代問題，稱他們為公青分子，抗拒者被逮捕入獄，罪名就是參加公青。凡不知悔改的判刑去東北、安徽、青海、新疆等農場勞改，部分人迄今還留在農場。

1949年國民黨節節敗退，解放軍解放全國前夕，天主教傳教士們膽戰心驚，設法應變。上面我講了把年輕人送往海外是一個方面，他們估計共產黨將迫害教會，教堂會首當其衝。也有人認為共產黨會尊重教會辦的事業，把有些動產轉移到各事業中去，把土地劃在學校方面，把少量土地劃歸教堂。解放後傳教士們發現自己估計錯誤，共產黨保護宗教，保留教堂而接管教會的事業，以上海而言，他們先接收天文台和氣象台，這有關國防，不能讓外國人掌握。接著他們接管學校，上海教區原有震旦大學和震旦女子文理學院，中學計有徐匯中學、徐匯女中、啟明女中、聖誕女中、土山灣職業中學、震旦附中(改名為向明)、金科中學、曉明女中、仿德女中、中法中學(改為光明中學)、聖方濟中學(改為時代中學)、一心中學、松江正心男女中學、浦東唐墓橋男女中學、斯高職業中學、昆明路女中、大通路中學、南橋中學、張家樓中學以及許多小學，全被接收。慈善事業如廣慈醫院(即今日的瑞金醫院)、仁愛會醫院(今日的盧灣中心醫院)、楊浦區聖心醫院、閘北區母心醫院、松江若瑟醫院、鐳鋌醫院一一被接收。龔品梅告訴人說，天天聽到的就是種種設施被充公的壞消息，他一如古經上記載的約伯聖人。

各種事業接收後龔品梅、格壽平調整了人事，調朱樹德、朱洪聲為君王堂本堂和副本堂；調王仁生為伯多祿本堂，錢生冠和蔡良申為副本堂；調丁樹仁、徐簡谷、陸培元在四川南路天主堂；調張家樹為虹口本堂，吳應楓為副本堂；調陳天保專門聯繫上層教徒，兼五原路崇真堂本堂。從此工作重點在堂口，堂口的重點是青年和兒童，培養青年骨幹，專管兒童。這些骨幹，兒童稱他們為哥哥、姐姐，他們絕對服從本堂神父。當然也有個別不如此，比如鍾姓女教友，她響應政府號召，登記退出聖母軍，但政府要她繼續做堂區骨幹分子，表現得更積極，以取得神父的信任，暗地和政府聯繫，請示匯報。鍾做得很成功，她的雙重身份在「九八」後公訴龔品梅大會上挺身而出時亮了相。但她在80年代後期到美國後，聲稱自己曾被共產黨迫害，要求做美國人。

在龔品梅、格壽平指示抗拒政府時，共產黨仍想爭取龔。1951年10月1日國慶日，陳毅市長向他發出請帖，邀請他出席觀禮，他沒有去。他來到了徐匯修院，我問他為什麼不去，這似乎失禮。他回說：「我今天去了，他們回來時，我怎麼交代？」他們是指美、蔣。他心中還在妄想美、蔣反攻大陸。市政府爭取教區上層教徒，聘請朱孔嘉、顧守熙、董貴民等有影響的教徒為政治協商會議委員，潘漢年副市長邀請龔等去市政府座談，這些努力徒勞無功，龔品梅受法國人操縱，不信共產黨。他接近的人如陳輔民、張希斌等，都是強硬派。尤其陳輔民，反共態度十分堅決，措辭極強硬。他們捧龔說，他必將是紅衣主教。又說，政府不會對他怎麼樣。我從歐洲回來，當時東歐已紅色，西歐知識分子、工人很嚮往共產主義，我對美、蔣回來沒有幻想。明曾蒂(Mindszenty)紅衣大主教在匈牙利國內外享有極大威望，匈牙利政府於1949年年初逮捕了他，中國共產黨不會怕龔。我向別人說：不要太捧他，即使他一旦成為紅衣主教，但「一將功成萬骨枯」，代價是許多人尤其青年受苦。他們說，氣可鼓而不可泄。鑒於當時形勢，我的聲音很軟弱，和他們不太合調，他們都慷慨激昂到處說：「頭可斷血可流，信仰不可丟。」我的表現沒有他們勇敢，我才回國，年紀又輕，沒有資格進入當時教區的決策層。政府在爭取不到龔時，有人建議，邀請田耕莘樞機回國來領導中國教會，政府接受這個建議，派人秘密去海外做田的工作，田拒絕了。

徐匯修院

1951年8月黎培里主教被驅逐出境，臨走前，他把格壽平的申請批了，任命我為徐匯總修院的代院長，總修院的院長應由羅馬聖部任命，他只能批為代院長。我於1951年7月16日上任，把精力放在修院工作上，勉強支撐了四年多，修生人數增加到303名，修院中工作的神父都曾是我的領導和教過我的老師，比如姚贊唐曾是會長和院長，桑黻翰也曾是我的會長和院長（我一直認為他是我的恩師）。我只有35歲，院中年齡最小卻當了他們的院長，我有些心虛。他們都特別尊敬我，讓我放心擔當這個重任，我被他們的服從謙虛之心深深感動。當時高年級的學生如海門的丁兆銘、蘇州的張振華都已30來歲，和我相差無幾。我當院長後的第一個重要措施是，小修院一開學就做一個月神修，較有收穫。我認為對修道人來說，最重要的是神修，沒有扎實的神修基礎成不了好神父。

最使我棘手的是，宣布我為院長的第二天，全體約二十名工人到我的辦公室大吵大鬧，要求增加工資，增加福利。跟他們好好談，不聽，只高聲喊叫。管他們的兩位輔理修士都躲起來不出面。我心想外國人做院長他們不鬧，中國人當了就鬧。正在我無法對付時，一名修士挺身而出，到我的辦公室向他們說：「你們吵鬧什麼？院長不管這些事，是我負責，跟我來。」他把工人領出我的房間，替我解了圍。這名修士叫吳才生，我很感激他，我以後真的把工人交給他。工人後面有區政府一個姓趙的幹部作後台，不易對付。吳修士把工人們管理得服服帖帖，我佩服他，他聖了六品後，其他修士如陸培元、沈保智、艾祖章、張廷爵等相繼管理工人，用不到我操心。

一個單位的伙食最重要，拉丁文說 *Bona Culina, Bona Disciplina*，意即伙食好了，紀律也會好。我把修院303人的伙食也托給修生管理，修

生成立自治會。我只定伙食標準，他們就按這個標準辦理食堂。當時修生們下午4點還有一道點心，我定的標準是每人每月20元，這在當時相當高了(大學生的伙食標準每月10元)。管理伙食時間最長的是郁成祥，他費心費力，大家滿意，只是影響了他的學習。管伙食賬的是莊建堅，搞採購的是朱育德等。1955年9月8日郁也被捕，離他聖神父的日子只差二十八天，他在勞改時保持信仰，保持獨身。1982年我回來後，派人找到他並讓他回修院，聖了他神父，成為一個好神父。他是海門人，有良心，說他是海門朱開敏主教培養的，他必須為海門教區服務。他去見接替朱開敏的海門新主教郁成才，郁主教見他有病，怕他病倒成為教區的負擔，不願收他。他從海門回來，問我道：「我中過風，我怕再發病，神父你怕嗎？」我回說：「你病了，教區養你一生。」他安心留下補課。他歸了上海教區，傳教十多年，為教區做出貢獻，最近病死。

解放後各地修院陸陸續續停辦，徐匯修院碩果僅存，各地都派修生來，溫州蘇代理主教親自送來了朱維方，廣西送來了黃雄才，廣東通過華理柱主教送來了莊建堅、林德君，江西送來了游國傑、謝雲生、吳谷聲，福州鄭長誠代總主教親自送來了何敦乾，河北送來了李中原、張尚志等十多名，他們神修有基礎，學習又用功，都經得起考驗，除極個別外，都成了好神父。

鄭代總主教來滬的另一個目的，是要龔品梅和格壽平派一名神父去福州教區，為神父們領避靜，做依納爵神操。龔、格派了在神學院教聖教法典的王哲神父去。這為王神父帶來極大麻煩。反帝愛國運動開始，軍管代表重點審查他，要他交代此行的反動目的，導致王跳樓身亡，這是後話。就在那一年，我認識了鄭長誠，並成為極好的朋友。他愛國愛教，為了忠於羅馬教宗被判刑，勞改達三十年之久，出獄後仍在家深居簡出。經多方面勸說，出來照顧教友，在堂區服務，獲選為福州教區主教，祝聖前他向梵蒂岡駐香港代辦斐洛尼(Filoni)蒙席報批，這人以福州已有一位地下主教為由拒簽，但他的前任方濟各會士畢納青(Pieraccini)熱愛中國教會，寫信給鄭表示他能接受祝聖以牧養福州教區的三十萬教友，鄭即接受。然而他因長久未被政府信任，未被羅馬認可，內心常悶悶不樂。他為教會做了極大的貢獻，其中之一是修了玫瑰山莊，集大堂、圖書館、招待所、苦路等於一體，現成為全國著名的朝聖點。最近患食道癌去世，臨死他收到了羅馬認可的通知，得以安然離世。

去台灣後，潘英生找我，希望我做她們的神師，我同意了，她們每月輪流去修院，我向她們講神修，有時我也去她們的「家」，她們的組織名為「家」。

朱樹德也辦起了一個「我樂之緣」的組織，人數不多。

政府就龔品梅的為人諮詢了愛國會成員胡文耀和楊士達等人，他們都說龔背後有法國人，明顯由法國人操縱，為此必須除去這批法國人。政府重視並重用楊士達，楊升為二醫大教務長，兼徐匯中學校長，在上海的全國愛國會中楊起較大作用。

1952年11月公安局逮捕了才爾孟，拘留他兩個星期，在他交代清楚問題後，押送他出境。他先回法國到處演講，一年後回香港在亞皆老街買了一所房子，成為上海教區駐香港辦事處主任。政府逐步摸清上海天主教的內情。

重要的一擊發生於1953年6月15日晚上，政府出動軍隊，包圍了徐家匯耶穌會總院和耶穌會神學院以及蒲石路君王堂，逮捕了格壽平、美國耶穌會士翟光華和斐有文，並帶走了朱樹德和朱洪聲。在徐家匯也帶走了格的機要秘書陳天祥。驅逐了耶穌會總院院長貝國梁，封鎖了上述地點，軟禁裡面的所有神父修士。在金陵路亞納公寓抓走了比利時籍神父林仁與田望霖，他們是朱開敏主教的顧問，並不斷向黎培里匯報。第二天報上大標題報道了這個行動，稱之為反帝愛國運動，以此徹底肅清帝國主義的影響。為了吸引較多的教徒，政府把「三自革新」運動改名為反帝愛國運動，在市內辦了一個大型的帝國主義罪行展覽會，組織群眾尤其教徒去參觀，但效果不顯著。震旦在大專院校院系調整後，成為上海第二醫科大學（簡稱二醫大）。當天天主教的學生知道消息後，成批趕往君王堂與徐家匯，帶了麵包等食物，說是為被軟禁的神父修士們送食品，要求進入，幾經勸阻，學生堅持不散。

這兒講兩個插曲，對我頗具教育意義。被軟禁在神學院的有一名神父叫王楚華，一天他越牆逃了出來，跑到松江找當時的總鐸張瑞麟，張把他安置在一條小漁船上，後感到不是長久之計，就把他介紹給昆山小橫堂本堂王友蘭神父。王友蘭把他介紹到一家沈姓漁民教友家中藏起來，王楚華想通過黃牛逃到海外去，到了廣州正在偷越國境時被邊防警察抓住。他交代坦白了，使收留他的沈家人遭到極大痛苦。王判了刑，刑滿釋放後由他在美國的妹妹設法接到美國去了。但他如願以償後，卻沒有對因他受苦的沈家有絲毫表示。另一個神父王繼文逃到姓張的教友家中躲起來，隔了兩年被公安查到，張家為此吃了許多苦。我上面說的

教育意義即一人做事一人當，千萬不要為了自己的利益，為了保護自己犧牲別人，令人冒險，連累他人。

反帝愛國運動開始後，天主教學生是政府工作的重點。在二醫大，有一次進步學生與「公青」學生爭辯激烈僵持不下，甚至發生衝突，進步學生楊增年從樓梯上端猛地一躍跳下，踩在同學身上，以衝散群眾，猛勇無比，受到政府嘉獎。楊在徐匯中學念書時，深得張伯達校長賞識，領洗入教，張重點培養他，送他進震旦學醫；解放後他覺悟得快，院方重視他，視他為進步學生的骨幹。「文革」期間，紅衛兵因他曾是教徒狠批他，說他是混進革命隊伍的異己分子、特務。在紅衛兵鞭打之下，他只得坦白他是不暴露身份的特殊黨員，他的檔案材料應存在特殊檔案內。查核從實，放他過關了事。後他受到重用，逐步上升至上海青聯主席，1983年升為上海市宗教局局長，又升為統戰部副部長。他把妻子兒子都送去美國，不久他自己也違背組織紀律，私自去了美國，留在美國不回來，被開除黨籍。他在美國沒有正式工作，做家庭護士，最近死在美國。

政府逮捕了公青學生中的龍家平等。李文之感到自己也會被抓，去四川南路天主堂找傅鶴州神父，傅把她送到朱學幼的家中躲起來（朱在華商電業公司當科長，他的大女兒叫朱雪瑾，兒子叫朱錫藩，即參加耶穌會地下初學院者）。由於李文之在朱家仍與同學聯繫，同學去朱家多了，政府發現情況，把李從朱家抓出。李文之在獄中接受教育，深悔自己的過去，交代問題徹底，又檢舉揭發他人。九八事件後，朱家為此受連累。龔品梅被捕後，李從獄中放出，在大會上控訴龔品梅、格壽平和金魯賢毒害青年的罪行。李加入愛國會，成為愛國會最堅強最積極的成員。她確是共產黨改造頑固分子的成功典型，五十多年如一日地為愛國會工作，現已80高齡仍在愛國會上班，每天第一個報到，最後一個回家。

接著政府又逮捕了伯多祿堂王仁生神父、徐家匯蔡忠賢神父、四川南路若瑟堂傅鶴州神父。神父少了，有些青年就來找我，要我做他們的神師指導他們，我收了幾名，其中有諸正璿、劉彤霞及劉的弟弟劉同范等。劉同范於1954年被逮捕，劉彤霞和諸正璿在我被逮捕後也被捕。劉覺悟較早，不久就被釋放。諸正璿判刑後去青海勞改，政府撥亂反正後，釋放回上海，給她們補發了二醫大畢業證書，安排工作，現均退休。

四個代職

6月15日晚格壽平等人被捕後，巡閱使蒲敏道騎自行車到徐匯修院來看我，向我說，「格壽平已被逮捕，我任命你為耶穌會上海區的代會長。」格壽平被捕前也留下紙條，任命我在他被捕後繼任他為海州教區代監牧。我頭上有了代院長、代會長、代監牧三頂帽子。蒲走後我去小聖堂拜聖體，跪著向天主說：「天主求你垂憐，我的擔子太重了，我離監獄更進一步，有了這些職務注定快要入獄，請給我勇氣。」祈禱時不禁淚下，毫無英雄氣概。

8月初政府勒令蒲敏道即日出境（他是瑞士人，瑞士已承認我國，政府對待他較為客氣），他立即服從，但讓他的秘書送給我一張紙條，說他已被勒令出境，即日起我接替他為中國耶穌會代巡閱使。於是我頭上有了四個「代」，也就是說頭上懸有四把刀，隨時可落下。他這項任命進一步讓我處於絕境。

蒲出境後立即飛到羅馬匯報，他寫信給我說，總長批准我提前發四個終身大願。耶穌會憲章規定，核心會員除了貞潔、神貧、服從三願外加一個絕對服從教宗派遣的願，並附若干包括不謀求會內外高職（如不當主教）的願。按耶穌會規定，發四願者必須從進會日算起滿十七年。我1938年入會，應等到1955年8月30日。但非常時期可有例外，總長例外准許我提前發願，讓我成為耶穌會的核心會員。1953年12月8日我於徐匯大堂在徐味增神父手中和徐簡谷神父一起發了願。徐味增神父是徐簡谷的伯伯，發願後由桑神父向羅馬作了匯報。

就這樣我身兼四個代職，我認為每加一個高職就離監獄更進一步。擒賊先擒王，政府必先抓頭頭，我一個人擔當可以保護他人，耶穌會、教會處境越來越困難，運動一個接一個，已無招架之力，只得束手待

擒，何必把他人推入絕境，殊不知個別會士大為不滿，多出怨言，說我好權、不相信人等等，我聽了只能苦笑。

我當了代會長後去龔品梅處向他匯報，並向他保證，上海耶穌會將一如既往和教區合作，並且向他表示服從他的安排。但我向他說明我不是法律專家，起不了以前格壽平的作用，並向他說明我的主要工作應放在修院上，不能經常去他處，他表示理解。

我知道教區神父很久以來對耶穌會不滿意，尤其不滿意龔品梅偏信耶穌會士，不徵求教區神父的意見，喜聽格壽平的話。我認為這是歷史形成的，我應盡力糾正。首先我很少去龔處，免得人家認為我在操縱他。其次龔以四川南路為主教公署，可是四川南路天主堂的院長和本堂神父仍是耶穌會士，我就向龔建議，耶穌會從四川南路撤退。經龔同意，我把丁汝仁神父調去佘山作總鐸，宋之禎不再當本堂司鐸，又把沈百順神父調去郊區當本堂。我任命梅乘騏神父為徐家匯院長兼本堂，接替被捕的蔡石芳神父。我又向龔聲明，環境容許時，耶穌會士將去海州教區工作，除了修院以外，其餘的堂口工作將全部交付於教區神父。龔表示不應心急，應暫緩。以後形勢急轉直下，「九八」事件（即1955年9月8日政府大規模鎮壓龔品梅集團運動開始日）馬上到來。我們中大多數人都被投入監獄。

政府肅清帝國主義的行動繼續進行，他們先後把物理學家葛爾克（Burgaud）神父、姚贊唐神父驅逐出境。在押解桑黻翰出境時，到了廣州，神父心臟病突發，死在旅途中。公安局通知廣州天主堂，廣州主教鄧以明曾在上海念書和工作，是桑的學生，他親自去料理，把桑的遺體安葬在廣州公墓內。事後寄了照片告訴我，我很感謝他。鄧後來也被捕，釋放後政府允許他仍當廣州主教，他要求去香港治療，政府批准了。梵蒂岡國務卿卡薩羅里（Casaroli）特去看他，又把他帶到羅馬，拜見教宗。教宗任命他為廣東省大主教。發表前，教宗問在羅馬耶穌會總院當參贊的朱勵德神父：「這樣做妥當嗎？」朱回答：「完全妥當。」但這個任命一發表，國內就興起一個反對梵蒂岡干涉中國內政的浪潮，政府也不讓他回國，他只能流亡在海外。他為人處事一直保持低調，謙虛謹慎，很少發表反共的言論，他的作風與龔品梅不同。我去舊金山時，他希望見我，美國瑪利諾會士 Nobiletti 在舊金山顯聖堂當本堂，接了我去他處，他不會普通話，我不會廣東話，兩人只能用英文交談。他說自己願意回中國，死在祖國，他希望我把他的願望轉告中國當局，我回來後

向宗教局和公安部門作了匯報，他們要我告訴他必須公開表示悔改，求祖國人民原諒，鄧表示不能接受這個條件。最後他死於美國舊金山。他死前發表了自己的自傳，題為《天意莫測》。我一直認為他是個好神父、好會士、好主教，是時代的犧牲品。我去舊金山時去了他的墓地聖堂內，在他的碑前求了天主。

龔品梅在50年代初曾秘密指定，他不能履行主教職權時，由徐元榮神父和陳天保(又名陳輔民)神父為第一和第二接班人。到1955年他認為前一個怕事，後一個太強硬，都不合適。故在修院 Balirach 神父被勒令出國前，龔品梅在一張小聖像上寫了一封給教宗的信，指定李思德神父為第一接班人，張登俦神父為第二接班人。Balirach 後來寫信告訴龔，已把信帶到了羅馬。龔被捕後，四人都說自己根本不知道這事，拒絕做繼任人，教區神父選德高望重的張士郎神父為代理主教，報了羅馬，羅馬福傳部回信不接受，說應該按照龔的安排行事。

黎培里1951年被驅逐出境後，按照羅馬指示留在香港待變。他曾寫信給龔品梅說：「不出五年，我又將在黃浦江畔散步。」龔把信給我看，我回說：「不可能」。日子越久，共產黨政府越強大，美、蔣回來的希望越小。龔品梅不以為然。黎培里被驅逐出境前，政府發動一個宣傳攻勢，說他只是一個摩納哥公民，卻在我國發號施令，破壞「三自革新」運動。全國上下都聲討這個摩納哥公民，鋪天蓋地的漫畫張貼在街上。神職人員、教友們不表態，只有南京教區代主教李維光響應號召，先參加「三自革新」委員會，繼而發表聲明攻擊黎培里。黎培里很惱火，到了香港後去羅馬匯報，要求聖座絕罰李維光，聖座批准。黎培理來信責成龔向李維光宣布他已被絕罰，龔收到通知後很為難，知道這將促使李維光更死心塌地跟共產黨走，又將引起政府反擊。就要李式玉(二李是同學又是好友)去執行，李婉言推辭，後龔用書面方式通知了李維光。解放後遭羅馬正式絕罰的只有李維光一人。教宗沒有絕罰過其他人(包括後來自選自聖的主教)。

1954年6月16日即反帝愛國運動開始一周年，政府把封鎖徐匯耶穌會院的解放軍撤出，讓神父修士們自由出入，又把格壽平釋放押送出境，報上也刊登了這則消息。格到了香港，通過香港聖衣會修女親筆寫了一封短信(寫在一張藍色的小紙上)給龔品梅，說他在獄中聽到教堂鐘聲，沒有說一句、做一件不利於教區的話和事。龔收到後把信給我看，表示放心，也叫全體神父們放心。格沒有出賣任何人，他畢竟是位

有人領養去。大多數無家可歸的留下，教他們識字，學一門手藝，長大後男的分到土山灣孤兒院，女的留在聖母院工藝間。到了18歲給他們介紹對象，讓他們成家，並分配給房子讓他們生兒育女。

人民政府派人把這個埋葬嬰兒的墳地挖開，收攏在一起的成堆白骨被拍了照，並冠以大標題刊登在各大報紙上，暴露於上海市民眼前，稱為萬嬰塚，成為傳教士帝國主義分子屠殺我國孤兒的鐵證，組織學生、工人、職員和里弄居民參觀。參觀者義憤填膺，高呼打倒帝國主義分子，教徒們拒不參觀，更不承認傳教士的罪行。

我當時感到教友在廣大群眾中越來越孤立，置身於廣大人民之外，日子真不好過。高考了，教徒青年都落選，入不了大學，找不到工作。我有一個感覺，羅馬教廷在三百多年前禁止中國教友尊孔祭祖，遭到教禁，一部分轉入地下，一部分放棄信仰，福傳事業遭受極大挫折。現在不准教友擁護共產黨，不准教友加入共產黨組織的社團，不准看共產黨辦的報紙、書刊，也將遭到同樣的命運嗎？

我發覺梵蒂岡只聽被驅除出境的傳教士的匯報，根本不了解新中國的宗教政策和中國教會所處的困境。在中國抗美援朝的高潮中，梵蒂岡卻任命美國籍耶穌會神父費伊(Fahy)為江蘇揚州教區主教，要中國教友服從一個美國人的領導，真令人啼笑皆非。我認為中國政府也不了解教會，他們只諮詢胡文耀、楊士達、湯履道幾個人，而這些人並不真正了解教會，向政府匯報時怎能反映真實情況呢？對政府的決策沒有用處，反而起誤導作用，總之，雙方都不「知己知彼」。

我1951年初春回國，1955年被捕，在外四年半。這一時期，我由教師到代院長，到代會長，到代巡閱使，到代監牧，感到形勢越來越緊。無可奈何，我參加不了上海教區的決策層，也左右不了局勢，深知自己已被置於絕境，我只準備被捕，死在獄中。

我的觀點和龔品梅有所不同，我的作用和當時很活躍的王仁生、朱樹德、陳天祥、朱洪聲、陳雲棠也不相近，但作為耶穌會士，我和他們基本上保持一致。凡來問我者，我一定說不要加入愛國會，不可脫離教會。我作風比較低調，不太拋頭露面，不張揚，我只想爭取時間培養好接班人，讓他們繼續我們的事業。但事與願違，政府已忍無可忍，決心把反抗者一網打盡，修院不能倖免。徐匯區政府姓趙的幹部做修院二十個職工的工作，不停地召集他們開會，組織天主教職工聯誼會，為他們爭取福利。他們全心依靠政府，向政府請示匯報，工人階級要做領導。

政府又先後公開抓了兩個修生，先是艾祖明，後是施達生，隔了幾個月先釋放後者。政府通過他們進一步掌握修院內部情況，搜集資料，證據齊備了就可以採取行動。

我有一個朋友是江陰人，是原震旦大學附中的教導主任，屬南京教區，他和最先擁護愛國會也是唯一被羅馬絕罰的李維光代主教很要好。他於1955年夏天去看李，李說了幾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友人告訴我，可以推測另有運動即將到來。政府又抓緊逮捕人，君王堂一個名叫孫國華的女青年教友也被抓走了。「山雨欲來風滿樓」，更大的打擊將撲向天主教。

1954年教區似乎較為平靜，我覺得政府正在醞釀較大的行動，使我緊張的是政府大張旗鼓地鎮壓取締反動會道門，尤其「一貫道」，組織群眾參觀揭露其罪行的大型展覽會，學校、里弄重點組織天主教徒去參觀，並要他們參加座談會表態。1955年初開始肅反運動，毛澤東親自主持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報上刊登胡風反動集團的材料，一批又一批刊登胡風的反動言論和來往書信的摘要，這些信件由胡風的好友舒蕪提供。用心看這些摘要及按語，我感到恐懼，心想怎麼持不同意見、思想分歧都成了反革命罪行？信件內容去頭去尾就成為罪行鐵證，這是清朝的文字獄呀，同時意識到我們的末日也快來到，但也強作鎮靜，在修生前絲毫不露，深怕影響修生（關於1951-1955年這段歷史，先在徐匯後去台灣的法國耶穌會士雷煥章（Jean Lefevre）神父出版了一本法文書《上海城市兒女》，詳細敘述了鬥爭經過，可供參考，該書數度再版，可稱暢銷書）。

一擊使龔等認為教難已到，於是全方位對抗。在當時的背景之下，上海教區不會出現類似基督教的吳耀宗那樣能站出來擁護政府的人物。龔是時代的產物，是個悲劇人物。在龔的領導、鼓勵之下，許多教徒準備犧牲。但犧牲未成，龔也只判無期。由於種種原因，人民政府先准許他保外，然後改判，終於提前釋放。他要求赴美就醫半年，並保證自己出國後決不反共，政府同意放行。羅馬教廷又提升他為樞機，他如願以償，得到賞報。善牧應留在羊群之中，和羊群同甘共苦，半年過後，他不回國，寧願流亡，在美國庇護之下過富裕的生活，發表了不少反共言論。他走前在杭州休養時曾向我說：「歷史上叛國的人沒有好下場。」又說：「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鬼。」到了美國，這些話已拋在腦後。人們原諒他到美國身不由己，由他侄兒龔民權控制，他不會英語，在美時為早在外邊的家族所控制。事實上他又一次失去自由。但人有意志，得為自己的言行負責，路是自己走出來的，對每一個人來說時時處處都有一個何去何從的問題，不能推卸責任，我引以為戒。

第五部分

獄中生活

第一看守所 (1955-1960)

1955年9月8日聖母誕生瞻禮那一天，也是我發初願的紀念日，晚上9時半，我正在房間內看書時，忽然修院大門打開了(工人們早已奉命做好準備)，一批便衣衝進修院分頭抓人，有四個人衝進我的房間，向我說：「你被捕了，跟我們走。」我被押上一輛小汽車開走了。我看見嚴蘊梁也被抓，當時我想他們為什麼抓嚴？他從不外出活動，怎麼連他也抓了，這次規模大了。事後才知道，這是全國規模的大逮捕，從東海之濱到天山之麓，從中蘇邊境到海南天涯海角，凡屬龔品梅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凡與龔有事實上或只是在思想上有聯繫的都悉遭逮捕，無一倖免。以上海來說，被捕者數以百計，以後又有人陸續被捕，數以千計。

在逮捕我的同時，近百名警察衝進修院搜索逮捕神父、修士，把全體修生集中在禮堂內宣布各種措施，在四川南路主教府和其他教堂逮捕了龔品梅等人，凡是教區中重要人士無一漏網。

警察把我們押上停在院門外的小汽車，兩名警察把我夾在中間，一路上我想：「這日子終於來到了，求仁得仁，又何怨哉！我的使命已完成。在中國的耶穌會、修院不需要我操心了，一切託付與天主手中吧！」

汽車開到(後來我知道的)上海第一看守所，幾個警察問了我的名字驗明正身，做了紀錄，搜去所有東西，包括念珠、胸前掛的聖牌，衣服上的鈕扣也被摘去，把我推進一個小房間。裡面已有兩個人，房內沒有桌子，沒有椅子，沒有床。看守告訴我不許向人說出自己的姓名，給了我一個番號，說「你今後就叫這個」，以後每到一個監獄換一個番號，番號多了也記不起來了，漫長的監獄生活中我只是一個番號。

我坐在地上收斂心神祈禱，四年來一直等待的日子終於到了。我把修院、耶穌會托給聖母，自己真的不必為之操心了。我特為修院學長、周靜海、游國傑以及青年學生劉彤霞、諸正璿祈求，求聖母保佑他們，祈禱後便睡著了。

早上6點鐘被叫起來，同室一個囚犯很健談，說自己是杜月笙的徒弟，這是他的主要罪名。以後相處熟了，知道他是票友，特愛京戲，和京戲界熟悉，與馬連良、周信芳、孟曉冬、梅蘭芳是朋友。

過了兩天就有警察來提審我，要我交代罪行，講政策：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我在看守所將近五年，主要提審員(叫審訊員)名叫黎真(從他每次審問叫我在紀錄上簽字時見到他的簽字而知)，記錄員姓湯(女)。黎的水平不錯，掌握政策較好。我釋放回來後向宗教局浦作同志和公安局虞月新同志說，我對他印象相當好，他們說不知道怎麼的，局裡一直沒有允許他入黨，很不得志，他也不願再踏進公安局大門。我後來創辦光啟社缺少人，浦作同志說黎真中文修養好，他現在閑著，可請他來當編輯，我說歡迎，浦作後來告訴我他婉言謝絕了，我想對呀，一個審訊員怎能同一個階下囚共事呢。據說黎無兒女，領養了一個女兒，女兒在美國對他很孝順，最近聽說他已死了，死前幾年患老年癡呆症，很可憐。

這兒順便說一句，許多人問我，獄中受過刑嗎？我說：沒有。只記得有一次審訊時(上面高高坐著五個警察，我坐在地上的一個小板凳上)，我一直不說話，有一名審訊員高聲喊道：「來刑具。」進來了兩個人拿著手銬腳鐐，擲在地上，噠噠有聲，這個審訊員說：「上！」兩個人走上來，黎真站起來說：「今天審訊到此結束，押他回去。」可能他們事先商量好的，嚇唬我一下。

幾次審訊沒有收穫，政府就把我擱在一邊，兩個多月不再提審。一次把我帶到另一屋內，有電線拉進來通到外面，要我聽寬大釋放大會實況。發言的人中有我的堂叔叔金愛德醫生，他原本很反共，會上卻很進步，判若兩人。接著宣布寬大釋放劉彤霞。第二天審訊員問我對昨日大會有何感想，我說，她進步了，自由了，是好事。黎真說，「你得拋棄幻想，你外邊的親信只有兩條路走，一條是檢舉揭發你，一條就是被逮捕。」我回說，還是檢舉揭發我好，我不希望他們來。我「九八」後再沒有見過劉彤霞，她不願看我，後來我知道她與一位同學廖鳴琴結婚，廖是好教友，但我一直為她求天主，願天主保佑她。

另一次把我帶到一室，見有電線拉來，我知道又是讓我聽公審大會。先是有人被寬大釋放，接著是宣判——聖母軍頭子沈多森，多次加刑不知悔改，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我認識沈，他的侄兒沈士偉、沈樂平、沈樂天都是修士，他自己是英語老師，有妻有兒。但他是聖母軍華東區的副總會長，正會長是個女大學生名叫陳瑞璋，她一見形勢不妙，就逃往海外，入了耶穌聖心會當修女，修會培養她成為英語專家，精通莎士比亞。80年代政府邀請她來大學講學，待遇很優越。三十六計走為上計，她走，沈留，結局天壤之別。聽了轉播以後，沈的形象一直在我眼前晃來晃去，我想到他年輕的妻子和幼小的兒女，幾夜無法入睡。

1963年初勞改局從全國各地監獄調集24人做翻譯工作，我也被轉到秦城監獄(下面將提到)。同組的犯人名叫張蔭桐，原是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因不滿復旦大學黨委書記楊西光沒有重用他，對他不公正，後來和老婆一起企圖到香港去，老婆把黃金藏在頭髮中，在偷渡時被雙雙抓住同時判刑。他說與雕塑家張充仁是連襟，說他在上海提籃橋監獄中和沈多森關在一起，他說沈攻擊政府的話他都向管教一一匯報了，不知沈的加刑和他有無關係？我聽了心想「嗚呼哀哉知識分子！」我一直對他有看法，與他說話比較小心。回上海後，一起勞改後平反釋放恢復原工作的章民泰，請同在一起勞改的杜滄白、孫靜功等聚餐，我見到了張，內心厭惡他，以後聽說他患了老年癡呆死了。

聽審判廣播後，審查員來的次數增加，每天晚上8點整，當其他囚犯睡覺時，他們便來提審。他們高高在上抽煙飲茶，我坐在下面又渴又冷。清晨兩點鐘放我回去，腦子亂糟糟的無法入睡，早上6點鐘，看守叫起來端坐不准動，一連六個月一百八十天，天天如此(星期日例外)。這段日子不好過，但也過了，世上沒有過不了的火焰山。

由於拒不交代，審訊員就把他掌握的資料發給我看。首先看的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最最尊敬的老師，我和他無話不談、事事共同商量的陳雲棠神父寫的，我看到的大標題是：《揭發反革命分子金魯賢罪行的補充材料》，厚厚一本。我心想，天呀！補充材料就那麼多，原來的諒必更多。又想，不好了，我還能瞞什麼？我翻閱了一下，震動極大。

拋給我看的第二份材料是龔品梅寫的坦白材料，也是相當厚的一本。

黎真問我，你看了還想什麼？還能隱瞞什麼？還不早早交代。

不是派兵去救釜山的軍隊，而是從後方仁川登陸，再南下把北方軍隊的後路擋住，麥克阿瑟這招棋高明。」這明明是破壞抗美援朝。

關於美帝細菌戰，我對人私下說：「細菌戰者用細菌也，報上刊登美帝在冰天雪地中從飛機上投下許多蒼蠅，都凍死了嘛，怎能說是細菌？」我又說：「中國政府這樣宣傳不是笨拙嗎？」

我破壞「三自運動」，我經常對人說：「不可參加愛國會，不可脫離教宗。」

我破壞聖母軍登記命令，我對那些問我的聖母軍說：「登記了承認聖母軍是反動的，你也承認自己是反動分子，你以後必須絕對聽公安局的指令。」

我破壞參軍、參幹，有人讓我拿主意，我說：「年輕人多讀書多學些本領才是正道。」

我破壞反帝愛國運動，因為我說了：「不是所有傳教士都是帝國主義分子，有的很愛中國，很愛中國人的，比如遠的像利瑪竇、湯若望，近的像剛恒毅總主教、雷鳴遠神父等。」

我破壞統購統銷，因為我怕修生按糧食定量吃不飽，就私下囤積了大米。

審訊員說：「你看，你處處與人民為敵，是人民的罪人。」我說：「我低頭認罪。」審訊員說，不能籠統地交代，必須交代具體人、具體時間、具體地點，否則只是蒙混過關，態度不端正。

這些交代不能滿足審訊員的要求，他要我承認我從羅馬回來是受教宗庇護十二世親自派遣，破壞共產黨的人民民主專政，企圖顛覆新成立的共產黨政權。要我承認是個國際特務。他給我看懲治反革命條例的條文：「凡勾結帝國主義背叛祖國者判無期直到死刑。」我說自己不是帝國主義走狗，更沒有資格和帝國主義勾結，我與帝國主義沒有關係。黎審訊員說：「你還狡辯，我們有你做間諜的鐵證。」逮捕我時警察搜查我的房間，把我的東西全部拿走，包括我父母親、姐姐的照片、我的信件、我的日記，說這是反革命罪證。內有一封信是東台安豐一個張姓教友寫給我的，信中他說，今年種棉花可賺錢。審訊員說：「這不是經濟情報嗎？」另有一信是蘇北大豐一個法國神父 de Basher 寫的，信上說：「奇

怪，這兒從來沒有飛機飛過，今天有飛機飛過，罕見的。」審訊員說，「這不是軍事情報又是什麼？你不是特務又是什麼？」我聽了哭笑不得。罪名嚴重得很，可判死刑。我當時下定決心，如能活著出去，今生再也不留信件。1982年我釋放回上海至今已二十六年，我沒有保存私人信件。我曾有寫日記的習慣，我喜歡拉丁文，拉丁文更能表達我的思想。一天審訊員向我說：「你這個人真不老實，寫日記還用外文，我們請人費力譯了出來，可是沒有有價值的內容。」我釋放後不再寫日記，寫日記本是寫給自己看的，有思想記在心裡就夠了，往事如煙，寫它幹嘛？

我是教宗特派的間諜？我在羅馬兩年，身份是學生。在羅馬的各國留學生成千上萬，我沒有資格去看教宗，我只在伯多祿廣場中雜在十幾萬人中間遠遠看到過庇護十二世。以我個人身份，連耶穌會總會長也不願單獨接見我。我回國前去總院，人們安排我吃飯時坐在他旁邊（當時總院用飯是不准說話的，出飯廳時他停下跟我說了兩句話就算待遇了）。教會內部很講究身份，地位低的人不受尊敬。

審訊員說：「你的材料逮捕以前已掌握，逮捕後加上你的友人的交代和揭發更是清清楚楚，你沒有什麼可以隱瞞的，你的交代對我們用處不大，只用以證實那些資料以及觀察你的態度而已。政府不打無準備之仗，通過張伯達、才爾孟、格壽平以及先你被捕的人或覺醒後靠攏政府的，摸清了底才動手抓你們的。」

一次審訊員來提審，極嚴厲地說我很不老實，隱瞞了主要事件，不肯交代。他看我不理睬他就說，他指的是四川南路地下埋有黃金之事。我說：「不知道。」他說，龔交代了並畫出地點，他們掘出來，有1000兩黃金之多。龔品梅釋放後對我說，他要向公安局要回這1000兩黃金，因為審訊員向他說明，如果他主動交代，將來一定會還給他的。我把龔的話反映給公安局，他們回說這筆錢在龔判刑時，判決書上說把它充公了。事後我問龔，為什麼最初政府沒有搜查到這批黃金，他說，才爾孟與他手下的杭修士把金錢放在紅酒瓶內，外面塗了瀝青，探測器探不出。

我在看守所時的思想動態政府也全部掌握。五年時間中有四年多我和一個青年關在一室，他叫林耕康，岳父是小兒科醫師，在留學時娶了德國女子，所以他的妻子是混血兒，他會一些德文，也會俄文。他喜歡足球，常去徐家匯中學看球，認識王方神父，他父親曾是國民黨中央信託局局長，認識陸伯鴻。我們有共同語言，我們談得很投機，別的囚室

不許互相交談，我們囚室管理員也不來干涉，我們兩人無話不談。我的情緒不是一平如鏡，有時低落，有時發洩對共產黨的不滿。審訊員審問時總是耐心教育，我奇怪，回來問林：「怎麼政府這樣了解我，掌握我的思想動態，難道在我們室內有竊聽器？」他四面察看後說：「不會有吧。」判刑後我轉押到提籃橋監獄，旁邊一個囚室有一個講德語的俄國猶太人，我們用德語交談，他很高興。他說他在看守所，同室一個青年能講俄語也能講德語，後來發現他是政府派在他身邊的人，負責了解他，並不時向管理員匯報他的情況，一問長相和林耕康符合。隔了一年，又來了一個俄國犯人，他也說同室犯人是個政府派來了解他的人，描述長相也像林耕康。我恍然大悟，自以為是我的知己者乃是特務也，後來一想，他爭取從寬發落，做此工作，情有可原，無可指摘。

我釋放回上海後，林耕康來看我，說他一直懷念我，又說，他沒有得到寬大處理，仍判刑十五年，刑滿釋放才知妻子已改嫁，長兄與他劃清界限不收留他，並吞沒了他的一份家產。他已再婚，有了兒子，在浦東一所中學教英文，深得好評，業餘時間還做家教，其中公安局的翁處長也請他去做家教。我恰好缺少英文老師，就請他在修女院教英文。我見到翁處長，他說他兒子由於林的輔導進步很快，翁又說此人也可憐，希望我多多照顧他。我去了他家，在楊樹浦一個老房子的亭子間內，妻子、兒子擠在一起。兒子大了，我讓沈保智神父給他在浦東找了一間空房，他搬去住了，我又聘他為光啟社譯員，以後他辭去了工作不再來看我，但我仍同情他的遭遇。

交代了罪行，審訊員開了一個名單，叫我寫他們的材料，凡與我接觸過的人，我都得寫，重點寫他們的問題。公安局掌握了與我接觸過的所有人，包括只見過一面的人。比如：朱大成醫生，我和他沒有來往，只是一次在復興路、思南路轉角碰到，寒暄了幾句，公安也知道。我想：共產黨做事那麼細、那麼認真，真令人佩服。後來一想我是個要犯，我是「派遣特務」，政府怎能不重點監視我呢？後來我見到過公安的兩名高級領導，一位是50年代初上海公安局的政保處處長，一位是姓顧的，本在上海公安局，後調北京任公安部副部長，他們說：「你一踏上大陸，我們就密切注意你了！」

我一直處在天羅地網之中，但自己絲毫沒有察覺，好愚蠢呀！實際上，我們都好愚蠢。我得出結論，凡自作聰明，在暗地裡搞秘密活動的都是傻瓜。

要寫的名單很長，不少人只見過一面，我得搜盡枯腸細細回憶，我盡力寫，在材料收尾處我總是加一句：「此人無問題，如果有問題的話就是他認識了金魯賢。」審訊員多次對我說：「知道了，這句廢話，不必寫。」但我仍寫上。我想，他們認識了我就生了麻煩，要交代，我確實是個害人蟲。以後如一旦有了自由盡量少接觸人，免得連累他人。我釋放回申後，起初很謹慎，少接觸人，後來忘了又大量和人往來。

我對三個人懷有內疚。蒲敏道被驅逐後，瑞士領事館來人說，蒲寄存在他們那裡的20根金條（合200兩金子），遵他囑交還給我。我知道放在身邊不妥，交給了榮德先保管，另有一些則分別寄存在顧梅聖、姚德芝家中。這事我向陳雲棠說了，我想自己被捕後陳將接替我，陳已交代，我隱瞞不了。在看守所我交代了，政府叫我寫了紙條向他們要走。這就為他們造成麻煩，我出來後向他們深深道歉，他們原諒了我，寬恕了我，和過去一樣認我這個朋友，我感激他們。顧、榮二人已歸主，姚現住在美國檀香山，她是我好友李俊儀的妻子，李也因龔品梅的事被捕入獄，當時他有兩個兒子和一個吃奶的女兒，姚一個人既工作又撫養小女兒，他們的大兒子用心念書，勤懇工作，當上江蘇徐州市的副市長，後為江蘇省政協副主席，很孝順。

1957年春，中國政府氣氛發生變化，費孝通說是早春天氣，政府準備釋放我們，先有張家樹和早已釋放的陳輔民、周士良三位到南市看守所探望我，和我長談，介紹上海教區的大好形勢。接著一位不知名的高級幹部來看我，和我長談。看守所內，警察召集了我和同時關押的沈增禮、周靜海等十人開一個座談會，暢談心得，講些什麼我忘了，只記得沈增禮的話，他說：「今天是聖神降臨瞻禮，還是讓我們祈求天主聖神光照我們吧！」最近我見到他，並提及此事，他說已記不得了，我卻一直記在心中。他真是一個好神父，那時有一名管教人員也向我說：「你快回去了。」

風雲突變，反右開始了。平時我們看不到報紙，一天小窗外塞進一張報紙，內容是批評《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我記住了章羅聯盟。羅隆基的名字我知道，他曾是天主教《益世報》的主編，《益世報》的董事長是于斌。1945年馬歇爾作為美國總統特使來我國調解國共關係，羅去見馬，談了許多反蔣擁共的話。事後馬問于斌，羅的話代表多少人，于回說只代表他個人。于又說：「蔣獨裁，在他執政時，民主是多大的

問題，共產黨勝利後，民主是有無的問題。」馬歇爾不置可否，于曾用六個字總結他的一生：愛國、愛教、反共。

到了9月，一天又塞進了一張報紙《解放報》，整版一篇文章，題為《射向共產黨的十支毒箭》，報道朱孔嘉、顧守熙、董貴民幾名大右派如何惡毒攻擊共產黨，其中心內容：龔品梅是好人，逮捕他錯了，應立即釋放。我心想，早春天氣又變成隆冬臘月了，安心待在獄中吧。伙食也變了，每天早、中、晚小窗口塞進來的鋁盒內只有白薯，水煮的，不放鹽，沒有油，更沒有糖。開始幾天我很高興，我喜歡吃，但一個多月下來，不對，感到燒心，胃酸冒出來，自然而然地從嘴角流出來，這樣連續九十二天，再給我們送來飯時，感到米飯真香！

這種日子過了一年，形勢又有好轉。監獄內，管教寬、管教嚴、伙食好、伙食差，都和外面的階級鬥爭息息相關，這也是毛澤東所說的「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管教寬了，犯人室內可自由交談，放風次數多了（所謂放風，就是把犯人領出囚室，到外面沒有屋頂的小屋曬太陽），洗澡的次數也多些，伙食也好些，可開大賬（即可托管理員購買東西）。管教嚴了，囚犯間不許說話，只能緘默反省罪行，不開大賬，不洗澡，不放風。1959年上半年氣氛又鬆了，審訊員也和顏悅色了，日子好過了，可是到了9月忽然擴音器廣播，高舉三面紅旗粉碎右傾反動分子的猖狂進攻，打倒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人，這些內容反覆廣播著。我心想，彭德懷不是志願軍司令？張聞天不是黨總書記嗎？真搞不清楚，可是接下來管教嚴了，伙食差了，可見外面階級鬥爭又激烈了。

對我的管教也時嚴時寬，我不回答問題、拒絕寫材料時，管理員就把我放到大房間去，20人甚至30人的房間內。記得一次，轉到一個很大的房間，有32人，安排我坐在一個大馬桶旁邊，晚上睡覺時當然也躺在馬桶旁，所有房間都沒有抽水馬桶！32人擠在一起，沒有多大空間，不能平臥，只能側躺，別人大小便時走來，踩在我身上，揭開蓋子撒尿，拉屎，臭氣撲鼻，尿聲朗朗，難以入眠。才想睡去，另一個人又來上馬桶了。又沒有放風，更沒有洗澡等。寬時調到較小的較清潔的房間，又放風又洗澡，可送進東西包括食品，有時還能看電影。看電影的經過是這樣的：當人們都坐在大廳內，電影開始放映了，廳內漆黑一片，就把我領到第一排中間坐下看，電影快放完時先把我領出，看不清任何人。有一次我坐定不久，一名警察領進一個人，在我右邊坐下，我

不給？審訊員說：「他們覺悟高呀！你還是寫給你的親戚吧。」我有親的伯伯、親的舅父、親的姨母，我寫了幾封信，交給審訊員，一如石沉大海沒有回音。隔了好久，審訊員對我說：「我們去了人，這些人拒絕收信，說與你毫無關係。你有朋友嗎？寫給朋友吧！」我考慮一下，給榮德先寫了信，隔不多久東西送來了，很豐富，還附有幾十元人民幣。原來監獄內有時「開大賬」，有錢的犯人可托管理員買些東西，無錢的犯人只好瞪著眼看。審訊員許我每兩個月寫一次信，出獄後我才知道榮德先的丈夫朱義生也因華理柱的案件被捕，也在獄中，她得送兩個人的東西。審訊員問她，不劃清界限嗎？她回說：「政治上劃清，人道主義上不劃清。」我調到北京秦城監獄後，她郵寄給我，直到文化大革命，她也被抄了家，被群眾監督，每天得掃里弄，工資扣到每月40元。因當時她沒法知道我的音訊，以為我已死在獄中，才中止給我寄錢、寄物。

我出獄後知道有些神父被捕前就妥善安排好送東西的事。其中吳應楓佈置得更好，叫人送聖體進去，他大有安慰。有一次他弄巧成拙，他在寫信出去時加上一句，「上次送得很好，下次照送。」信通過管教員檢查，管教員敏感地認為內有文章，下一次送時檢查特嚴，最終發現麵包裡夾有小「聖體」，送者原是北橋普慈療養院的護士，當場被扣留，押回醫院批鬥、開除、失業。吳被判刑後去安徽勞改，死於農場。

犯人收到接濟有很大安慰，我判刑後被押送到提籃橋一號監。一天我去打水時見到了我的學生秦國良，他叫我聲「院長好」，顯得很高興。有人見了匯報給管教員，後來我知道，秦為此遭到禁閉，家人停止送東西三個月，我真對不起秦。後來他被送往青海勞改，刑滿留場，先為地下神父，現已上來，政府承認他為神父。他回上海時從未看過我，我托人向他問好，他也不理我，但我一直為他祈求。我們這些人最容易牽累人，言行必須加倍謹慎。

許多外國友人問我，我怎樣度過這麼漫長的歲月，還問我能做彌撒嗎？有《聖經》看嗎？我認為外國人實在天真，在共產黨的監獄怎麼會允許犯人做彌撒呢？一入監獄，所有東西都抄走，不能攜帶宗教標記，念珠、聖牌都搜走，看守所內身邊沒有書本，更沒有《聖經》、彌撒經。

但是我心裡可以祈求，這個，共產黨拿不走，我幾乎終日祈禱，但不能出聲，一出聲同犯就會匯報。也不能動嘴唇，嘴唇一動，看守的警察知道我在祈求，就警告我。我天天心中唱彌撒，拉丁彌撒，我心中念玫瑰經，上午十五端，下午十五端（當時還沒有光明五端）。我有時拜

十四處苦路，我背誦福音，尤其若望福音。我初學時看過聖衣會修女聖三依撒伯爾的傳記和她的著作。她熱愛天主聖三，她曾說：「有天主聖三在我心中，我好似在天堂。」我在初學時不太幸福，但修女這句話深刻在我心中，我苦悶時就默想這句話，得到安慰和力量。進了監獄，我一無所有，和外界全部隔絕，據審訊員說，我的處境是眾叛親離，孑然一身，一貧如洗，但天主聖三沒有拋棄我，他在我心中，任何世界上的力量都不能把聖三從我心中奪走。在外面我很忙，我心分散，分在許多人身上，分在許多事物上，現今我應收斂心神集中於天主聖三了，天主給了我這個機會，我應感謝天主。「天主聖三在我心中，我好似在天堂。」這句話伴隨著我二十多年的勞改生活，支持著我。我的身體、我的精神沒有垮（我出來後獲知該修女已列入真福品，她也發靈跡治好了我的好友德古特雷樞機的病，樞機虔誠恭敬她，我很高興，我去里昂時，樞機親自陪我去修女修道的聖衣院。2003年我又去過該院，迄今我和該院通信）。我出來後心又分散了，不專心放在天主聖三上了，自我原諒說：愛天主就在愛人呀，愛了人才算愛天主呀。總之，我在監獄時私下背誦彌撒經文有時比現在公做彌撒時更專心致志，我退步了，「上主求你垂憐！」如果沒有提審不寫什麼材料，雜居在犯人中間似乎也能過隱修生活。

附帶說，我交代後審訊員錄了音，一則怕我翻供，二則放給外面的人聽。我同意他們放給人聽，叫他們別對抗政府，我不希望他們進來飽嘗鐵窗之苦。進監不是好玩的事，進監不等於犧牲，人家不讓你犧牲呀！逮捕你時，其理由不是信德方面的問題，而是盡量和政治掛鉤的，不可隨便號召教友犧牲，犧牲不是呼口號可達到的，喊口號最響的人不是流亡美國嗎？

1960年似乎外邊的形勢好了，我個人在看守所的待遇大大提高，每天讓我放風，帶我去洗澡，每天有葷菜，審訊員對我和顏悅色，向我說已釋放了梅乘騏等人，希望我出去後引導教友愛國愛教。就在這時國民黨狂叫反攻大陸，中國政府將嚴陣以待，同時認為不能把像我這樣的人放出去。有一位女警官來看我說：「錯過了這次良好機會，沒有關係，好好爭取吧。」我當時的思想：一切都有天主上智安排，為愛主的人，天主安排總不會錯。到了6月政府對我正式開庭宣判罪行，事後感謝天主沒有放我出去，六年後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紅衛兵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對所有宗教工作者狠批、武鬥，放出去的梅乘騏等遭到毒

打，二十二年後我釋放回到教區，張家樹對我說：「你回來正是時候，好事到了，我1960年聖主教後只是擺測字攤。」我說：「怎麼解釋？」他說：「我做主教後政府只叫我做兩件事：寫材料，交代自己，揭發他人。」

公審判刑 (1960)

時間到了，政府可以收穫勝利果實了。

1960年6月初給我理了髮，換了整齊的衣服把我押上汽車，開到法院(我已關押四年又九個月，和我一起審判的陳哲民於1951年被捕已關押九年)，公開審我。進入法庭，見上面坐在審判員旁的還有湯履道和陸薇讀兩人，他們是陪審員。證人席上是沈保智與李文之兩人，我後面有許多人，鴉雀無聲。公訴人起立宣讀上訴書，律師為我做了辯護後退堂，返回看守所，隔了幾天又把我押上汽車。這次帶上手銬，送我到靜安寺北京西路轉角一個大院內。公審大會開始了，庭上法官前有十幾隻小籠子，每人一個——龔品梅、我、李式玉、朱樹德、陳哲民、王仁生、朱洪聲、陳雲棠、張希斌、陳天祥、蔡忠賢(即蔡石芳，他先我們被捕，我們被捕時，他較快地釋放回到徐家匯修院。後法國總理富爾(Faure)來訪上海，要求單獨會見蔡，政府同意了。蔡見到富爾，先要求富爾對談話內容絕對保密，富爾保證後，蔡就與他暢談。誰知他回國後把談話洩露出來，消息反饋到中國，蔡就第二次被捕)。公審結束退堂，龔判無期，朱樹德、張希斌、陳哲民判二十年，我判十八年，戴反革命帽子九年，朱洪聲十五年，陳雲棠十二年。龔和我被送回看守所，翌日徐家匯大堂隆重祝聖了上海第一任自選自聖的主教張家樹，龔和我移押到提籃橋一號監獄服刑。

在結束看守所生活前夕我自己作了一個反省，現在簡單地寫在下面：

在漫長的審訊期間，我也利用它加強祈禱並反省我們的錯誤，反省的結果應作為我的收穫，即吸取教訓。教訓很多，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我們祈禱往往要天主來完成我們的意願，而不是要我們承行天主的聖意，我們應做的是求天主聖神光照我們，使我們認識天主的聖

意而校正我們的錯誤想法、錯誤行為。在看守所中，先知依撒意亞的一句話反覆出現在我的心中。上主說：「我的思念不是你們的思念，你們的行徑也不是我的行徑。」(依 55：8) 我們當時的思想，至少潛意識的想法和行徑的大前提：等待美、蔣復辟，對抗共產黨政府，爭取時間。天主不是這樣想的，天主的計劃是宏觀的，天主要淨化我們，使我們遭受困難，使我們悔改，天主通過共產黨實行祂的計劃，天主要我們一心歸向祂，依賴祂，不依賴塵世間的政權或富貴權威。

第二，若望福音記載了耶穌所講的善牧比喻，我們應實行。耶穌說：「我是善牧，善牧為自己的羊群捨掉自己的生命；雇傭工不是牧人，羊不是他自己的，他見狼來了，就拋棄羊而逃走了。」善牧要保護羊群，準備犧牲自己的生命，決不可只顧自己的生命，善牧不能躲在羊後面，讓羊去衝頭陣。龔品梅躲在龔品梅後面，我們躲在教徒尤其青年後面，讓他們充當先鋒，危險一來只想自己逃命。這難道是善牧嗎？我們不能做雇傭工，一有危險就跑，跑到我們以為安全的地帶，繼續鼓吹處於危險的羊群反共。我們要為教友設身處地，事事處處保護屬下。

第三，在共產黨政府之下，決不可搞秘密活動和地下組織。什麼事都瞞不過共產黨政府，共產黨在國共鬥爭時擅長搞地下活動。我們想搞，他在暗中笑。我們今後一切行動必須透明、光明正大，才可長久，切不可自作聰明，害己害人。

第四，不能過高估計自己，過低估計他人，更不可低估政府。龔品梅以為有群眾，以為有國際後台，政府不會抓他，他錯了(以後朱洪聲也犯這個錯誤)。匈牙利明曾蒂樞機在國際和國內威望那麼高，共產黨照樣逮捕他，保祿宗徒說過：「至於我，絕對不誇耀別的，我只誇耀我們的主耶穌的十字架。」(迦 6：14，但我絕不以別的誇口，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我們依靠的是十字架。

第五，不應認為主觀願望是好的，從而忽視並原諒客觀造成的損害。我們的言行尤其領導的言行，一句話、一個指示可以造成不可彌補的危害，領導應當對之負責。我們往往說主觀上是好的且加以肯定。我們彼此之間息息相關，我們做出決定之前必須考慮其效果或後果。主觀客觀不可分割。

第六，在看守所，預審員隻字不提教義教規，專追問反共的言論和違反政府發起的運動的行動，扣上的只是違法亂紀的帽子，神職人員必須提高認識不做違法的事。

第七，逮捕龔品梅和我們時，政府把所有接近我們、跟我們走的人一起逮捕，稱之為龔品梅集團的骨幹分子，一扣上「分子」字樣，這頂帽子伴隨你終生，而且牽累人們，使許多人失學、失業、家破人亡。決不能憑個人匹夫之勇，魯莽行事，地位越高，越要謹慎小心。

以上七點我牢記在心頭，因為這是從慘痛的教訓中得來的，出獄後我以此作為行動的準則。個人犯錯誤，勢必導致許多人的痛苦，決不可再犯類似的錯誤了。

上海監獄 (1960-1962)

判刑後我就被押解到提籃橋監獄，我關在看守所四年九個月，關在提籃橋二年七個月，兩者區別不太大。被關著的都屬犯人，沒有姓名，只有番號，待遇基本相同，但在看守所每間囚室都有木門，上面有一個小洞，讓管理員監視我們用，另有一個小窗口，由外面打開，塞進飯盒，以及每天發一大瓷缸水用以洗臉，另發一小瓷缸水作為飲用。囚室有大有小，小的獨處，大的可容三十來人。室與室之間彼此不能互相看見，深怕串供，在提籃橋一律小室，只有鐵柵欄。提籃橋是遠東最大的監獄，共有八個大樓，即八個監。一號監是重刑犯監，一般判刑十八年以上的犯人，主要是政治犯，解放後稱為反革命犯。第二號監為輕刑監，刑期較短的犯人關押在內。有一個監專關押婦女犯，有一個監收容將發配到外地勞動的犯人。有一個監為醫院，收容病犯。解放前，八個監分別以禮、義、廉、恥、孝、悌、忠、信為名。

每棟樓很大，內有五層，中間空，四周為鴿籠式的小室，室外為走廊，每室沒有窗，所謂的門由鐵柵欄構成，獄警在外巡視，一覽無遺。在提籃橋，我有時一人一室，有時兩人，有時五人，室內沒有床、沒有桌、沒有凳，晚上躺在地上（有時有木地板，有時就躺在水泥地上），白天蹲著或坐在地上，或扒在鐵柵欄上望著對面小室內的同犯。回到上海後友人問我鐵窗之味如何，我回答說，未嘗到鐵窗，但嘗到了鐵柵欄之味。

到了提籃橋監獄，拍照，按手印，給我一個新的番號，送到一號監4樓。一個小室內已有一名老頭，姓施，1957年就已被捕，主要罪名是曾拜杜月笙為師傅。拜杜時，向杜交500銀元，杜笑納後問他有什麼要求，他說想在中國銀行工作，不久中國銀行收他，派他為寧波中國銀行經理。施說：「抗戰勝利後，杜走陸路從重慶回上海，一路收徒弟，每

一徒弟奉獻500元，收入可觀呀！」施有一個女兒唱京戲花旦，報上有名，他對此自豪。他在自學俄文，說可以教我，我反正沒有事，就跟他一塊兒學。對我來說俄文不難，它脫胎於希臘文，又與法文相似，18、19世紀沙俄受法國影響大，貴族在宮廷內以講法語為榮，吸收了許多法國詞彙，由於字母不同，看上去是俄文，一發音卻是法文，此類詞有幾千個，對我來說不必去記了，過了兩個月，我就反過來教他俄文了。我寫信給榮家，她送來了俄文版蕭洛霍夫(Mikhail Sholokhov)的《靜靜的頓河》以及托爾斯泰的小說，我都能看懂並以此消遣。文化大革命期間不准看外文，不用就忘，我的外文是學得容易，忘得也快。

一號監的監長姓邵，手下有姓齊的，兩人都是河北人，另有姓周的、姓陸的幾個警察，統稱為主管，管著我的姓齊，河北人，為人苛刻得很，姓陸的和姓周的態度很好，他們兩人掌握政策較好。

龔品梅安排在底樓，有勞監犯(即打雜的犯人，可跑上跑下勞動)告訴我龔一個人住兩個監室，一個晚上睡覺，一個白天用，有桌子椅子，伙食特殊，每頓有葷菜。

管教看我和施兩個人太友好，就把我調開，編入另一個組，加強政治學習。記得組員有：杜滄白(托派頭子)、倪柝生(基督教反革命集團頭子)、陳某某(陳璧君的侄子，當過偽行政院的秘書長和廣東省偽省會長)、章克(汪偽宣傳部副部長)、譚伯魯(父親是汪精衛連襟，即他的母親和陳望君是姊妹)，還有一個汪偽時期的糧食部長名顧寶衡，由於對日本人搜刮大米有些不滿，日本人下令把他抓起來，他是犯人中資格最老的(他是清朝狀元張謇的女婿)。個個經歷豐富，能說會道，曾風雲一時，現在都是階下囚。給我印象最深的得算章克，他原是基督徒，祖母是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在杭州作牧師時家中的保姆，司徒調往北平當燕京大學校長時，因祖母請求把章克帶去，半工半讀在燕京上學，後來加入共產黨認識了宋慶齡，作為宋慶齡的秘書之一。國民黨北伐前夕，他跟宋到了廣州，北伐軍打到武漢，他跟宋到武漢。蔣介石在南昌開始清共，要把蘇聯顧問鮑羅廷等軟禁起來，宋慶齡和鮑羅廷得知情報後偷偷離開武漢，不乘火車而乘汽車，借道河南往北走。路過馮玉祥將軍的管轄地，馮將軍要求蘇聯顧問鮑羅廷答應給他兩萬支槍才放行。鮑說會轉告斯大林，接著不告而別，急急趕路，再經河北、山西、蒙古到蘇聯。宋離開蘇聯去歐洲，他求宋向蔣介石說情，討一個官做，宋立即沉下臉來，說，「你走開！我不願再見你。」他就向宋認錯，並跟

宋到德國，以後離開宋就打道去了美國，回國後投靠了國民黨，擔當當時外交部部長陳友仁的秘書。陳是牙買加人不會中文，每次開會都必須帶秘書作他的翻譯，章克從而認識了國民黨中包括汪精衛在內的許多要員。他跟陳反蔣並去了福建，福建政府失敗後他去了香港，抗戰爆發後宋慶齡移居香港，他又去找宋，在宋身邊工作，同時領了軍統的津貼把宋的情況匯報給軍統。太平洋戰爭爆發，蔣介石派飛機把宋接到重慶，陳友仁和他搭不上飛機，留在香港，日本人把陳友仁和他弄到上海，要陳幫汪精衛，陳堅決拒絕，章克卻投奔了汪，當上汪偽政府的宣傳部副部長。抗戰末期，他見日寇快完蛋，就聯繫上蘇北的新四軍，向新四軍送情報。日本投降後蔣抓漢奸，把他關在牢內，褚民誼、林伯生等漢奸被槍斃，他妻子就去找司徒雷登（當時已是美駐蔣大使），哭求司徒，司徒請鄭介民（接替戴笠的軍統頭子）吃飯，飯後托他寬大處理章，鄭授意法院，說他抗戰末期做了些有利於抗日的工作，從寬發落判處徒刑三年，一年後提前釋放。解放後人民政府知道他和司徒雷登的關係，在司徒雷登返美後給他美金，派他去美國將司徒在美的活動匯報政府。他拿了美金在香港花天酒地過日子，花完了錢回到上海，政府安排他在政法大學教書，他認為他為新四軍立過功，這個待遇太低，常發牢騷，因而被捕判刑。

杜滄白青年時加入共產黨，黨派他去蘇聯學習，回國後搞工人運動。在蘇聯時加入托派被開除出共產黨，他一人奮鬥，奔走於李宗仁、白崇禧（桂系）、馮玉祥（西北軍）、李濟深（福建人民政府）門下，拿了軍閥的錢，想搞倒蔣運動未成。解放後以托派頭子的罪行被捕，判無期。他和陳伯達很熟並有來往，在獄中從來不揭發陳，怕打擊報復，待陳伯達出事，他就揭發立了功，改判提前釋放回上海，得到很好的安排。

在上海提籃橋監獄，我呆了兩年半，有一個時期每天要立正站著恭聽齊主管訓話半小時到一個小時，聽他有時胡吹，有時狠批階下囚，看他得意的神態，無人敢出聲。我自己就內心背誦聖經，不知其他同犯在想什麼，日子一天一天這樣過去，一個時期我參加京劇組學習，其中一個姓吳的犯人不斷唱：「過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比滾油煎。」這是京戲《文昭關》寫戰國時期伍子胥等候過關時的詞兒，卻也表達了很多人的心境。

秦城監獄的外文翻譯(1963-1967)

1963年初，我被移押送到北京秦城監獄。一天早上，主管開了我的小室對我說：「拿著你的全部東西跟我來。」我的東西就是一卷被子、一些舊衣物和幾本書(榮德先給我送進來的書)。進入一室，見已有六個人坐在地上，姓吳的警官和三名全副武裝的年輕警察領我們上了一輛麵包車，車上有幾個大木箱，據說裝的都是我們的材料，過了兩道鐵門，車子駛出監獄，開往火車站，登上火車，進入一個車廂，讓我們七個人坐在靠廁所的幾排座位上，他們四人有說有笑，我們七個人彼此相望，噤若寒蟬，絕不出聲。上廁所時，一名警察跟著，廁所門不許關，他看著你。中途聽他們說，要到濟南玩，果真，到了濟南站押我們下車，把我們寄在濟南監獄中，三天後吳警官等一行把我們從監獄中提出，押上火車繼續北上。進京後，下火車上了一輛麵包車，駛出市區向昌平縣馳去，再往北走了兩個小時左右，車子戛然停止，已到了目的地，後來知道這兒就是全國最重要的監獄，關押重要罪犯和嫌疑犯，比如文革中的重要「走資派」，以及後來的林彪集團分子和「四人幫」等。稍待片刻，大鐵門開了，車子駛入院內約百餘米，又經過一道大鐵門，院內東西各兩幢大樓，各有圍牆隔開，車停在西面那幢樓的大門口，讓我們下車，樓內有一個警官等著我們，後來知道他姓馬，30來歲，負責翻譯組。

我們七人，其中兩人我認識，曾在同一組內學習，即上述的杜滄白與章克，另外四人，後來知道一位姓高，蘇州人，原是軍統特務。一位姓張，名蔭桐，原是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上面寫過)。另一位名叫方煥如，早年加入共產黨，黨派他去蘇聯學習，畢業後組織派他去東北領導共產黨，他到達東北，見到國民黨實力強盛，就主動向國民黨投降，徹底交代問題，國民黨任命他為上海CC派頭子吳醒亞的機要秘書，擁有權力，他後來說：「張學良每年春節還送我500元，請我笑納。」七七

事變，上海淪陷後，CC派頭子令他留在上海做情報工作，汪精衛投降日本後，他投靠汪逆，被委任為杭嘉湖專員，抗戰勝利後，蔣介石抓漢奸，他惶惶不可終日，把歷年來搜刮的民脂民膏裝在兩個皮箱內，寄存在他的最好的朋友家中，他被捕判了輕刑，出獄後找朋友，想取回他的金銀財寶，朋友對他說：「已被軍統抄走。」他明知是朋友黑心吞掉了，也只得默認。解放後再次被捕，判刑二十年，他精通中、俄、英文，知識淵博，在翻譯組積極工作，學習時很少發言，不揭發人，平時謙恭溫良。他有兩個女兒分配在北京鋼鐵學院當講師，已與他劃清界限，方病死後，監獄通知她們，她們也不來領屍體。另一個是不到30歲的青年，名叫章民泰，他原是楊樹浦華東電力專科學校講師，他一天晚上回宿舍時見到一個正在哭泣的小女孩，他問她為什麼深夜在這兒哭泣還回家，她回說，後母打她，章要領她回家，她堅決不讓。章把她帶回宿舍，第二天早上送她去學校，留下自己的姓名和地址。第三天警察來抓他，說他強姦幼女，是小女孩的後母告的，他否認，請醫院鑒定，結果證明該女孩處女膜未破，但他仍以猥褻幼女罪判刑二十年。他有一個未婚妻，她非常氣憤，和他解除婚約。章每次開會時總說自己冤枉，要求上訴；每次上訴，每次駁回。他又說自己愛共產黨，將來要爭取入黨；他工作負責，勞動賣力，先向我學習德文，進步很快，他又向我學習法文，不久他也能翻譯法文了。「四人幫」垮台後，他被宣告無罪釋放，仍回到電力學校工作。我1982年回上海後，他來找我請我吃飯，並說已入黨又升為系主任，與一名姓關的教師結了婚，過著幸福的生活。後患癌症去世。

馬管理員安排我們住在樓上，四人一間，每室內有床、抽水馬桶，樓下是工作室，有桌子、椅子，院子內可自由散步，我們和戰犯關在一個院內，平時不能和他們交談。

翻譯組的人員除了幾人從戰犯中轉來，大都是從全國各省的監獄押來的。天津來的有刁培樹，基督徒，他的牧師送他去英國留學，回國後在學校內教英文。東北來的有王鐵城、王鐵梅，通日語，日寇佔領東北時，王鐵梅曾是日軍的翻譯官。武漢來的有熊壽農(日語)、張知田，他聲稱自己是留美歸國的，後來知道他曾是國民黨派往美國培訓的空軍人員，日本投降後終止學習回國，事實證明他不能翻譯，只能做抄寫工。廣州來的有姓林的，自說精通英語，他翻譯的都不能用，也只能做抄寫

工。我們共24人，分日文、俄文、英文、法德文四組，我分在法德文組內。

有幾名從已關押在秦城的戰犯中調來，譯俄文的有孫靜工，他曾是共產黨員，王明手下的大將，專搞青年工作，所以取名為靜工，他被捕後叛黨，得蔣介石賞識，任命他為財政部的司長。另一人姓朱，我忘記他的名字，是王明的同鄉，做到當時共產黨的政治局委員，被捕後就在押解的汽車上出賣了共產黨的秘密。德文組內有兩名戰犯，一位姓劉，原是國民黨蘭州市和廈門市的警察局長，他的德文相當好。全國解放後他惶惶不可終日，去算命，在看了他的八字後，算命先生恭喜他說：「你的命好，下半生不怕風、不怕雨、不憂吃、不憂穿。」誰知兩個月後他被捕了，一想，在戰犯監獄內的確不會風吹雨淋，也不必為衣食住行操心了。另一個人姓吳，曾是國民黨陸軍大學的德文翻譯，他的譯文我校對過，發現翻譯水平很低，我對他說：「憑你這個水平，怎能當翻譯？」他回答說：「台上德國教官上課，他們不懂中文，台下國民黨軍官聽不懂德文課，由我一個人翻譯，不難。」

我們這批人每天24小時在一起生活（如果是一家人，白天有上班、上學的，一般也只有晚上在一起），達十二年之久，真是難得！

人民政府規定，國民黨文職廳長以上，武官少將以上作戰犯，分別在北京、撫順、山東禹城、四川重慶改造，反動職位高的在北京。原則上我們都以番號相稱，但由於一起學習，一起勞動，一起做自我檢討，彼此有所了解。戰犯中有兵團司令、許多軍長，也有軍統戴笠手下八大處的處長等，這就是國民黨統治機構的半個班子。唉，可憐的舊中國！

關押的戰犯中有的有錢，有的無錢，情況是這樣的：遼沈戰役、平津戰役、淮海戰役，俘虜了大批國民黨軍官和文官，他們四散逃走時大抵已化裝成農民、工人、商人，袋內帶有黃金、美鈔、珍寶，逃跑未成被抓後，聚集在廣場上，解放軍清點他們，一一登記。有的戰犯心想，身上大批錢財就是罪證，他們坐在地上聽訓話時，大多數偷偷地把袋中的黃金、美鈔掏出來，放在地上，少數人捨不得，沒有拋，解放軍搜身時，取出登記，並不沒收，說是代為保管。關押期間，戰犯可托管理員代購東西，用以支付，偷偷拋出去的人後悔不已。

戰犯中有軍官，有特務，一接觸就感到他們身上的烙印。軍統、中統特務在外面是特務，在牢內還想當特務。一個姓高的，一個姓張的，我們在休息時，在院內散步時，只要有兩個人在一起，他們就會湊上來

活躍，很有成就，後來回國訪問，國家領導人接見了他，他通知人說要看我，我那時在國外，未見到。順便說一聲，在監獄內，同犯知道我的身份後都叫我「洋和尚」。

翻譯組在秦城監獄內，秦城直屬公安部預審局，原則上全國性的重要罪犯在未判刑前都關押在這兒。上面我說過，監獄內有四幢大樓（後又建了兩幢），除了我們的一幢外，都是單人室，我們是偶爾被叫去打掃衛生時知道的。每室有抽水馬桶，但放水開關設在外邊，每次用後得向看守報告放水。

也看到有幾個囚室內四周是橡皮做的壁與門，防止犯人自殺，犯人再大聲吵鬧，外面也聽不到。一次，在一個儲藏室裡打掃衛生，發現裡面有寫著潘漢年和他妻子董慧名字的箱子，也看見寫有丁玲名字的箱子，可見他們也曾關在秦城。一次被叫到獄外打掃一排平房，知道秦城監獄未建成前，饒漱石曾關在那裡。

「文革」後把戰犯和翻譯組全體人員（只留少數幾個最重要的戰犯和叛徒）轉移到東北撫順戰犯管理所，秦城專關押劉少奇、鄧小平以下的所謂大「走資派」。上世紀80年代天主教開大會，政府宴請時我被安排在主桌上，席上有吳學謙、習仲勳、閻明復等，我才知道他們也曾被關押在秦城。一次凌雲部長告訴我，秦城一號由他負責建造，誰知不久他自己就被關了進去。一次我看報紙見到一篇題為《紀念我的好爸爸》的文章，寫得親切動人，是50年代上海市公安局局長許建國的女兒所寫，文章裡提到許也死在秦城監獄。林彪栽死在蒙古溫都爾汗後，他的大將黃永勝、邱會作、吳法憲、李作鵬等人也都關押在秦城。「四人幫」垮台後，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也關押在此。這是後話了。

我們每天八小時做翻譯工作，其餘時間自由支配，我向王鐵梅學習日文，單家祥、章民泰分別向我學習德文和法文。單家祥是河南人，分配在東北工作，1957年響應政府號召幫助黨整風時，向領導提了一些意見，被劃成右派，妻子與他離婚，想不通，牢騷滿腹，結果右派升級，成為現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勞改。我喜歡一個人在院子裡散步，做神業功夫、默想、背誦彌撒經、念玫瑰經，日子過得很快。

1965年上半年孫部長和馬管理員與我們談話時，語氣更客氣，說的都是鼓勵的話，肯定我們翻譯水平高，自覺改造態度好，又說我們前途光明，不必悲觀等。

一次把戰犯和我們翻譯組成員集合在禮堂，孫部長等領導陪同一位穿著藏青中山裝的老人進來，經介紹知道此人是清朝末代皇帝偽滿洲國傀儡皇帝溥儀，抗日勝利後，他被蘇聯紅軍逮捕關在蘇聯，後解送回國，和他的小朝廷一起關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後蒙特赦。他來向我們講述自己接受改造的經過，並勸勉我們好好改造，爭取新生。我記得他說自己被灌輸的思想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個觀點牢牢深入他心中，導致他做皇帝之夢。

接著管理所由公安部預審局領導組織戰犯參觀首都的社會主義建設，我們翻譯組也沾光，和戰犯一起參觀了歷史博物館、軍事博物館、民族文化宮、北京站、重型機械廠、清華大學以及人民大會堂等，所到之處，單位領導接見，詳細介紹，盛情宴請，總之，把我們當作貴賓招待。參觀人民大會堂的大禮堂時，我們都感到華麗莊嚴，歎為觀止。我當時絕對沒有想到自己後來居然也坐在主席台上。十天的參觀結束，馬管理員組織我們談感想，又示意我們寫一封感謝信，翻譯組英文譯員張嘯虎(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起草寫了一篇，我們討論時，他不同意修改他的稿子，並說一個字也不能改，十分傲氣。一個戰犯偷偷說，知識分子尾巴又翹起來了。

五一節、國慶日，戰犯和我們乘車去天安門旁邊的公安部，接待我們登上大樓頂，看遊行。這時戰犯們心中明白，可能不久就會特赦他們了。

誰知風雲突變，毛澤東親自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報上刊登的消息是打倒走資派，打倒在毛身邊的赫魯曉夫。貼出了第一張革命的大字報，毛表態堅決支持紅衛兵的革命行動，又說：「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我們翻譯組停止了翻譯，管理員帶我們提了油漆罐，去院內到處寫：「堅決擁護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偉大的統帥」的大標語。隔了一段時間，我們集中在臥室的樓層，不准下樓，更不准出院子，命令我們把所有的書籍封起來，只准留一本發的《毛主席語錄》。也不開會，管理員也不來了，只讓我們背誦「紅寶書」。牆上有一張地圖未被摘走，我就整天看地圖，背地名。

11月中旬一天晚飯後，天已黑，管理員忽然來了，通知我們立刻收拾自己的東西，馬上要轉移，我們下樓看見戰犯們已經集合在門口，外面停著幾部大麵包車，管理員叫我們把行李放在一輛車上，人上另一輛車。車開出大門，可我們不知去何處，一個小時後車子開進一個小火車

站。站內都是荷槍實彈的解放軍，已停有一輛列車，內杳無一人。我們魚貫進入車廂，車廂內的玻璃窗有木板釘住，燈光微弱，我們坐定後，車廂門關上，門前、門後都有士兵把守，我們每人端坐不動，噤若寒蟬，車廂內無人敢出聲。列車啟動、加速，一路上沒有停靠任何車站，是專列。第二天上午，車子逐漸減速，戛然停止。下車後一見也是一個小站，月台上都是全副武裝的士兵。又上麵包車，約半小時後，車進入一個院子，都是平房，在一個大廳前停下。我們按次分行站立，聽一名負責人訓話，我們這才知道是撫順戰犯管理所，接著宣布紀律，翻譯組與戰犯之間不准交談，不准講一句外語，一經查出，必將嚴懲。

班長，水平不高，訓話時說：「你們血債累累，我打報告上去槍斃你們幾個！」中央原規定，對戰犯優待不能搜身，不能打罵，他們也搜查行李，不久軍隊調走，請回金所長原班人馬，金後來調到北京任公安大學校長。

我們才押到撫順，代所長嚴厲訓話後，安排床位，分成三組，上下午學習檢討自己，揭發他人，以贖罪立功，爭取寬大。有人揭發，不准為自己辯護，也不可解釋。同獄強調我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梵蒂岡的奴才、死不悔改等等。批我最兇的是張知田，平日他不斷地打小報告，在北京他的翻譯全是廢品，不能用，不知怎的他在撫順被上了腳鐐手銬，作為反動典型。

「文革」中期，不再向我們講形勢大好時，准許我們勞動了，當然不是翻譯，而是體力勞動，讓我們去農場，開始步行去，解放軍荷槍實彈還上了刺刀，路上觀眾都說：「押去槍斃了。」戰犯是1948、1949年戰場上被俘的將軍，都已年過六十，走不動，隊伍也無法整齊，後用卡車把我們運去。農活有挑水、送糞、播種、鋤草、挖土、收割等，我生平第一次開始挑水，兩桶水一根扁擔，壓得我肩膀紅腫，疼痛異常，只好用雙手把扁擔抬起，走路搖搖晃晃，水溢了出來，到目的地，水已不滿一桶，過了兩個月，不紅腫了，也不怕挑了。送糞情況是這樣的，嚴冬臘月零下20多度，把屋外化糞池打開，把糞水舀出來，澆在場地上，沉澱在底層的大糞掏出，堆在場地上。我們中間最積極的是章民泰，他跳下化糞池掏，待結成冰後，我們用鎬把冰刨開，一塊又一塊地抱著裝在卡車上，運往農場，卸下再抱放在田間，待它溶化作為肥料。糞很臭，手捧後，用肥皂洗好幾次還去不掉臭味。

開始鋤草對我是件難事，我活了50多歲，分不清苗與草，深怕把苗鋤去而留下草，勞動時我的進度最慢，解放軍就訓我說，這個臭老九，寄生蟲，分不清苗和草，又說我磨洋工偷懶。犯人無權申辯，只能低頭認罪。犯人中有一個勞動大組長，名叫孫煥彩，國民黨師長，他分配工作時，專派我輕活，我很感激他。他被特赦後安排在北京與尚傳道（原國民黨吉林省民政廳長兼財政廳長）住一個樓。我釋放後，到北京時去他家謝謝他對我的照顧，他留我吃了一頓飯。

開春後播種時，我和另外幾個人負責挑糞送往山上，我逐漸鍛煉後能挑一百斤上山。卡車拉糧食來時，我們去卸下背到廚房，開始我只

能扛一袋麵粉，後增加到兩袋，最後我能扛三袋，也能扛一袋大米，重180斤（只能在地面上走，上台階就不行，額上冒汗，腿也爬不上去）。

有時，到遠郊勞改農場的磚瓦廠去拉磚，乘卡車去，零下20度，車一開，西北風吹來，身上的棉衣像紙一樣薄，冷得發抖。一個木架裝磚，兩根繩子用手套進背上，一如今日青少年用的雙肩背包，我最多可背20塊。背到車上，另一人接著碼好，裝滿一車，拉回管理所，卸時用夾子，每次6塊，碼在地上整整齊齊，一塊也不散，不像有些司機和裝卸工把汽車後面升起，一下就卸一地，磚碎很多。

農閒時我被派往小工廠勞動，車間內有二十多台機器，為所外大工廠加工，我啥也不會做，當一個搬運工，為幾個車床送加工的原件，後來叫我管一個小衝床，容易操作。

戰犯黃維留學德國時，認為可以造出一個永動機，他向所當局申請，自己監做。所領導為了滿足他的要求，更為了爭取他，居然答應，費了幾個月的時間，浪費了不少材料，製造出一堆廢品永動機，不用電力只靠機械本身就可永動不止，是不科學的，最後黃維服輸。

在園裡勞動，主要修剪果樹。我這個人孤陋寡聞，在撫順才知道冬天葡萄樹得埋在土下，否則會凍死，才知道果樹吃葷的，凡有魚的內臟以及死貓死狗都埋在樹根旁，第二年結果遠遠超出其他的樹，收成後我們能分到一部分。

戰犯管理所的犯人有一個特點：「老」，都是1948年底和1949初在戰場上被俘的將官和廳長級的國民黨人，被俘時都已40歲以上，服刑時間長。1948年到我認識他們在押已將近二十年，他們都未判刑，只等特赦。戰犯們資格老，學習時都誇誇其談，政治內容一套一套，能說會道的更得所管理員信任。我們的大組長叫蔡省三，極能幹，原是蔣經國手下的紅人。另一個姓段的也進步得快，原本是軍統高官，特赦時問他們的意願，他們和其他幾個立即表示願去台灣。當然台灣拒收，認為他們已被共產黨改造過來，派去充當特務的，蔡留香港，段去美國還寫書罵共產黨。我們這批翻譯犯也年紀大，只有一個年輕的章民泰，上面已講述。

1971年10月管理所禮堂內掛的大小「忠」字全部取走，我很納悶，接著告訴我們林彪副統帥叛國出逃摔死在蒙古。不久軍人們也撤走，金所長回來，氣氛緩和，伙食也逐步改善，我還清楚地記得，早上吃早飯時，廚房拿出一罈臭豆腐，打開臭氣四散，大家滿臉笑容的情景。隔兩

天晚餐時上了幾年未見的麵條，我的同桌王金漢猴急地把一大碗麵一口氣吞下，接著又吞了一碗，正想拿第三碗時嘔吐起來，口中吐出麵條，原來他不嚼，囫圇吞棗，仍是兩滿碗，只是帶了血絲，肯定傷了胃。我們的伙食費由每人每月20元減到8元，現又逐漸增加恢復原標準，我們吃的細糧多了，每月70%細糧，30%粗糧，而市民70%粗糧，30%細糧。粗糧是小米、高粱、玉米，主要用來熬粥。看電影也多了，每月至少一次，有時兩次：《地道戰》、《地雷戰》、《鐵道游擊隊》、《南征北戰》、《小兵張嘎》、《紅日》、《紅岩》、《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紅色娘子軍》、《白毛女》、《紅燈記》等，也有《喬太守亂點鴛鴦譜》、黃梅戲的《天仙配》。外國電影《佐羅》、《追捕》、《冷酷的心》等等。又組織外出參觀，每人發一身新衣服——中山裝。我們參觀了有名的撫順露天煤礦，礦已挖得很深，起重機廠、鏟車廠、石油六廠（從油岩石煉石油的廠），我們參觀了雷鋒生前所在的營地，又去瀋陽參觀工業展覽會、工業大學、皇太極未入關前的故宮等。行人看見我們一群老人，穿著新的衣服，都說我們是敬老院的老人。管理所又找戰犯家屬來撫順探親，熱誠招待。戰犯們說：「看來，離特赦的日子不遠了。」事實上是1975年特赦，所有戰犯全部釋放，一個不留。

接著圖書室也開放了，史無前例、轟轟烈烈的「文革」開始後，除了「紅寶書」，什麼書也不能看。開放圖書室對我來說確實是個喜訊，我把《魯迅全集》看了兩遍，已出版的馬恩全集用心閱讀。毛澤東說「先破後立」，有其一定的道理。我看了《魯迅全集》，當然欣賞他，但不佩服他，我認為他對中國文學的貢獻不及胡適。魯迅衝鋒陷陣，但只破不立。讀馬恩全集時，我腦中仍有希臘的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德國的康德、黑格爾，中國的孔子、老子、莊子的學說。我常常以這些思想家來與馬克思比較，我認為馬的經濟學說，尤其資本論、剩餘價值論確實是個發明，但稱之為唯一真理，放之四海而皆準，我不能接受，我腦中就會出現二千三百年前莊子《天下篇》開頭的一句話：「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用白話文說，天下研究學術的人極多，都把自己的學問看作唯一真理，認為沒有什麼可以增加上去的了。我讀近代人的著作，心中老想：「古已有之。」可見欲「立」必須先「破」，但「破」談何容易？用矛來破盾，矛必須十分鋒利，否則刺到盾，破不了，反而會反彈過來。「五四運動」口號之一「打倒孔家店」，孔子的學說破了沒有？破立應同時進行，只破不立，將造成真空，製造混亂，破後只

有廢墟，而所立的必須勝過破的，否則有破而無立，損失大了。我想，我是想立基督的，也得破吧，利瑪竇來華想立基督主義，他不破孔，知道孔子破不了，他就用孔子的學說，不說破孔只說補孔，孔子說過：「未能事人，焉能事天。」* 利氏就說，事人重要，事天也重要，孔子不說事天，我來說吧。利氏就用孔來立基督，以基督來補孔。

戰犯管理所花了二十五年的人力、物力、精力改造戰犯，蔡省三等戰犯學習有成績，得到所領導讚揚，他們表面上能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但他們心中信的不是馬列主義而是三民主義，崇拜的不是毛澤東而是蔣經國，一旦釋放，就想去台灣投奔蔣，破與立何其難呀！

戰犯全部釋放後，撫順戰犯管理所改為一個小博物館，展覽所內日本被俘軍人、偽滿洲的高級官員以及國民黨戰犯接受改造的照片，我於上世紀90年代應該館邀請回去參觀，受到熱誠招待。

* 編按：《論語》原文：「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正義》：「子路問事鬼神者，對則天曰神，人曰鬼，散則雖人亦曰神，故下文獨以鬼答之。」

重返秦城恢復翻譯組 (1973-1975)

1973年鄧小平復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總參謀長，大膽地整頓政府部門，初見成效。夏天，北京秦城監獄派了一位處長來到撫順，說將恢復翻譯組，要把我們接回去，不是全部，沒有真正外文水平的留撫順，如張知田、刁培樹、熊壽農和林某某。這次讓我們坐臥鋪，回京的路上還給我們買西瓜，態度極好。我們回到了秦城監獄。

進入秦城監獄大門後，立即發現有所變化，監獄由原來的四幢樓變成了六幢樓。說明犯人多了，原有的牢房不夠用。我們仍關押在老的院子內，但孫處長和馬管理員不見了，管教人員換了新人，他們很客氣，我們又開始翻譯了。

一次管理員領我們到另一個院內，看到許多果樹，尤其桃樹，桃子已紅熟，管理員對我們說：「你們盡可摘下來吃。」我吃了幾個覺得很甜，但不敢多吃，方煥如老頭一口氣吃了二十來個，半夜大聲喊叫肚子疼得厲害，管理員把他送到北京復興醫院搶救。隔了兩天，管理員告訴我們方已死。方以前犯過腸梗阻，動過手術切去一段腸，用線縫接的。一次吃了那麼多桃子，把腸子撐裂，他離刑滿期只有一年，就因此而一命嗚呼，惜哉。監獄方面通知他在北京鋼鐵學院的兩個女兒，她們拒絕來收屍。

我1955年9月8日被捕，判刑十八年，刑滿後得戴反革命分子帽子九年，1973年9月8日刑滿。管理人員把我忘了，同犯劉春亨打了報告給管教人員，問為什麼不準時釋放我。管教員連忙辦手續，我於9月20日釋放，他告訴我說：「你應該向人說是9月8日釋放的。」他把我送出監獄，和幾個已刑滿釋放就業的——章克、張嘯虎、單家祥、王鐵梅放在一起，並宣布我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九年，不是公民，和他們有區別，同時給了我50元，說這是我的月工資。在當時50元一個月不算太

低。勞改、勞教、就業是三類分子，都屬專政對象，而戴帽子更須受群眾監督，不准我亂說亂動。

我們可以到幹部食堂用膳，蔬菜3分一碟，葷菜1毛8分一碟，一個月花不了20元。這兒的幹部都是監獄內的管理員和他們的家屬，他們除個別人外都與我們保持一定的距離。

離秦城7公里是小湯山，有溫泉，我每星期日去洗一次溫泉浴，每次兩毛，很便宜。去北京得向管理員請假，但不能外宿。榮德先有個外甥女張伯辰，復旦大學生物系畢業，分配在二十五中教書，住在燈市口，我去北京時在她那兒用餐。榮德先兩個女兒一個叫朱兆方，一個叫朱兆榮，她們去北京玩也看了我，我失去自由時，朱兆方7歲，朱兆榮才2歲，她們已長成廿多歲的大姑娘了，再見時我不禁流了淚。張伯辰受榮德先的委託，待我特別好，為我打毛衣、送棉襖，視我如親人，使我感到溫暖。以後我從河南調到河北保定，春節三天假，我就去她家，每次有機會去北京，也必去她家。她家三口人，丈夫端木一，是外科醫生，在天壇醫院工作(他家起名也特殊，大兒子名一，女兒名奇，小兒子名三，很容易記)，兒子名鳴，和她擠在一個小房間內，我去時伯辰就住到別處，讓我和她丈夫兒子住在一起，我十分感激她。

思想更是活躍，更胡思亂想；未離開秦城前，出去打掃衛生，見路面上大字寫著「打倒劉少奇」的標語，也有寫著打倒監獄領導的標語，更感到迷惑。

紅衛兵出現了，打倒封資修，到處奪權，大掃牛鬼蛇神，大破四舊，破壞文物、國寶，大鬧革命，大打出手，到處抓人、整人，一切是大，真是翻天覆地的大變化。凡事走向極端，往往走向其反面，文化大革命成為反文化大革命了？

日日夜夜背誦紅寶書，早上一吹哨，醒後立即奔往操場上向毛主席致敬，晚上睡覺前，必須檢討自己，向毛主席請罪，這一切很像我們的宗教儀式。我想一種新的宗教出世了。但真宗教是自願信的，而人造宗教是用武力強加的。

這使我忽然明白，為什麼古經中梅瑟上西奈山去祈禱祈求上主只四十天，下山發現他的以色列民眾已造了一個金牛向之跪膝朝拜。人類需要一個神，打倒了一個真神就再造一個神，我想我正在見證我國人民的造神過程，幸與不幸，事實作出結論。天主啟示的神要我們由人成神，人造的神，自己是人，怎能使人成神？只能使人變成原始之人。在毛發起造神運動時，我記起老子的話：「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毛澤東去世前給自己三七開的評估，即七分功，三分失。1975年我在新鄉第四大隊一起改造的犯人就說：「文革大革命？從此毛的一世英名付諸東流！」這是普通人的評估，真是高貴者愚，卑賤者明也。

我相信人類一百幾十萬年前由動物進化成人，從獸性到人性到理性，人類不斷在進步，從頭部向下四腳爬行，到直立，向前行走；從茹毛飲血，棲居樹上到形成部落，製造工具，發明創造；從自相殘殺到追求仁愛，到超越人性，追求與「造物者遊」，正在向神性前進。但人也可以挖掘獸性，利用人的獸性煽動嫉妒，鼓吹仇恨，以破壞為樂。也可提倡仁愛、和平、大同。人類進步如海潮，浪退浪進，退一步進兩步，應相信人類會進步，倒退只能是暫時的。但在退的過程中，人們是不幸的。我生也幸，見證中國人民的倒退，見證中國人民的痛苦、遭受的不幸，也為中國人民悲哀。

「文革」期間我對宗教尤其天主教的前途很悲觀，宗教將轉入地下，在共產黨的天羅地網之下，地下也不能持久，將來全中國再也聽不到鐘聲，聽不到木魚聲，宗教將銷聲匿跡。我對自己的前途更悲觀，心想，

像我這樣的人，刑滿未必釋放，釋放後仍由群眾監督，必須牢牢夾緊尾巴勞動，前途可悲。今後的歲月，只能混一天算一天吧。

以上是我十年「文革」時期的思想動態。很悲觀，過分悲觀，後來事實告訴我這種悲觀是錯誤的。

黃色書刊(才改革開放時，外來東西稀奇)，送給幹部，有些幹部高興接受，上級發覺後說他腐蝕幹部，把他收回翻譯組，不准再外出。一對姓沈姓錢的夫婦，他們帶一個兒子，12歲了，早上還要媽媽為他洗臉刷牙。一位姓彭的，帶有妻女。一位姓徐的，一位姓趙的。一位姓謝的，解放前做證券生意，後來深圳開股市，他去那兒賺了幾千萬元，有錢後生活又腐化。王翔原在公安部工作，批鬥右派時，他保持沉默，定他為同情右派，調離公安部，送去青海管勞改分子。認識了上海人沈保義與施耀第，把他們兩人也調來保定，我們總共有24人。我們人到齊後，副監獄長向我們訓話，強調說：「我們就是外行領導內行，我不懂外文，但能領導你們，知識分子不能翹尾巴。」等等。

我們分成日文、俄文、英文、法德文四組，每組有一小組長，我是法德文的小組長，我自己不翻譯，做審核工作，譯出稿件出差錯，審稿者負責。沈保義，上海人，曾是龔品梅的秘書之一，受牽累逮捕判刑勞改，他和朱洪聲神父交往很深，來保定後與朱神父頻頻通訊，朱刑滿釋放後回到家裡，他成為羅馬、香港耶穌會的代表，聯繫國內的神父教友向外請示匯報。沈向朱匯報說，領導信任我，讓我當了組長等等。朱向羅馬匯報，我已叛變，投降共產黨並成為黨員，所以得到重用。香港、羅馬信以為真，認為我是叛徒。香港的耶穌會士勞達一(Ladány，匈牙利籍)在他創辦的《中國分析》和其他報刊上寫了文章詆毀我，影響很大。我的乾媽來中國看我後去羅馬總院，想告訴他們我的真實情況，耶穌會副總會長說：「我們不承認金，他是叛徒。」我出獄後，去國外訪問，耶穌會把我拒之門外，這情況到1993年才改變，使我內心受到極大的創傷。諷刺的是，朱洪聲1981年被捕後在監獄也做翻譯工作，並因賣力工作得到減刑的獎勵，「蒼天在上！」

我們本認為王翔會管理我們，我們想錯了，他平反後回到北京，仍不被重用，公安部派了一個名叫鄒遠的副處長來管理我們，他為人苛刻，一般就業享受醫保，看病、醫藥費全部報銷。鄒遠決定：翻譯組的人每月只能報4元，其餘得自費。翻譯組人員外出過夜必須請假，他身在北京，每十天來保定，向我們做長篇訓話，訓叱我們。鄒遠這個人對其他人也苛刻，他把我們翻譯所得的錢上交作為他的功績。他買了一輛麵包車，他一個人專用，他用後，乘人不備時，在車的輪胎前用粉筆在地上畫了一條線。一次他問司機：「你昨晚用車了嗎？」司機說：「沒有

呀！」他領司機去看車子，說：「車子會自己移動嗎？看這線。」司機無話可說，只得做檢討。

70年代末、80年代初，外文人才奇缺，我也借出去做德文翻譯。冶金部在保定的分公司所屬的航空遙測廠，向德國訂購了一套航空探測地下的儀器，由德國派技術員來安裝。整個保定市沒有一個人懂德語，該站向翻譯公司把我借了去當翻譯。如果國外技術員不來，我們自己安裝儀器肯定不會運轉。技術員把儀器箱打開拿出儀器，把兩個關鍵部件換了位置，1980年沒有手機，保定市不通國際電話，他要向總公司請示，我陪他到北京長安街西單附近的長途電話局去打電話。科學發展快，今日中國的小孩子們都拿著手機，可以邊在馬路上走，邊和遠在美國、歐洲的親友長談。

後來我借到位於保定的河北大學教法語，沈保義則借到河北省博物館整理河北獻縣教區的檔案，上海的教區檔案全部被格壽平銷毀，獻縣的全部保存下來。以後，沈保義和陳仕良被借到滿城直升飛機製造廠，去翻譯從法國進口的黃峰牌直升飛機的說明書。

凡向翻譯公司借譯員，必須向翻譯公司付錢。我們雖不拿一分錢，也很樂於被借，因為人家把我們當作客人招待，受到尊重。不像鄒遠，不把我們當人看。我勞改二十七年，條件最差的單位是保定翻譯公司，省第一監獄的就業藥費全部報銷，而我們翻譯組的人每月只能報4元錢，多的只能自己掏腰包。我當時有糖尿病，血壓較高，用藥多，一個月的藥費遠遠超過4元錢。天無絕人之路，監獄一名女大夫竺開一，富有同情心，原在協和醫院工作，丈夫姓王，原在公安部工作，反右時不開口批鬥人，說他立場有問題，把他調離公安部，發配到河北保定監獄工作，竺大夫也跟到保定。她向我說：「你們是知識分子，怎麼鄒遠對你們如此苛刻，你們條件還不如一般就業的，你用藥多，每月估計需二十來元，你還得吃飯呀！這樣吧，你需要的部分藥，我開我家人的名，由我領了叫人給你送去。」絕處逢生！我十分感謝她，她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竺大夫夫婦兩人都是高級知識分子，由於文化大革命他們的子女都上不了大學，三個人都做了工人，一個兒子做鞋匠，一個兒子當廚子，女兒名叫王靜涵，在膠片廠有害車間當工人。我離開保定後一直和王家有來往，竺大夫夫婦及其女兒曾去上海佘山探望我。我當了政協常委去北京開會時，竺大夫尤其是王靜涵多次去北京看我，她們是我患難時的好友，她們雪中送炭，我終身不會忘記她們。

在保定的河北省第一監獄勞改的還有劉冠東，他是神父，被捕服刑時當木工；周山夫神父，原是醫生，在監獄內為犯人看病，他為我做心電圖，診斷我的左傳道阻滯，囑咐我小心，不能勞累過度。還有徐水的師恩祥神父，再有張家口教區的主教張可興等。他們相繼刑滿恢復自由，周山夫以大夫的身份走街串巷，發現不少天主教徒，既為他們看病又給他們講道。保定教區的主教座堂坐落在市中心最熱鬧的裕華園旁，教堂已開放，但自選自聖的主教王其威早已結婚，政府給他工資每月200元(在當時是很高的待遇)，他不好好傳教，常帶著妻子到處走動，為教友們所不齒，每主日去教堂望彌撒的只有一二十人。周山夫聯繫到姓師的一家，條件較好，住在保定北部的一個大院，房屋也寬敞，周山夫和這家主人商量後把他的家作為一個傳教點。周山夫領我去，見他家的廳裝飾像聖堂，院內已停了一百餘輛自行車，廳內擠滿教友，虔誠地朗誦經文，其中青年很多，我看了很感動，這種情況我已二十多年未見呀。周山夫請我做彌撒，他自己聽神工，彌撒時我熱淚盈眶。隔了幾個月，教宗任命的原保定范學淹主教也刑滿釋放回家，他深受教友們愛戴，來參加彌撒的教友更多，星期六下午加了一台彌撒，仍感到不夠。

一個星期日的下午，我去北關師家見到了范學淹。他很高興，給我看了一張小聖像，背面有拉丁文寫的幾行字。范說，這是羅馬福傳部發給中國教會的秘密指示，其內容為：「任何一位忠於羅馬聖座的中國主教，可以把任何一位忠於羅馬聖座的神父祝聖為主教，該主教在整個中國有管轄權，不必預先請示報批。」我說：「這個權可大了！」范說：「這是在非常時期作出的非常授權。」以後我知道范先後祝聖了周山夫、劉冠東、師恩祥、連新生、陳建章、賈治國(當時還不是神父)等人為主教，這些人又秘密去外省祝聖主教，中國地下教會正式誕生了。然而地下主教都單獨自由活動，沒有統一領導，個別地區有好幾名地下主教去活動。不需要徵求有關方面的意見，也不開會集體商量，各自秘密地祝聖他們認為合格的神父為主教，有些教區突然冒出了兩名或三名主教，造成混亂。這些主教理所當然地秘密祝聖神父，他們並不需要認真學習神學與倫理學或其他學科，更不需要長期考核，他們說，搶時間也。一時中國教會頗為混亂，這是羅馬聖部所始料不及的。

我每星期日下午按時去北關師家聽告解。有時舉行聖祭，有時參與其他神父的彌撒(那時我們都不知道已有梵二會議，也不知道禮儀已改革)，我認識了好多熱心的教友，其中最熟悉的除了主人師家外，還認

識了趙家和宋家。趙先生住在北關橋旁邊，是個打鐵工人，為人耿直、豪爽但脾氣急躁，對他的母親很守孝道，在家中是老人說了算。趙先生的太太姓王，很賢惠，上面孝敬婆婆，下面要教育四個女兒和一個最小的兒子（祖母極溺愛他），還要侍候丈夫，任勞任怨，從無怨言，真是女性中的楷模。大女兒叫建新，非常懂事，下課後出去揀破磚，賣給人家貼補家用，小女兒叫丫丫，中間的一個叫小紅，另一個我忘記名字了。彌撒後他們全家邀我去他們家吃餃子。姓宋的一家，先生是麵粉廠趕大車的，他有七個兒女，二女兒叫翠梅，才高中畢業，當時我在保定河北大學兼教法文，每周兩節課，每次下課後她騎了自行車等在校門口，接我到她家中吃飯，家常便飯但充滿尊敬神父之心，我喜愛這兩家人，迄今沒有忘記他們。

我回上海後仍和他們保持聯繫，宋翠梅和趙建新由於信仰天主教，未能考上大學，今天她們的兒女都已大學畢業，確實可喜。

有朋自遠方來

這期間我收到榮德先寄給我的一本最新德文字典，我翻閱一下，內有我的朋友喬治·馬埃斯特曼的名字，說他是著名的抽象派畫家。我很高興他已出了名，但字典上沒有他的地址，我只知道他是 Solinge 地方人，我就寫了一封信給他，信封上只寫德國 Solinge 市 G. Meistermann 收，他居然收到了，可見他的知名度，其實他已離開故鄉，遷居科隆。但我第二次去信時，信退回說查無此人。其中是否有天主的安排，特意派他們來照顧我，我認為是天主上智的奇妙。一個月後收到了他的回信，他說他們一直懷念我，他又說，曾耐心教我德文的女兒陶納德患了癌症已於 1968 年去世，遺下一男一女兩個小孩已長大。又說他妻子正在埃及，待她回來後準備到中國看我，一個月後他夫人也來了信，說打算跟一個旅行團來中國看我，又過了一個月他們來信說已定了，過兩個星期跟瑞士一個旅行團到北京。我向鄒遠匯報，鄒說：「怎麼回事？好不容易把你的社會關係搞清楚，怎麼冒出德國人來，不准。」我說：「他們是著名人士，專程來看我，不讓看，恐怕不妥吧。」他說應向上級匯報，鄒後來說，公安部政保局副局長劉鈞同意了，但當時保定尚不是開放城市，外國人不能去保定。他說：「你去北京和他們聚三天吧。」我先到北京，鄒遠向我上了一課，詳細交代我應該注意的事項。劉鈞接見我時卻說：「接待外賓，應落落大方、自自然然，不必拘束。說真話，他們了解我們，問你的過去，實話實說，問你國家情況，不要說得太好，說過了頭，人家反而不信，你有民族氣節，我信，你不會把國家事情說得壞，放心！我信你。人家給什麼，客客氣氣收著。」我覺得劉鈞這個人水平很高，很佩服他。

他們到的時候我去機場接他們，整整三十年未見，一旦重逢，歡樂無比。他們緊緊擁抱我說：「多少年來我們一直在打探你的下落，我們

小女兒莫妮加 (Monika) 曾在德國駐香港領事館工作，她也想方設法打探，但都說無人知道你在什麼地方。」他們住在北京飯店，我說：「我只能陪三天。」他們說：「不行，我們不遠萬里專程來看你，你必須全程陪同，你的費用我們已代付了。」我向鄒遠匯報，他轉告劉鈞，劉說：「既來之，就陪之。」我去國際旅行社，請他們給我安排，他們一口拒絕說不能，一路上的機票、車票、旅館房間都已訂好，不能追加。我向畫家夫婦說旅行社說讓我們自己去講，他們兩人和瑞士旅遊公司的領隊和我一起去國際旅行社，接待的人見是外國人來了，就站起來笑臉相迎，說：「這事好辦，我們通知各地旅行社增加一個名額就可以。」

他們帶給我一個打字機、一架收錄兩用機、一塊夠做一身西裝的高級衣料、一個古老的十字架、一本德文拉丁文對照的彌撒經本，他們想得很周到，我欣然收下。在北京時，張伯辰在北京烤鴨店宴請了他們，他們很喜歡她，以後來信也總是提起「毛毛」(伯辰的小名)。第四日我就跟他們的團出發，先坐火車到南京，坐的是臥鋪，我過去坐火車總是買硬座的。在南京玩了兩天又去無錫、蘇州，到了上海，住在上海大廈。當時這類賓館只接待外賓，我在走廊裡，一個服務員很不客氣地對我說：「你在這兒幹嘛？快快離開！這兒是你待的地方嗎？」我把房間鑰匙給他看了，他才不出聲。友誼商店也不讓中國人進去，我想，我小時上海外灘公園門口掛了牌子「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我們感到奇恥大辱，怎麼解放多年，又回到外國人統治的情況呢？我大惑不解。我離開上海二十多年，走在大街上感到上海的面貌一點兒也沒有變，沒有什麼新的建築。在上海時，榮德先在靜安賓館宴請了他們，他們特別喜歡朱兆慶，說她就是他們想像中的中國女性。坐火車離開上海到杭州，從杭州去廣州乘飛機，這是我第一次乘飛機。

在廣州參觀了兩天，臨走前夕他們到我房間裡來，鄭重地對我說：「我們見到了你，放心了，我們想你國外的親友，尤其是你參加的耶穌會會士也一定會高興，回國後我們會去羅馬耶穌會總院告訴他們你的近況。」我非常感謝他們的好意。我被捕後一直懷念耶穌會，為全世界的耶穌會會士祈禱，我也深信耶穌會不會忘記我，一定在為我祈禱。他們又向我說，「你的臉色不好，肯定營養不夠，你穿得太寒酸了，我們決定每月匯給你200元，專為你添置衣服、增加營養之用。匯寄你人民幣還是馬克？」我謝謝他們，說還是人民幣好。回去後他們每月準時匯200元人民幣。當時一個科長月薪才50來元(茅台酒每瓶8元)，我變富

人了。末了他們拿出2250元外匯券說，他們回國後這些也沒有用，拿去用吧，我收下。送他們到廣州車站，他們去香港，他們緊緊擁抱我，要我自己保重身體，我含淚看他們的火車駛出車站。他們已為我購買了回上海和從上海到北京的機票。我飛回上海想探親訪友，先後在榮德先、翁方濤、朱兆慶家裡住幾天。我想去見朱洪聲，告訴他應該謹慎，他的一舉一動都在人民政府的掌握之中，但朱拒絕見我，我很失望。陳雲棠在他的侄兒家見了我，並請我吃了飯。其間，香港來了耶穌會負責人，要和朱洪聲、陳天祥、陳雲棠、蔡忠賢等人談話，他們找了一家自認為極可靠的友人家中開會。據說，會一開完，會談的錄音帶就送交公安局了。隔了兩個月朱洪聲等人被捕。有上海教友說，金魯賢這個叛徒來上海刺探朱等的情況，出賣了朱等人，導致朱被捕。我又蒙上不自白之冤。朱有一個習慣，凡來信都編號登記存檔，凡寫出去的信必自抄一份保存。逮捕時這些信件由公安部門搜去。凡和他有關係的人重點審查，甚至被捕。事前友人勸朱小心，他回說：「放心！共產黨不敢碰我。」他夠瘋狂的了。

陪德國友人的十五天，是我二十七年中天主賞賜我的又一大恩寵，這對我的下半生也起著重大的作用（下卷將提到），我感謝天主。

在上海時，由袁思德神父的妹妹袁思貞陪著去佘山朝聖，中山堂已開放，山上大堂仍被他人佔用。回到北京，劉、鄒接見我，我把經過簡要匯報，我的外匯券說要上交，鄒準備接，劉阻止說：「上交什麼？給你的你自己用吧。」我很感激劉。

回到保定後，我為對我很好的趙、宋兩家的女兒買了三輛鳳凰牌自行車（每輛150元外匯券）報答他們，他們說，騎了鳳凰牌車在街上飛跑很是風光。當時1981年的情況就是這樣。

不久，我收到畫家的來信，在信中他說，他們興沖沖地專程去了羅馬，要求見耶穌會總長，總長叫他的助手 Joseph Pittau 接見他們，這人厲聲說：「我們不願聽到金魯賢這個名字，他在監獄中投降了共產黨，是名叛徒……」我讀了此信，心如刀割，友人們不遠萬里來探望我，耶穌會居然這樣對待我！我只能向天說：「天主，你是全知的，你知道我，我相信你，眾人拋棄我，你決不會棄絕我，你是最忠誠的，我信你。」

期間，公安部把我們二十幾名翻譯員轉成幹部，每月工資調整，我從50元上調為70元（我們仍屬鄒遠管理）。德國畫家真的每月匯來200

元，這樣我每個月就有 270 元的收入。我添了新衣服，每月買些零食，尤其是蛋糕與巧克力糖，可惜好景不長，進一步確證我有糖尿病，已相當嚴重，小便四個加號，不准再吃甜食，大呼奈何！醫生開了病假，讓我半天工作半天休息，日子也過得很好。

回申歷程

1980年6月1日我在保定京安翻譯公司工作，管教我的警察向我說：「明天你去北京，有翻譯業務要聯繫，今晚你可住在北京公安部在錫拉胡同的招待所。」我能去北京一逛當然高興，第二天我去了公安部的翻譯公司見了鄒遠副處長，他說：「明天等著自有人找你。」第二天下午一個名叫張憲民的去招待所找我，領我去八面槽郵局對面一所小花園洋房內，已有兩人候著，他們自我介紹一叫趙亞平，一叫蔣嘉森，都是公安部政保局的，他們很了解我。接著來了一位幹部，他們起立表示尊敬，他們說他是政保局副局長，姓劉名鈞。他們四人問了我的近況，問我生活上有什麼困難，談到國家改革開放，保證宗教信仰自由等，談了兩個小時，他們領我去附近的翠華樓，他們早已訂了一席酒，飯後送我回招待所。

8月初，張憲民到保定找我，領我到了保定市招待所，劉鈞已等著，他們又和我聊，劉勸我少和地下教會聯繫，又請我吃了飯送我回監獄。

10月份管教我的趙寶田幹部又叫我下一天去北京聯繫業務，我知道此行目的，高高興興地去了。第二天劉鈞四人和我談話，談了上海教區的情況，重點談了朱洪聲等人的活動情況，他們對朱洪聲、陳天祥、陳雲棠等人在上海的活動知道得清清楚楚，他們說朱等人在海外勢力的支持下搞破壞活動，很愚蠢，不會有好下場，勸我別和他們聯繫，更不要追隨他們。我發現朱等人的活動政府完全掌握，我為他們擔憂，想設法告訴他們要收斂，但沒有機會付諸實行。

此後每兩個月他們約我談話一次，到了1981年中他們提出來要我回到上海教區去，我說不去，我又說：「我好不容易跳出了這個圈子，現在做翻譯工作，很適合我，我不願回去。」他們勸我考慮考慮，他們很

耐心地開導我，接著在政協禮堂請我吃了飯，席上有古井貢酒，我說了一聲「好酒」，他們立即買了一瓶送我。

劉再三開導我說：「現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長期的，不是權宜之計，不會再變，但宗教得國人自辦，不讓外國人來辦，考慮到將來天主教必須有修院，培養神職人員的接班人，你們都年事已高，辦修院是重中之重，外國傳教士來傳教的日子已過去，再過二十年你們歸天后，天主教不能繼續存在於我國，是你們的過錯，政府盡了心，你們自己拒絕，你們得為教會負責。」話說到如此地步我也感動，但我仍猶豫不決。我和同在保定河北省第一監獄內已刑滿當醫生的周山夫說，他說：「不能參加愛國會，不要回上海，看來你也必須脫離翻譯公司，公安部找你，你不能不去，敬酒不吃吃罰酒。暫時客氣，日子久了，可不客氣了。在易縣一座山頂上，有二十來家天主教教友家庭，他們虔誠敬主，全部教友，沒有外人，政府也不去人找他們，我介紹你去住在那兒，做他們的本堂神父。」我心想，這個方法不妥，第一，我是上海人，進入那村立即引人注意；第二，這種地方政府暫時不管，早晚要管，一管我就被抓，不是長久之計。兩年後，在這個村躲藏起來的神父被抓，政府把這批教友管了起來。

公安部政保局花了整整兩年的時間（每兩個月找我談話兩小時，也宴請我），儘管他們知道我在敷衍他們，仍細心耐心教育我，使我敬佩。回上海後我才知道是上海宗教局副局長陳一鳴努力的結果（陳的父親是著名的教育家，名陳鶴琴，曾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負責教育的督辦，陳受的是西方教育，但進步，加入共產黨，國民黨時代派他做地下工作，後去美國留學，在留學生中從事革命工作，被美國當局驅逐回國，先在中共華東局內負責宗教事務，後調上海市宗教局，反右時期以右傾罪名免職開除黨籍，去工廠當工人。改革開放後為了落實宗教政策，政府請他回宗教局，他立即服從，全心投入落實政策的工作，他向上級建議我回上海負責恢復修院工作。在他任職期間，為開放教堂落實教產四處奔走、各方呼籲，為上海教區的自養奠定基礎，上海教區應該感謝他）。1982年5月我向劉鈞說，我願意回上海恢復修院，他大喜說：「你暫時不回保定，留北京兩三天吧。」第二日劉鈞找我去，在座的多了一個人，劉介紹說：「這是上海市公安局的丁根發同志。」丁自我介紹了一番，說歡迎我回到上海，希望我放心工作，有事多溝通，如有困難，他們幫助解決，態度很誠懇。劉於下一日又找我去，在座的另一

新人，劉介紹說是上海宗教局的浦作同志，先認識一下，回去後便於工作。浦作先表示歡迎，接著說：「那你先寫一封信給張家樹主教，請求他收納你入上海教區。」我當時火了，我原是上海教區的人，為什麼要我請求他批准，我自己根本不想回去，「我不回去了。」我說，拔腳就走。蔣、趙叫我坐下，說有話好好談，我一言不發，第一次和浦作談話，一上來就談崩了，劉說：「今天這樣吧，請老金明天再來。」

明天再去仍是原班人馬，浦作先開口說：「金神父，我代表上海宗教局歡迎你回上海，信就不必寫了，我回去向張家樹說一聲就夠了。」

我暫時回保定仍做我的翻譯工作，一天鄒遠叫手下一位名叫李靜的幹部到宿舍找我，給我50元人民幣說：「這是給你回去的車費，你準備好了買票自己回去。」我說知道了，我把50元退還給他，堅決不收，想這樣就打發我走？我不稀罕這50元。

這期間，在新鄉管過我的幹部王春先打電話告訴我說：她爸爸（當時河南省公安廳副廳長）打電話給她，叫她急回鄭州，她去了，她爸爸很生氣地問她：「你和要犯金魯賢有什麼關係？公安部派專人來了解你和他的關係，問題嚴重了！」王說：「什麼關係？不是領導和被領導間的關係嘛，我管教他三年。」她爸說：「沒那麼簡單，如果當真這樣，公安部會派專員來鄭州調查，並問我嗎？」她說：「金教過我英文。」他說：「學英語非得找個嚴重反革命分子？真糊塗！」他爸擔心她被牽連。事後我問劉，劉笑著說：「請你回去之前，例行公事，弄清社會關係嘛。」這一調查使王的父親擔心了一陣子，王春先本人很坦然，不當回事，老一輩跟年輕一代就不一樣。

隔了十來天，保定派人把我送到北京，劉鈞在北京飯店設宴歡送我，公安部副部長凌雲也來了，非常友好，他的普通話滿是紹興口音，鄉音難改呀。他向我敬酒，祝我回去工作順利，談話中他說自己經手蓋的秦城監獄自己卻被關進住了七年。他又說有事仍可與劉鈞聯繫，他會幫助我解決問題。

隔一天全國宗教局副局長曹錦汝宴請我，陪席的有天主教處處長傅克勇女士，她學美術，解放後先在華東局和陳一鳴同事後調來北京，傅在任時對上海教區大力支持，不遺餘力。劉鈞也去了，劉笑著對曹說：「現在我把金託付給你了，政治上他可靠得很。」劉，河北人，15歲投八路軍打日本鬼子，他夫人也是紅小鬼出身，劉曾戲說：「我起先奉獻青春給黨，後奉獻一生給黨，最後奉獻子女給黨。」他的大兒子在軍隊，

小兒子在公安局，他的女兒在國安部。劉為人耿直、廉潔，我去過他家，是公安部內的舊房子，家具老式，沒有擺設，真是好黨員。下一天公安部派專人送我到車站，訂的是軟臥車廂，很舒適。在一起的是一位老年幹部，我才從監獄出來，不想和人接觸，一路我們沒有說一句話。

上海車站的月台上，等著我的有丁根發、市宗教局辦公室的王怡白和榮德先的女兒朱兆榮等。丁說已為我訂好金門飯店的房間，我說還是住到榮德先家裡去。他們說張家樹一行人正在普陀山休假，讓我過幾天再去教區，兩箱行李先送教區（我心底深處是極不願意回到上海。這一段我怎麼回到上海，寫得較詳細，因為迄今仍有人在說我以出賣同志的代價才爭取到回上海的）。

隔了幾天，市統戰部李廣副部長請我吃飯，有宗教局陳一鳴同志和辦公室主任王怡白，還有教區的張家樹、李思德、沈保智、顧梅青、陸薇讀等人，一別二十七年，想不到還會重逢，又將同事，內心不勝感歎。往事如煙？往事非煙？真難說呀！

6月21日上午去徐家匯天主堂和神職人員及教友代表一起祝賀張家樹九旬華誕，會上祝辭、送禮的極多，我也發了言，內容已忘。被安排在蒲西路120號住下，當時神父修女則住在漕溪北路201號原拯亡會會院內，翌日我去201號拜會了張家樹和愛國會的顧梅青和陸薇讀。原公青李文之來看我，說她奉命來照顧我的生活並做我的秘書。

蒲西路120號原是耶穌會總院，我的初學生活就在那兒度過的，後改為陽傘柄廠，「文革」期間神父修女都曾在廠內勞動，工廠已搬走，但房屋尚未歸還教會。

上海教區收回的教堂有徐家匯大堂（連國邦做本堂，艾祖章副本堂）、四川南路天主堂（本堂未定）、青浦朱家角天主堂、佘山中堂（龔秋生本堂）、崇明新開河（郁顯達、朱尚謙兩位）共五所，我記得我被捕前的大小聖堂有392所，恢復工作任重道遠！

6月21日也是我的本名日，前一日是我的66歲生日，我將開始一個新的生活。我對自己的過去做了回顧：我是一個平凡的人，卻度過了一個不平凡的半生。我於1938年自願加入耶穌會，我愛耶穌會，她為基督的教會做了重大的貢獻，我矢志做一個好會士，自願作一塊磚，隨耶穌會放在任何一個角落裡，承擔教會大廈一小部分的壓力。初學兩年很痛苦，我承受了。以後耶穌會多次把我放在充滿危險的崗位上，我二話沒說立即赴任，盡心竭力，總想做好工作。

在監獄二十七年我天天心中唱：「耶穌會我的母親」，深信全世界的耶穌會在為我祈禱，我故此感到安慰和力量，意想不到的，我的德國乾媽來看我後，興沖沖地去羅馬求見耶穌會領導，報告他們我仍在人間的喜訊，耶穌會副總會長接見他們，嚴厲說我早已是叛徒，不承認我這個會士。當我收到乾媽的信時，真似一把利劍刺透我的心，那是我二十七年失去自由生活中最痛苦的時刻。乾媽信上說，她決不信我是叛徒，她全家仍愛我，給了我巨大的安慰，事實上她一直支持我、照顧我，直到她蒙召歸主。順便再提一句榮德先，朱洪聲釋放回上海後，以他從保定的朋友處得來的消息斷定我已背叛信仰加入了共產黨，去找榮德先，向她說：「我以朱家族長的身份通知你，應與金魯賢劃清界限，當他已死去一般，不再理他。」榮沒有聽他的話，堅信我不會背叛信仰。

我乾媽和陸納英、榮德先是我一生認識的三位偉大的女姓，她們也是偉大的母親，她們以母親、長姐之心愛我。歐美有些人在討論天主應是女性還是男性，爭論不休，對我們中國人來說這不是難題，我們中國以陰陽解說一切，陰在前，陽在後，對天主應用「他」還是「她」，我說兼有陰陽，我們中國在陰陽之上有太極，天主有慈父之心，也有慈母之心，說天主愛人，可以說她既是父又是母。

上卷完

人名索引

- 本篤十五世 (Benedict XV), [16](#), 53
本篤十六世 (Benedict XVI), 82–83;
 又見拉辛格
聖若翰伯爾各滿 (John Berchmans), 35
皮德 (Marcel Bith), 52–53, 57, [61](#)
雷奧那多·波夫 (Leonardo Boff), [82](#)
邦西爾旺 (Joseph Bonsirven), 66
蒲敏道 (Franz Burckhardt), 88–89, 104,
 [106](#), [124](#), [142](#)
坎庇恩 (Edmund Campion), [74](#)
卡薩羅里 (Agostino Casaroli), [125](#)
依撒伯爾 (Elisabeth Catez, Elisabeth de
 la Trinité), 35, [83](#), [146](#)
陳伯達, [153](#)
陳光甫, [21](#)
陳毅, [114](#), 117
陳友仁, [153](#)
舍尼 (Marie-Dominique Chenu), [103](#)
克里蒙梭 (Georges Clemenceau), 63
剛恒毅 (Celso Costantini), 71, [79](#), [84](#), 101
戴笠, [153](#), [156](#)
達尼埃盧 (Jean Daniélou), 66, 93
丹尼斯 (Godfried Danneels), [82](#)
韓瑪諾 (Emmanuel de Breuvery), 121
德古特雷 (Albert Decourtray), 35, [83](#),
 96–97, 102, 146
萊昂斯·德·格萊梅森 (Léonce de
 Grandmaison), 34
光若瀚 (de Guebriant), [16](#)
斐迪南 (Ferdinand de Lesseps), [59](#)
德呂巴克 (Henri de Lubac), [37](#), 64–66,
 [103](#)
鄧以明, [125](#)
保羅·德紫 (Paolo Dezza), [76](#)
丹尼斯 (Edouard Dhanis), 63, 66, [103](#)
丁玲, [22](#), [158](#)
杜安斯 (René d'Ouince), 63
杜蘭德 (A. Durand), 25–26, 66
杜月笙, [136](#), [151](#)
費伊 (Eugene Fahy), [129](#)
范學淹, [177](#)
范忠良, 32
富爾 (Edgar Faure), [148](#)
費孝通, [142](#)
莫里斯 (Maurice Feltin), 68
馮玉祥, [12](#), [152–53](#)
加斯東·費薩特 (Gaston Fessard), 63
傅作義, 62
加納 (Pierre Ganne), 66
加里古·拉根奇 (Reginald Marie
 Garrigou-Lagrange), 63, [103](#)

- 才爾孟 (G. Germain), [57](#), [106](#), [109](#), [113](#),
[122](#), 127–28, 131, [140](#)
- 龔品梅, 11, 106–7, 109–17, [119](#), 121–23,
125–27, [129](#), [131–32](#), [135](#), [137](#), [140](#),
142–44, 148–50, [152](#), [175](#)
- 聖類思·公撒格 (Aloysius Gonzaga), [5](#),
[35](#), [90](#)
- 顧維鈞, 70–71
- 惠濟良 (Auguste Haouisée), [20](#), 28–29,
[47](#), [53](#), [108](#)
- 姚贊唐 (Yves Henry), [13](#), [26](#), [28–30](#), [32](#),
[37](#), [39](#), [43](#), 47–48, [50](#), [53](#), 104–8, 110,
[118](#), [125](#)
- 胡風, [130](#)
- 黃維, 157, [163](#)
- 楊森斯 (Jean-Baptiste Janssens), [63](#), [88](#)
- 蔣經國, 157, [163](#), [165](#)
- 江青, [158](#), 171
- 金達義, 8–9, [13](#), [18](#), 25–26
- 金慰萱, 1, 7–8, 18–21, 26–27
- 若望二十三世 (John XXIII), [80](#), [87](#), [103](#);
又見龍卡利
- 若望保祿二世 (John-Paul II), [6](#), 82–83
- 卡達爾 (László Kádár), [81](#)
- 金安德肋 (Andrew Kim), [6](#)
- 金大建 (Kim Taegon), 見金安德肋
- 漢斯·孔 (Hans Küng), [82](#), 102–3
- 格壽平 (Fernand Lacretelle), [52](#), [57](#), [101](#),
106–7, 109–12, [114](#), 116–26, 131,
138, [140](#), [149](#), [176](#)
- 勞達一 (László Ladány), [43](#), [175](#)
- 郎懷仁 (Adrien-Hippolyte Languillat),
128
- 婁白東 (Jules Lebreton), 34–35, [62](#)
- 桑黻翰 (Peter Lefebvre), 28–29, 45–46,
[118](#), [125](#)
- 雷煥章 (Jean Lefevre), [130](#)
- 李宗仁, [106](#), [153](#)
- 利埃納爾 (Achille Liénart), [83](#)
- 林彪, [154](#), [158](#), [163](#)
- 凌雲, [158](#), [185](#)
- 劉柏年, 128
- 工人司鐸, 67–68
- 聖依納爵 (Ignatius Loyola), [25](#), [35](#), [62](#),
[65](#), 76–77
- 陸納英, 1, 20–22, [27](#), [29](#), [31](#), [71](#), [187](#)
- 陸徵祥, [70](#), [71](#), [72](#), [79](#)
- 羅光, [80](#), [86](#)
- 羅文藻, [113](#)
- 馬相伯, [1](#), [16](#)
- 穆克勤 (Aidan McGrath), 112, [114](#)
- 喬治·馬埃斯 (Georg Meistermann), [95](#),
[102](#), [179](#)
- 明曾蒂 (József Mindszenty), [117](#), [149](#)
- 潘漢年, [114](#), [117](#), [158](#)
- 姚宗李 (Prosper Paris), [15](#), [28](#)
- 保祿六世 (Paul VI), [87](#), [93](#)
- 彭德懷, [143](#)
- 皮漱石, [42](#)
- 庇護十二世 (Pius XII), [66](#), [68](#), [77](#), 79–80,
[82](#), [87](#), [103](#), [111](#), [139–40](#)
- 雨果·拉內 (Hugo Rahner), [92](#)
- 卡爾·拉內 (Karl Rahner), [92](#)
- 饒漱石, [158](#)
- 拉辛格 (Joseph Ratzinger), 82–83, [103](#);
又見本篤十六世
- 黎培里 (Antonio Riberi), [21](#), [88](#), [107](#),
110, 112–14, [118](#), [122](#), [126](#), 131
- 利瑪竇 (Matteo Ricci), [76](#), [165](#)

- 龍卡利 (Angelo Roncalli), 87; 又見若望
二十三世
- 榮德先, 1, 21-22, 27, 113, 115, 142, 145,
154, 167, 169, 179-81, 186-87
- 希萊貝克 (Edward Schillebeeckx), 82
- 陶納德 (Donate Seeger), 1, 93-95, 102,
179
- 蕭洛霍夫 (Mikhail Sholokhov), 152
- 辛海梅 (Jaime Sin), 83
- 宋慶齡, 152-3
- 史貝爾孟 (Francis Spellman), 21, 89, 112
- 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 152-53
- 劉易斯·魯伊斯 (Luis Ruiz Suarez), 46
- 孫科, 80
- 德日進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43,
46, 63-64
- 德肋撒 (Teresa of Lisieux), 67, 80
- 田耕莘, 42, 79, 117, 131
- 特里茨 (Pierre Tritz), 41, 46, 70
- 萬爾典 (Joseph Verdier), 47, 52, 113
- 華理柱 (James Walsh), 21, 112-13, 119,
145
- 汪精衛, 152-53, 155
- 王良佐, 109-10
- 王明, 156
- 王陽明, 37
- 魏泰爾 (Friedrich Wetter), 82-83, 102
- 吳經熊, 67, 79-80, 86
- 吳佩孚, 12, 86
- 吳耀宗, 110, 132
- 吳漁山, 72
- 方濟各·沙勿略 (Francis Xavier), 35
- 徐光啟, 9
- 于斌, 30, 79, 86-87, 106, 131, 142
- 袁世凱, 5, 12, 70
- 張伯達, 28, 57, 108, 110, 123, 140
- 張充仁, 137
- 張謇, 152
- 張家樹, 9, 11, 17-18, 26, 89, 104, 116,
142, 144, 147-48, 185-86
- 張靈甫, 49-50
- 張聞天, 12, 143
- 張學良, 154
- 趙振聲, 40, 42, 53, 88
- 鄭長誠, 119
- 朱開敏, 21, 30, 104-7, 119, 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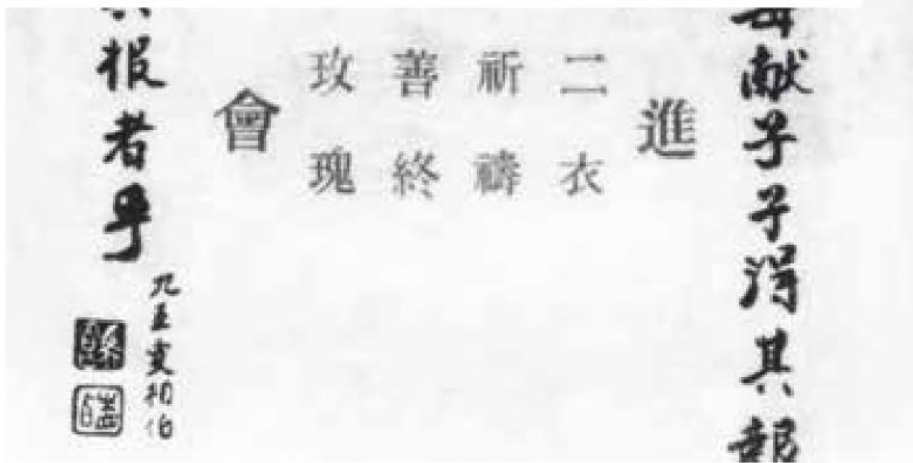
Copyrighted image

圖一 金魯賢(第二排右二)在徐匯公學唱詩班，旁為 Vincent Zi S.J. 神父。

Copyrighted image

圖二 年輕時的金魯賢

Copyrighted image



圖三 金慰萱遺像

Copyrighted image

圖五 榮德先與丈夫朱義生和華理柱主教合照

Copyrighted image

圖六 陸納英(後排右三)與陸伯鴻一家

Copyrighted image

圖七 金魯賢攝於羅馬

Copyrighted image

圖八 陶納德

Copyrighted image

圖九 年輕修士金魯賢攝於愛爾蘭首都都柏林市

Copyrighted image

圖十 上海耶穌會修士與龔品梅主教攝於1953年。龔主教右旁為金魯賢，前排右四為桑黻翰神父。

Copyrighted image

圖十一 金魯賢與乾媽埃德爾特魯德